

【编者的话】

1 月 10 日，《南方周末》在新年献词事件之后出版的第一期报纸上摘编了《人民日报》评论《要跟得上时代的节拍》，并配发点评："党管媒体是原则，但党管媒体的方式要与时俱进"——这实际正是此次事件的解决过程中南方周末和宣传管理部门达成的共识。

在中国，"党管媒体"的原则究竟因何确立？党管媒体的方式有哪些，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因而受到怎样的影响，又作何感受，有何心得？本期一五一十周刊，我们聚焦"党管媒体"。

周刊第一部分，我们试图呈现"党管媒体"的体制原貌。陈力丹指出，"党管传媒"的说法在八十年代末之后"从内部转为公开"并逐渐"制度化"，"这种体制没有宪法和法律的依

据，但是却比宪法和法律还有权势，而且不容讨论”。《党管媒体的八手段》则具体展示了“党管媒体”的手段在新闻生产的全过程中如何实施。

在今天的中国讨论“党管媒体”，离不开市场化这个大背景。刘伟伟指出，对党报的政治控制手段主要有政工系统与单位体制两种途径。但随着党报的市场化，“党报正面临着党宣意识形态与逐利的角色冲突：既要继续发挥‘党的喉舌’的宣传功能，又被推向市场‘企业化经营’，时时刻刻都要在政治与市场之间小心地维持平衡。”周翼虎将国家管制新闻业的手段概括为三点：组织控制、话语控制、财政控制。对比组织控制、话语控制这样的“硬控制”，经济控制是一种“软控制”，结果是“‘市场’不仅没有成为新闻业独立的推动力，反而成为强化新闻业自觉对国家依赖的直接原因。”

周刊第二部分讨论党管媒体与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受到的影响。钱钢在2007 年的演讲《中国传媒的发展路向》中用英文的“3C”来描绘中国传媒，即：Control、Change、Chaos（控制、改变、混沌）。他眼中的中国传媒“进了两步，又退了一步，但还是进了一步”；“改变受到控制，控制却正在改变，我们在控制底下改变，也发现控制出现了改变，控制与松动其实是同时存在。”

和钱钢对“改变”与“控制”间关系的判断类似，王毓莉和芮必峰都指出了媒体管理部门、媒体、新闻从业人员间权力关系的复杂性。《驯服 vs 抗拒：中国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新闻专业抗争策略》一文试图分析“在面对中国高度国家权力控制下，新闻传媒在从事新闻报导产制时，新闻主管与工作者，在驯服与抗拒的过程中，发展出怎样的隐藏式抗争策略。”《媒体与宣传管理部门的权力关系》则关注党媒，指出“党管媒体”的“管”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领导与被领导或上级与下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在党报的新闻生产过程中，也大量存在冲突中的合作、合作中的冲突，而不是那种要么是“对抗”要么是“合谋”的二元对立关系。

周刊最后一部分，我们与读者诸君一道分享两位报人的感受与心得。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南都周刊》执行总编辑的长平在 2010 年 9 月接受《旺报》记者杨伟中采访时表示：“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完全不能在大陆发文章，不想只写给美国人看，没意思。我希望更多大陆人看到，但另一方面，我绝对不能因为这样就委屈自己。我，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许多同仁，不是一下子站到对岸去，而是在试探边界。”《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回顾了他为这份报纸工作近 20 年的经历，他表示《南方周末》“尽管大胆改革，勇于创新，但办报也有谨慎一

面。为了报纸的安全我们提出‘四个维护’作为办报的红线，就是要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现行政策、维护现行政治体制、维护社会稳定。这四条红线必须守住，如果冲破这四条红线，我们早就完了。”

一五一十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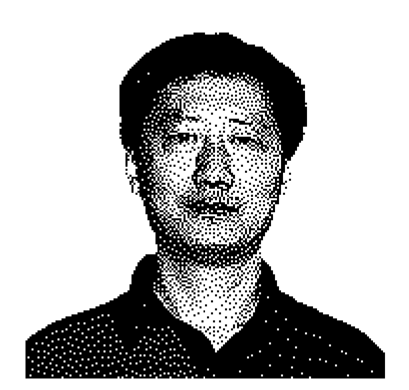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状】

9-1 陈力丹：“党管媒体”的基本体制



“1978 年开始改革进程的时候，‘党管媒体’的说法是没有的，在清算‘文革’、拨乱反正的背景下，这样的说法显得不合时宜。然而，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这种说法逐渐从内部转为公开，而且说得理直气壮。现在它成为不可逾越的传媒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这种体制没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但是却比宪法和法律还有权势，而且不容讨论。”

注：本文写于 2008 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

谈到中国的传媒体制改革，就不能不涉及“党管媒体”的基本体制。1978 年开始改革进程的时候，“党管媒体”的说法是没有的，在清算“文革”、拨乱反正的背景下，这样的说法显得不合时宜。然而，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这种说法逐渐从内部转为公开，而且说得理直气壮。现在它成为不可逾越的传媒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这种体制没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但是却比宪法和法律还有权势，而且不容讨论。

与此衔接的是我国传媒的所有权问题，以前一直说是国有，但有时也说得很含糊。2007 年 12 月上海《解放日报》集团上市，宣布其产权所有人是“上海市委宣传部”，这可能是首次公开宣布传媒是党产。但是宣传部只是党的职能部门，不是党本身，怎么可以是上市公司的老板？这的确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然而，它现在是现实。在经济学理论上能说清楚吗？现在大多数市民传媒，都是各级党报的子报，母报是党产，子报当然也应该是党产。还有一些行业报，依据上面的逻辑，就是政府部门所有，算是国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由广电总局管理，广电总局属于国务院，当然也是国产。但是不论属于谁，党的宣传部下达的指令，是一定要坚决执行的，而且往往被执行得过头。

例如我主持的一个关于职业规范的课题，请部分实习同学做了工作日记，下面是其中一篇：

“在台里做新闻的记者，每个人都要接触到一个叫‘索贝’的新闻系统，因为所有的写稿，改稿和播出记录都在这个系统里面。而每次打开这个系统，都会先有一个对话框蹦出来，这个窗口叫做‘消息通知窗口’，内容都是来自上级对各种新闻选题和内容的宣传和口径限制，不得违反。每天这些通知的内容涉及到政治、工商、文化等等，五花八门，用红色字体标示，提醒大家注意。如今天我打开系统写稿子时就有一条：‘福建省工商局长***涉嫌行贿，并在被调查期间，私自出走到境外一事各档节目一律不报导。’”

还有以下是我记录的以前的一些，如：

7 月 7 日，***主任通知：有关姗拉娜的负面消息一律不许报导。

6 月 29 日，接到领导通知：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是一部重要法律，涉及面广，有比较复杂、敏感，社会关注度高，不要擅自报导，听从统一口径。

6 月 27 日，接到领导通知：不得出版、转载、宣传《用新闻影响今天——冰点周刊世纪》。不报导查堵《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等图书。

……

像这样的消息，每个星期出现在系统里很多，这些选题都是不能做的。有意思的是，有一天当我在看这些消息的时候，部里一个老记者对我说道——‘这才是真正的新闻。’”

这些内部指令除了包括外部的直接指令，有时也包括新闻媒体的“自觉”禁令，以规避可能的犯规，比如禁止报导福建省某工商局长涉嫌行贿的指令，就是央视根据以往”犯规经验”进行的“自觉”行为。而这种禁令模式也成为央视某些部门谋取利益的工具，比如这里的“姗拉娜负面消息一律不许报导”出自央视的一个主任的通知，可见生产“姗拉娜”产品的企业与这个主任部门或者主任本身存在某种利益关系。

1988 年我就谈到过新闻界长期形成的“对表意识”：“我们的体制具有心领神会、闻风而动的机制，可以保证将每一点指示彻底贯彻到连当事人都会惊讶的地步，只要专门端正别人方向的面孔在新闻学界出现几次，就可以保证几十次上百次自觉回到传统轨道上的行动。”又过去了 20 年，现在怎么样？新闻界的“对表意识”更加自觉了（因为制度化了），当然其中

加上了传媒自身的利益；新闻学界多少有了一点判断问题的意识，但是也挡不住上级要求紧跟快转的指令。

中国传媒体制的改革，从 1978 年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至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这种改革至今在“事业单位”的定性上，没有领导人和档给出过明确的说法，即传媒到底是不是企业。现在出现了“文化产业”的概念，但是似乎不包括传媒，而是指剧团、影视公司之类。因此，目前中国传媒模糊而尴尬的性质，已经成为妨碍传媒改革的最大障碍。此前，能够在原有体制内所做的改革，几乎已经挖尽了潜力。

既然是党产和国产，那么获得的利润该上交党或国家吧，但是现在大都由传媒（当然是母报或母台）自行处理，于是，传媒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便被抛到一边。鉴于许多政治问题传媒没有权利自行报导，对一些敏感问题随时要听从上面的指令，剩下能报导的也就是明星轶闻、家长里短、罪犯新闻之类。于是，中国传媒关于这方面的报导，职业道德之缺乏。

现在中国管理传媒的政策，已经“制度化”了，不再有 80 年代一左一右的变化和调整。经历了八九政治风波后，中宣部的新闻宣传政策完全形成了一套僵化的模式。就是说，谁在那个位置上，不论他是甚么观点，都必须按照已经变得十分僵化的一套模式来做，除非他不想当这个官。而且，八九以后，首先是中宣部和中组部，现在是统战部，都升格为政治局委员级，这也反映了党对新闻宣传的控制力度大大加强，而且制度化了。精神生活一旦制度化，思想的交流便停滞了。但是，现在中国的传媒政策已经制度化了，扼制了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2003 年 3 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进会议报导和领导人报导的《意见》。该文件规定，除了具有全局性的重大会议外，会议报导不应把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作为报导与否和报导规格的惟一标准，不应完全依照职务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意见》要求地方党报关于地方领导的报导规格，不得简单比照中央领导，因为中央领导同志担负着国务活动的任务。这个《意见》给予了传媒一定的会议和领导人活动新闻的选择权。然而，这样一个很好的文件，至今基本没有媒体在执行。仅有重庆市委 2006 年 12 月发布一个贯彻性质的文件（共 40 条，其中 26 条涉及如何在一般情况下领导人的活动报导不上报纸头条，不上广电新闻头条），其它省级党委均没有反应，传媒依然把主要领导的活动报导，事无巨细地放到最高最前的位置，而且严格按照官位编排新闻顺序。



5 月 1 日起，《信息公开条例》实行。然而，根据此前发生的“3.14”事件的报导和后来关于奥运火炬接力的报导，尽管已有十七政治报告说的保障人民的“四权”（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但我们对信息的控制方式，仍然完全是老一套，没有丝毫变化。我们的宪法关于人权的表述，是世界上颇为先进的，我们的环境法也很不错，但在实践中多被束之高阁。

党应该管党报党刊，但其他传媒，例如国务院事业单位新华社，以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家外文局所属的报刊由政来管，这种管理是指一般行政、社会的管理。况且现在还有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国家外文局等，他们本来就是政府系列的，不是党的系列的。党政分开，是早在十三大就提出的基本的改革目标之一。现在的情形是积重难返，僵化之极，不要指望一下子解决问题，能往前走一寸都比不走好。（本段为作者现在所加的意见）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责任教授。本文节选自《反思与展望：中国传媒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笔谈》，《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六期（2008）。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8705）

【返回目录】



9-2 阳光时务周刊：党管媒体的八手段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中共八关卡严控媒体》。

陽光時務週刊

中共八關卡嚴控媒體



1 行業准入和審批

定義： 報刊創立需獲得中共新聞出版署統一發放的刊號；新聞採編人員必須持有新聞出版總署統一印製、核發的記者證以從事新聞採訪活動。

拆局： 事實上，新刊物的申報審批日益严格，获取新刊號愈来愈难。現在主要的獲取方法是找一些不活躍的地方刊物，採取掛靠主管單位，購買刊號等合作方式獲取。

案例： 曾經的《錦繡》雜誌，拿的是紡織系統刊號，主辦單位為「四川省絲綢科學研究院」。刊物的名字也會影響審批，《新京報》當年申報時就考慮過「北京時報」、「北京」、「京報」等名字。



2 人事組織任用考核

定義： 中共各級宣傳部直接或間接地控制媒體管理層層的任命權。

拆局： 為掌握媒體內部情況，宣傳部會在媒體中培植親信、安插眼線，甚至直接安排宣傳部官員到主要媒體擔任領導職務。同時，宣傳部會有相應「名單」，列明某些人不適合出任媒體職務。

案例： 從1996年至今，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已有3任新聞處長被提拔到南方報業集團擔任要職。2012底至2013年初，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楊健被任命為南方報業集團黨委書記。南方報業集團核心領導新一輪洗牌開始，主要職位大多被前宣傳部官員佔領。



3 選題禁令

定義： 一為每逢重大突發事件或召開重要會議時的突發事件禁令，二為稿件即將付梓關口撤銷文章的禁令。

拆局： 宣傳部通過採取電話口頭傳達或手機短信直接給總編輯或具體負責人下達指令，通常只為單線聯繫，且通常會強調「不得做書面記錄，不得透露是什麼部門的什麼領導下達了什麼禁令。

案例： 2003年SARS盛行期間，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的禁令有時一天多達30餘條，甚至對頭版等重要版面具體上什麼稿件、稿件的排版位置及標題字型大小、圖片的規格大小等等，都做出明確規定。



4 刊前審讀

定義： 在稿件刊出前，中共中央直接向媒體派駐的審讀員會審讀稿件，並決定刊發與否。

拆局： 2005年之後，中共中央宣傳部推出審讀員制度。審查以秘密方式進行，悄然無聲但有力高效，與新聞閱評一前一後對報道內容形成夾擊，形成管制雙保險。

案例： 2005年，若干審讀員進入《新京報》。而《南方都市報》目前有多名審讀員把控輿論。他們雖遭編輯記者厭惡，但卻掌握實權，對即將付梓的稿件擁有生殺大權。



陽光時務週刊

5 刊後閱評

定義： 定期出版《新聞閱評》報告並抄報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和所有省委書記，對媒體已刊發的新聞和文章作出評估並建議採取相應措施。
拆局： 這是典型的事後追究式的新聞審查制度。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閱評小組成員由極左的中央級媒體退休負責人組成，他們通過揭發各家媒體不忠於或不利於中共官員的言行以從中獲利。
案例： 2000年4月，南方都市報一篇文章被《閱評》點名。其後的政治局會議上，中宣部長丁關根將此事交由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處理。數日後，省委宣傳部長命令撤銷南都總編輯程益中職務。



6 編委會審查

定義： 報刊內部編輯委員會按照所謂「國家有關編輯出版的方針、政策和法令」審定稿件，撤下自審後的「問題」稿件，採取值班收尾終審制。
拆局： 實際上通常由報社或集團內部領導通過電話直接指示社長或執行總編執行，實際決定權不在整個編委會，還是在高層領導手中。
案例： 《南方周末》評論員撰寫2013年新年獻辭後，報社總編輯認為無法通過上級審查。評論部總監遂連夜改寫，再交給總編上報省宣傳部。省宣發回的審核意見對獻辭作進一步修改，遂成定稿。



7 編輯記者自我審查

定義： 媒體領導及從業人員自覺不自覺中養成自我審查習慣，有時甚至比上級的要求更為嚴格。
拆局： 中共從未明文規定編輯記者需自我審查，但在上層機構招呼次數愈來愈多，問責和行賞也愈來愈常見的情況下，為保全工作成果及自身職位，編輯記者漸漸把忠於上級領導、不給上級領導惹麻煩作為工作中唯一法則。
案例： 中共十八大期間，《南方周末》有記者以「《他們眼中的胡錦濤》專題反響很好」為由，提出做「他們眼中的習近平和李克強」專題，但時局版編輯在內部的選題會上並未通過這一選題。



8 司法行政處置

定義： 中共政府以所謂「違紀」、「經濟犯罪」等名目逮捕拘留敢於直言報導社會問題的新聞工作者、報刊總編輯，或不予確切原因地發佈針對個人的「撤令」或「調令」。
拆局： 上層機構一般以上述形式將其認為不適宜或者「犯了錯誤」的相關媒體工作者調離崗位，甚至濫用司法手段報復打壓。其中尤以間接干預媒體領導層面職位調動的手法最為突出。
案例： 2003年，因報道非典和孫志剛事件，當局捏造罪名對南都高層程益中、喻華峰進行司法整肅。2005年，《新京報》報道河北定州襲擊事件和寧夏民工王斌餘殺人事件，主編楊斌遭免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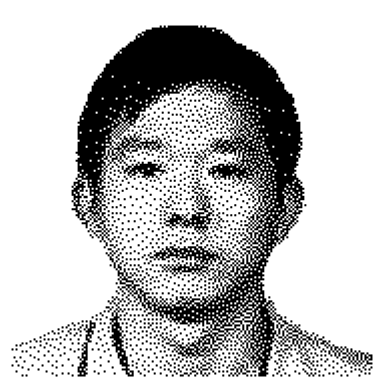


（阳光时务周刊，阳光国际传媒集团旗下品牌，网站链接：http://www.isunaffairs.com/。）

【返回目录】



9-3 刘伟伟：政治、市场与党报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党报正面临着宣传意识形态与逐利的角色冲突：既要继续发挥‘党的喉舌’的宣传功能，又被推向市场 ‘企业化经营’，时时刻刻都要在政治与市场之间小心地维持平衡。”

当代中国的报纸主要有两类:(1)党报，直接由各级党委和宣传部门主管；(2)商业报纸，或者由党报领导，或者由半官方的机构和企业创办。由于商业化报纸不需要承担意识形态宣传的责任，报导的自由度相对高些。

用前任新华社社长穆青的话来说，党报是“党的重要的宣传机关，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前总编范敬宜认为，党报的职责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传达中央的最新精神……抓住社会舆论的热点，发表有权威性的言论，以起到正确引导舆论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党报先后推动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1)1978 年《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2)1991 年《解放日报》(上海市委党报)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3)2007 年年底以来，《南方日报》(广东省委党报)推出了“思想解放十题”，意在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基本遵循的是“经济改革先行”的思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不同步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对大部分中国媒体来说，宣传和利润的重要性是不对等的。在某些情况下，政治与经济利益可以一致。但是，在更多情况下，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媒体内部的紧张和冲突。改革开放以来，党报正面临宣传意识形态与逐利的角色冲突:既要继续发挥“党的喉舌”的宣传功能，又被推向市场“企业化经营”，时时刻刻都要在政治与市场之间小心地维持平衡。

一　对党报的政治控制



（一） 目标:“稳定压倒一切”

“稳定压倒一切”是中国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目标。稳定是指社会保持有序的状态，在中国，更多的是通过政治控制来实现。与经济处罚、法律诉讼等手段相比，政治控制始终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政府处理突发事件最得心应手的方式。新闻的作用包括宣传(propaganda)、动员(mobilization)、组织(organization)、教育(education)和批评(criticism)。“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双六字”方针，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宣传的基本方针。

“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核心。对此，穆青有集中的论述:新闻报导不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坚定群众的革命意志，鼓舞群众的斗争热情为目的……好的新闻报导，必须在思想上对群众有所启发，精神上有所鼓舞，因此它必然是群众良好的思想教材……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实、准确、坚定地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二） 手段:政工系统与单位体制

政治控制主要有两种途径:(1)以组织和宣传部门为典型的政工系统；(2)覆盖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单位体制。组织部门掌握人事任免权，宣传部门把握舆论导向，单位对“体制内人员”产生无形的制约。中国媒体实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党委宣传部门双轨制领导。在二者的许可权上，宣传部门更大于新闻出版部门。中央宣传部负责“引导社会舆论，指导、协调中央各新闻单位的工作……会同中央组织部管理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和代管单位的领导干部……提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2005 年 9 月 30 日，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报纸出版管理规定》，明确了四大监管制度:事后审读制度；品质评估制度；年度核验制度；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制度，同时规定“报纸出版单位违反本规定的，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视其情节轻重，可采取下列行政措施:(一)下达警示通知书；(二)通报

批评；(三)责令公开检讨；(四)责令改正；(五)责令停止印制、发行报纸；(六)责令收回报纸；(七)责成主办单位、主管单位监督报纸出版单位整改。”

单位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家占有大量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建立主流意识形态上的特殊社会组织，国家统治的组织化形式。单位兼具数种功能:政治统治、资源分配和专业工作。从资源的占有和获得上看，个人依赖于单位，单位依赖于国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严密控制。单位规范个人的行为。党组织是单位的权力核心，人事任免权是党组织的基本统治手段。

作为事业单位，党报从业人员对报社存有依附关系：政治上，从业人员须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监督；经济上，党报提供给从业人员稳定的工资以及住房等福利。进入报社管理层的先决条件是政治合格、思想正确，以确保党对报社的领导。2006 年，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石峰对此有所阐述:“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确立党委领导下的报业集团管理体制⋯⋯集团党委会为最高决策机构，党委会领导社委会(或董事会)，社委会领导编辑委员会和经营管理委员会。”

在采编上，党报要严格贯彻党委和上级的命令，严禁任何误读。“新闻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登什么，不登什么，怎么登，都要从全局出发，从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作为记者，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也要从全局出发，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能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必须“做党的忠实喉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天津日报》总编张建星说:“作为地方报纸，在准确反映中央声音的同时，还应及时、迅速地传达市委声音⋯⋯把中央和市委的重大决策、重大新闻作为第一重点来做。”

事实上，重大新闻事件的报导，各地党报几乎都是照抄新华社“通稿”。《南方日报》总编杨兴锋说:“既要敏锐地把握好宏观政治环境，又要处理好新闻人物复杂的关系，这都是规避风险确保办报安全所必需的。尤其是在新华社尚未播发相关稿件，宣传口径也不明朗的背景下，对编辑就更是一种严峻考验，稍有不慎，便可能惹来麻烦。尤其是头版，政治要求更高，也更难把握。”

宣传“先进”和“典型”，是通过党报进行政治动员的一种常规手段。“负面新闻”曝光的问题短期内无法得到解决的话，即被认为“会引起公众不满，进而导致社会失序”。在灾难报导中，重要的不是灾情，而是抗灾和救灾，以强化人们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正如范敬宜强调:

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在反映矛盾的同时给人以希望、光明和办法”，重反映广大军民、干部、党员齐心协力，以大局为重，奋不顾身、艰苦战斗的精神，避免报导受灾面积、伤亡人数、经济损失等具体灾情。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党垄断了资源分配，入党就意味可以享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稀缺消费品的优待权。因此，仅从物质利益角度考虑的话，党员的身份是很吸引人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不再具有垄断的资源分配权，例如在就业方面，人们有更多的选择，如果不想进入官僚队伍的话，党员身份就不再那么吸引人了。此种变化也反映在党报与从业人员的关系上。党报作为事业单位，对资源的分配权在减少，由此，对从业人员的控制力也在下降。

二　从完全垄断到行政垄断下的竞争

（一）　政府规制与党报的行政垄断

规制是由行政机构制订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的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它包括限价、费率制订、进入限制、产品特征的限制、企业投入或技术的规制等。行政垄断是中国政府规制中的突出问题，指“政府规制机构与规制之下的企业在构成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相关企业凭藉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取得垄断市场的地位，并谋取垄断利润”。行政垄断分为地区垄断和行业垄断:地区垄断是指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设置市场壁垒的行为;行业垄断则是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为保护特定行业的企业及其经济利益而实施的排斥、限制或妨碍竞争的行为。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传媒业变革的基本特点是:“微观业务机制层面的改革远远超前于宏观体制规则层面的改革，……增量传媒（新增媒介）的改革远远超前于存量传媒（既存媒介）的改革。”党报的市场化是最典型的案例。2003 年，中国有 2000 多家报纸，其中 33 家报纸的广告收入是 88 亿，占当年中国报纸广告收入的 78. 9%。绝大多数报纸如果不是党报，就是从属于党报为“母报”的报业集团。中国报业的发展趋势，可以归结为:从党报完全垄断，到党报行政垄断下的报业竞争。

（二） 党报的市场化：阶段与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业产业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979 到 1987 年，实行所谓“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1979 年，财政部批准了《人民日报》等八家中央新闻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各单位遂开始实行“独立核算、盈余留用”。但是，改革是有限度的，例如《人民日报》要求广告平均占版率在 25%以下。第二个阶段是从 1988 到 1995 年，推行采编与经营分离，实行股份制改革。第三个阶段从 1996 年开始至今，报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始资本运营，上市融资、合作或合资经营。所有“找不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具备资格的主管主办部门的报刊，予以停办”。在市场化的背景下，随着都市报和网络的兴起，党报受其冲击，读者大量流失。1992 至 2006 年，省级党报的发行量每况愈下。

党报的市场化生存有两条路径:一是组建报业集团；二是在报纸之外进行投资和多元化经营。当然，这两种路径可以并行不悖。1994 年，新闻出版总署规定了组建报业集团的五个条件:(1)影响力:除了有一份具影响力的主报外，须至少有四个子报刊。(2)财力:沿海地区报社年税利在 5000 万元以上，中西部地区报社年税利在 3000 万元以上。（3）人才:报社在职采编人员，具有副高级以上新闻职称者，占 20%以上；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中，有各类专业中级以上职称者，占 15%以上，并要有高级职称者。(4)技术实力:拥有独立的印刷厂，具备彩色胶印能力，日印刷能力在对开 200 万份以上。(5)发行能力:主报及子报刊总发行量在 60 万份以上，在本地区每 150 人拥有一份，有能力自办发行。

自此之后，报业集团发展迅速。2001 年，全国已成立 18 家报业集团。2004 年，报业集团增加到 39 家。报业集团所有报纸占全国报纸总量的 17%，但总印数占全国的。同年，经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大众日报》、《新华日报》、《河南日报》、《深圳特区报》等四家报业集团，进行“转企改制”的改革试点:一是“事转企”，即从经营性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二是“独转股”，已经转为企业体制的由单一的国有制转为股份制。

党报以前没有自己的销售网络，只得采取通过邮局的方式发售。1985 年，《洛阳日报》率先自办发行，好处是发行费用更低。《广州日报》1991 年开始自办公司发行，实行“扫楼

战术”，挨家挨户上门征订，还向 1000 多名报贩批发。到 2000 年，全国自办发行的报纸已达 800 多家，占报纸总数的 40%，其中地、市以上党报 260 多家，包括《天津日报》、《宁夏日报》、《南方日报》、《重庆日报》四家省级党报，占党报总数的 70%。1995 年，《人民日报》开通了网站——人民网。1998 年，《南方日报》在省级地方党报中率先推出网络版，各地党报纷纷跟进。目前，全国三十一个省级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主要城市(省会、自治区首府和重要沿海城市)的党报，都开通了网站，绝大多数都提供当日或前一天的电子报。

三　党报的影响力

(一)　影响力的作用机制

报纸的影响力主要体现为：作为公众舆论的平台，扩大意见表达和政治参与，设定政策议程，推动政治民主化乃至政治变革(包括革命)。有学者指出:“如果政治游戏规则还不完善，自由的新闻界将作为一盏明灯(warning light)，反映公众对政策制订过程或当权政府的不满。政府如果想实现政治稳定，就必须正视被曝光的问题并及早解决，防止不满情绪的积聚和爆发。”

报纸发挥影响力的前提，是影响公众和决策者的态度和行为。报纸通过进行高品质的新闻报导取得社会影响，从而扩大发行量和盈利。降低内容的品质会损害公众的信任，削弱其社会影响，并最终影响发行量和广告。简单的逻辑关系就是:报导内容决定报纸的发行量，发行量影响广告量，而广告收入则是报纸收入的主要来源。报导内容的公信度和报纸的发行量，共同决定了报纸的社会影响，报纸的社会影响决定了报纸的收入。

在中国，党报的影响力在于，作为党的喉舌，向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公众进行宣传和动员；同时，也通过“读者来信”和写作“内参”的方式，向决策层“献言献策”。如前所述，党报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影响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光明日报》、《解放日报》和《南方日报》推动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二） 发行量：影响力的范围

媒体的分众化决定了不同媒体的影响力是不同的。核心媒体(电视、电影和重要报刊)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所有人；边缘媒体(图书、其它报刊、广播和录影)则主要针对因年龄和生活方式不同而各异的亚群体，受众比较零散。就报纸而言，“‘影响力’并不等同于‘注意力’……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不一定是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但是，发行量不大的报纸，不可能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按照报纸发行的方式，可将发行量分为零售发行量和订阅发行量。零售发行量，包括通过出版单位的发行员、批发商、零售商、邮局零售或者其它直接面对读者的管道进行销售的数量；订阅发行量，是指出版单位与订户以合同的方式，定期向其发行的付费报纸的数量。报纸的发行量与版面数量、当地经济发展水准和读者结构等有关。

在市场化改革前，党报根本不用担心发行量。它们接受财政资助，通过邮局发行。普通民众买不买报纸，根本没人关心。编辑只要对上级领导负责就行，而不是读者。强制摊派、机关订阅，一直是党报发行量的主要构成。随着财政“断奶”、治理摊派发行、党报被推向市场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党报发行量急剧下滑。党报需要自筹相当一部分运转资金，对广告收入的倚重逐渐加强。同时，新媒体的不断增加、版面的不断扩张、广告份额的不断分切、人才的不断流失、成本的不断加大，增加了党报的生存压力。党报虽然仍然拥有政治特权赋予的垄断优势，但这种优势在逐渐被弱化，作为政绩考核的强制征订作用也逐渐式微，零售市场的重要性愈来愈凸显。

（三） 信任:影响力的核心

政治信任是公民对于政府行为正确、恰当并符合公益的信心，它包括对政治行为的信任和对政治机构的信任。政治信任为政权提供了政治支持，使它在面临危机时能有效地进行政治动员。媒体可以提高透明度、扩大参与，促进政治沟通和增进政治信任。在中国特有的语境下，



政治信任的对象不仅包括政府机关和公务员，还包括党的组织系统及从属于宣传部门的官方媒体。

政治控制的负效应是媒体公信力和政治信任度的降低。1993 至 1994 年，史天健等学者在中国大陆调查了公众对媒体和政府的信任程度，发现新闻媒体往往使公众倾向于不信任政府。政治信任与公众对媒体的评价呈正相关，而与公众接触官办媒体的程度呈负相关。在官办媒体的统一口径下，有限的资讯来源无法使公众信服，也无法为政府赢得公信，小道消息却成为重要的资讯来源。

四 结语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市场化的大潮虽然波及到了传媒行业，但是，作为意识形态关键领域的党报，其受到的政治控制始终没有减弱。党报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真正市场化，改革始终是有限度的。在报业集团内部，作为子报的都市报可以偶尔“打擦边球”，或者完全走都市报的盈利路线，但是作为母报的党报永远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否则报社负责人就要写检查乃至被撤职。

党报的发行，仍然大部分依赖行政订阅，而且作为地方政府的政治任务被贯彻下去，有一套奖惩机制。《广州日报》这样高比例的零售份额只是特例，大部分地方党报仍然处于机关单位公款订阅的状态。在宣传部门看来，重要的不是扩大发行量，而是影响“有影响的人”:首先保证党的干部“必读”，人民群众“选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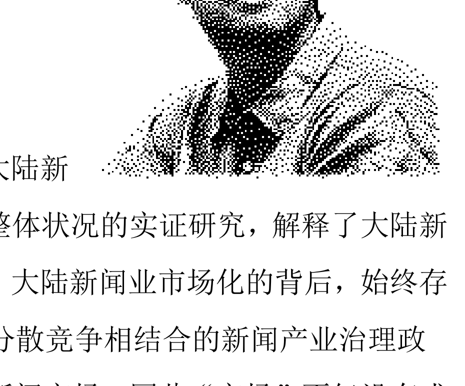
“增量改革”这条路线，已被奉为“改革圣经”，在传媒领域更是如此。党报不能动，然而，可以在党报之外，另设新报刊。子报养母报，母报保护子报，是大部分报业集团的共性。在新闻界，党报从业人员也与其它媒体人形成了不同的圈子和话语体系，互相视对方为异类。政治与市场的互动，是观察中国改革的结构性视角，而党报恰恰是最佳的案例。正是这些坚持“党性”的报纸，构成了执政党权力合法化的舆论基础，但这样的基础由于民众信任度的降低而有所不稳。

（刘伟伟，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师。本文原载于《二十一世纪》09 年 10 月号，原文链接：http://www. cuhk. edu. hk/ics/21c/issue/articles/115_0809053. pdf）

【返回目录】

9-4 周翼虎：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

“本文提出‘软控制’的概念，在于与以往国家对新闻媒介的刚性政治高压控制手段相比较而言。中国新闻媒介三位一体的单位化控制体系中，组织控制、话语控制是一种刚性、显性的‘硬’控制，而经济控制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软性控制机制。这种软性控制机制不是针对新闻记者个体，而是从媒介产业层面施加主流价值内化机制。”



摘要：本文以大陆传媒产业发展为桉例，关注了当代大陆新闻发展进程中的市场化问题。通过对大陆新闻业运营发展整体状况的实证研究，解释了大陆新闻业特有的市场化与政治控制同步增长的悖论。本文指出，大陆新闻业市场化的背后，始终存在国家一元独大的政治权力运作。由此产生的高度垄断和分散竞争相结合的新闻产业治理政策，造就了一个根据国家行政恩宠程度来分配经济利益的新闻市场。因此“市场”不仅没有成为新闻业独立的推动力，反而成为强化新闻业自觉对国家依赖的直接原因。在权威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双重治理下，新闻记者很容易陷入忽略价值、注重实利的犬儒主义。

关键词:国家与新闻业关系、市场化、单位化控制、经济软控制

一、　前言

中国大陆市场化背景下新闻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在各类文献中，市场化对国家与新闻业关系的影响——是引发更多的政治独立还是会压抑民主政治的发展，存在着明显对立的争论。

中国新闻媒介自 1978 年以来非财政拨款收入逐渐增加，经济日益独立，因此，本文选取一个衡量新闻媒介市场化程度的核心指标，即新闻媒介经济依赖度(非国家财政拨款占媒介运

营经费的比例)来描述市场化进程；并试图从中国大陆新闻业的经济结构整体转型这一显着变化，探讨对当代新闻记者与国家关系的影响。

与通常依据新闻记者个体或单个媒介机构的调查桉例进行推论的研究路径不同，本项研究通过设定某些逻辑前提，并结合大陆新闻产业自 1978 年以来的整体状况，推论大陆传媒经济自主性和政治自主性之间的关系变化。这种从经济转型探究政治转型的整体性研究方法，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忽视中国整个新闻记者群体的某些个体性、地域性差异，但根据某一变数或维度对新闻媒介进行理想化的抽象，并从历史全景角度把握中国新闻媒介的发展趋势，还是非常必要。

本文逻辑前提有二:(一)国家权力的一元独大；(二)新闻记者的经济人假设。首先，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结构造就了一个权力驱动的特殊市场；其次，新闻记者既不是单纯的新闻专业主义者也不是主流话语的接受者，而是一群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这个假设并不否认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有信仰坚定的新闻记者，而是认为，在一个日益受经济利益支配的理性世界，机会主义者占据多数，或者说，那些有信仰的记者逐步被机会主义者淘汰。当国家权力越来越成为经济分配的主导者，当新闻记者越来越意识到物质生活的重要性，自觉与主流话语保持一致必将成为系统性的行业自觉——这种妥协，并非完全出于记者个体的贪婪。当中国大陆和传媒行业越来越商业化，传媒也必将臣服于商业化背后的操纵者。

以此为逻辑起点，本文考察了 1978 年以来大陆新闻产业的发展状况，资料来源于对新闻记者的访谈以及作者在从事官方调研工作中取得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访谈，来源于从 1995 年至今日常工作中的接触交谈，记者群体既有广播电视记者，也有报纸记者，同时包括相当部分的行政负责人，由于工作关系，其中以广播电视记者居多。内部资料，主要包括新闻单位的历年财政运作方面的档桉。依据本文作者长达十余年的参与式观察以及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大陆新闻业已经在高度垄断和分散竞争的经济结构中被充分“官商化”。这种“官商化”决定了新闻媒介获取经济利益的最佳途径，是在政治场域中竞争行政资源，并通过一个与政治恩宠挂钩的“新闻资源市场”来瓜分经济利益。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新闻自由的倒退。事实上，由于国家合法性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改良，新闻业尽管始终被限制在国家设定的框架内，但也在国家政权、传媒消费者和新闻专业主义者三方共同推动下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进步。

二、 问题的提出:市场化与政治控制为何同步增进

威权国家新闻治理中最引人瞩目的基本特征，是新闻记者高度依附于行政机构内部，国家对新闻业拥有绝对控制权。1978 年市场经济启动后，中国新闻媒介的经济自主性不断增强，也不可避免影响到计划体制时代国家对新闻业的绝对控制关系。建国以来，中国新闻业(此处指大陆地区，下同)完全依靠财政拨款维持运营。但 1978 年中国新闻业市场化改革后，中国新闻业从市场上获取资金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国家财政拨款占新闻业的比例急剧缩小，到 1998 年绝大多数新闻机构的资金自给率已经达到 100%。这种经济自主性增进将给国家新闻业关系带来何种变化，存在两种对立观点。

现代化理论认为，市场化将使新闻机构更有脱离国家控制的动机，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激进。一些学者推断，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以及相应的新闻媒介市场化对新闻自由的推动力要远远大于国家对新闻自由的压制力。例如，Lull(1991)与 Zha(1995)认为中国 1990 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化转型削弱了威权政治基础。Pei(1994)以东方电视台为例，认为不断壮大的资本力量为在党的宣传体系内部催生出竞争对手。Chu(1994)与 Keane(2002)甚至认为遍地开花的地方电视台开始动摇了国家对新闻业的控制体系。

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对立面，批判理论认为市场化使新闻业为经济利益而更保守。诸多实证研究表明，1990 年代以来，中国新闻记者直接挑战国家体制的报导越来越少(Lee，Chan，Pan，and Clement，2000；Pan，2000)。尽管越来越多的腐败和违法行为被曝光，但基本被新闻记者归纳入“中央政策好、地方政府不好”的叙事模式(Zhao，2002；周翼虎，2008)。He(2000)根据对《深圳特区报》的调查，认为中国主流媒介已经从单纯的宣传机构转变为“党的公关公司”，在吸引读者的同时提升政府的统治绩效。张小丽(2003)的研究也表明，作为中国自由派大本营的《南方周末》对政府的批评性报导显着减少。由于追逐经济利益的前提是与各级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新闻媒介越来越愿意报导一些更平民化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在 80 年代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深刻关怀。

虽然这两种观点分别给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预测，各自具有一定逻辑合理性和相应经验证据，但现实显然要比这复杂得多。根据作者自 1995 年进入某国内主流媒介的参与式观察，上

世纪 1990 年代末期以来政治控制与市场化的同时增进，是在当代中国国家与新闻业关系或者至少是国家与电视新闻业关系上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至少表现为以下三个现象：

(1) 国家控制能力的增进——在新闻产业规模急剧扩张、市场力量日益强大的环境下，国家对新闻业的一元化、集权化领导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加强。例如在非典时期、伊拉克战争时期、全国大学生反美游行 (Zhao，2002) 以及各类重大事件和社会热点，国家都显示了超凡的舆论调控能力。

(2) 从业人员的官方价值内化——尽管记者"打擦边球"活动 (潘忠党，2000；Lin，2006；Zhao，1998/2002) 几乎无处不在，但从整体上看新闻业却没有走向政府的对立面，相反"帮忙不添乱，鼓劲不泄气"、"大局意识"、"阵地意识"等体制内规范已经越来越成为记者的新闻自觉 (Li，2002)。钱蔚 (2002) 认为中国电视新闻业正由宣传功能的政治部门演化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国家喉舌仍然是新闻业的第一属性；潘忠党与陈韬文 (2006) 对上海、杭州媒体的调查甚至表明，中国新闻记者对行政干预业务活动态度暧昧，甚至相当欢迎国家的行政干预。

(3) 新闻业的市场化进程加速——根据新自由主义逻辑，政府对新闻业的内容管制和所有权管制将导致多样性丧失和效率降低，但事实上新闻业竞争反而越来越激烈，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上升，成为重要的国家税源之一。中国新闻传媒业迅猛成长为每年超过 1000 亿元的产业，利税超过烟草业，一跃成为中国第四大利税行业。以上事实说明，市场化与政府管制同步强化的结构性特征，更接近中国当代国家与新闻业的现状，现代化理论和批判理论可能只描述了中国新闻业发展的一个侧面。有趣的是，支持现代化观点的个案集中在 1990 年代早中期，而支持批判理论的个案集中在 1990 年代后期以及 21 世纪的新闻业领域。这种新闻专业价值日益主流化与国家行政日益强势并存的现象，使潘忠党与陈韬文 (2006) 断言当代中国新闻记者已经处于职业伦理价值"碎片化"状态，是一个同时具有保守、激进特征的矛盾群体。那么市场化究竟给当代国家与新闻业关系带来何种影响？如何判断中国当前的国家与新闻业关系在总体上是走向分离还是更加紧密？显然，由于中国新闻业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各个地区、行业、群体都具有极强的异质性，因此仅仅根据对局部领域、地区的个案观察难以推断出"国家-新闻业"关系的整体面貌，甚至根据这些个案调查得出的结论还经常相互对立。其次，由于分析当代中国国家与新闻业关系的理论主要来自西方传播学、政治学观点，而这些观点多数

扎根于对西方民主政体国家和拉美国家的经验研究，如果将其简单地应用于具有完全不同社会结构的中国新闻业领域，将可能因制度环境不同而产生系统性的解释偏差。因此，本文将基于以下两点展开对当代“国家-新闻业”关系的考察：一是从逻辑上考察西方现代化理论和批判理论的假设前提和应用于中国地区的某些制度性偏差，并找出其中支配当代中国“国家-新闻业”关系演变的基本机制；一是结合中国新闻业产业化改革进程，解释该机制是如何支配当代“国家-新闻业”关系的演化，并对新闻媒介的市场化与当代“国家-新闻业”关系做一个总体性考察。

三、现代化理论与批判理论传统的基本观点及应用于中国的制度性偏差

西方传媒研究领域有两大传统:一是关注威权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理论，一是关注西方国家媒介市场化导致民主危机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理论。从中国当前的制度环境出发，可以看出这两个理论传统都没有注意到“强国家-弱社会”结构在研究中国“国家-新闻业”关系的特殊地位。在中国，国家强有力的新闻控制是一个基本事实，是论述国家、新闻与市场三方关系的起点。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本文试图澄清一个前提:任何政体形态中，国家与新闻专业力量都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冯建三，1992)，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家与新闻记者之间是否存在冲突，也不在于新闻记者之间价值观是否存在冲突，而在于国家对冲突的解决方式。

与“法律-选举”政体相比，威权国家新闻治理的根本特点，在于其冲突的解决规则不是协商的，而是行政强制的并获得正式制度的显性支持，这与西方法律—选举政体下资本控制媒介的隐性、非正式和协商控制手段有显着差异。“法律-选举”政体与威权政体新闻控制的关键区别，就是法律选举型体制的新闻控制是隐蔽的、法律及主流价值体系所不支持的，而威权体制的新闻控制是显性的、正式法律制度及舆论环境所大力支持的，对冲突的解决方式也是刚性和强制的。在威权政体尤其是中国社会结构和制度设计下，在市场、专业和国家的三方博弈中，国家具有一元独大的超级力量。本文将在下面进一步指出，多数批判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没

有从政体比较的角度指出两类控制背后的本质区别，更难以分析一元独大的国家力量对中国媒介市场化进程的深刻影响。

具体而言，中国新闻控制的特殊机制在于，国家一直是通过“单位体制”(路风，1989；李猛、周飞舟、李康，1996；杨晓民、周翼虎，1999)对新闻业这种特殊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宣传工具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国家对新闻业施行三管齐下的管制手段：一是组织控制，一是话语控制，一是财政控制。(1)组织控制：国家通过“党管干部”的原则，掌握了对新闻机构各级负责人的人事任命权，从而控制了至关重要的事前审稿发稿权。党还严格禁止社会力量创办媒体，与拉美等威权国家相比，这种禁入制度消灭了通过散播海量资讯导致媒介失控的组织基础，使任何对抗性力量萌芽在初期就无法形成；(2)话语控制：国家通过各级“宣传部”这个意识形态审查指导机构，建立了广泛的预警机制和严密的事后审查制度，力求使新闻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丝丝入扣；(3)财政控制：国家还参照行政机关来管理新闻业财政，新闻业的任何生产活动都必须上报宣传计画，核准后根据计画下拨预算，这样使新闻业从宣传环节到生产环节的任何自主空间都不存在。在国家对新闻业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监控下，即使在文革时期当新闻专业力量与国家意志存在严重分歧，国家也始终能控制政治局面，形成一元独大的话语霸权。

1978 年后的新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脱离“单位”这个牢固的箱体。虽然一些文献认为中国新闻业的社会化、市场化进程已经非常显着，但核心新闻机构仍然保持了单位化组织体系：各新闻机构虽然从市场上获得大量收入，但它们在法律上仍然属于事业单位而不是具有相对独立财产处置权的国有企业，国家可以随时调拨其财产或者进行机构重组。在话语审查能力上，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海量资讯冲击下，国家依靠单位组织执行其资讯过滤功能的办法依然简单易行、成本低廉。例如，国家不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审查各新闻机构的报导细节，只需要以一纸行政命令调动各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就足以使新闻机构与国家意志相一致，从而避免了陷入了拉美国家威权统治与现代化并举时所面临的“海量资讯”的陷阱。50 年来，国家对新闻业的强有力的单位化组织体系始终没有改变，这种单位化控制使国家在业务自主权争夺中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中国新闻机构市场化改革是在这样一个基本制度框架下运行的，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垄断性的官商经营，从而使中国新闻媒介市场化的主体、动机和路径都完全不同，难以直接应用现代化理论和批判理论来解释 1978 年来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中国“国家—新闻业”关系演变。



在国家一元独大的环境中，批判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共同缺陷，在于它们都先验地将市场假设为具备与国家抗衡能力的一个主体。但事实上，市场化只是一个中性的资源配置机制，它既可以用来反对威权统治，又可以被政府采用为一种控制机制。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威权国家的新闻传媒是否能走向一个民主表达而非政治宣传的机器，不仅取决于新闻生产的资讯数量或记者的生产动机，而且取决于国家对新闻记者活动的控制能力。如果国家能有效地控制新闻记者的活动甚至与新闻记者达成交易，市场经济条件下威权国家的新闻媒介就可能接受对国家的依附状态并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合流，走向民主意志表达的反面。

可见，在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下，抽象地谈论一个没有国家在场的市场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的核心是市场在何种情况下会增强或削弱媒介的自主性，或者说何种市场将增强或削弱媒介的自主性。本文将关注一个“强国家”背景下的新闻业市场化路径，并引入一个“时刻在场”的国家来分析新闻业的市场化进程，并进一步探讨当前新闻业市场化与国家控制强化同时增进的现象。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到 21 世纪，国家对当代中国新闻业的经济软控制手段基本定型。国家通过垄断经营和分散竞争相结合的市场化改革，逐渐将新闻媒介推进了一场自顾不暇的媒介生存战争，竞相获取国家经济恩宠的策略成为各新闻机构在残酷市场竞争中的行业自觉。这种依附策略未必是新闻记者专业主义价值观的蜕变，也未必是主流价值观的内化，而是一种由政治和经济推动、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结构性运动。当前多数文献的方法论是对以个体为单位的新闻记者行为和态度的描述和调查分析，但鲜有从经济的结构性变动中寻求对国家与新闻业关系演变的内在机制解释。事实上，新闻媒介无论作为专业化传播组织还是作为从事宣传的专门机构，整体上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的变化将对该阶层政治动机产生重要影响。这种经济结构对政治动机之间的影响、由国家介入的市场化机制以及当代新闻业从抗争到自觉依附的演化路径，是本文关注的基本点。

本文提出“软控制”的概念，在于与以往国家对新闻媒介的刚性政治高压控制手段相比较而言。中国新闻媒介三位一体的单位化控制体系中，组织控制、话语控制是一种刚性、显性的“硬”控制，而经济控制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软性控制机制。这种软性控制机制不是针对新闻记者个体，而是从媒介产业层面施加主流价值内化机制。

必须指出，这种软性控制机制并不是国家有意识制度设计的产物，而是国家与新闻专业力量相互博弈过程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综合结果。换言之，造就一个“保守的新闻业”的动力机制，却远非在批判理论指导下的现有研究所揭示的那样简单。由于中国 1978 年以来的社会转型始终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国家对新闻业的经济软控制手段的形成也是在“边干边学”中逐渐建构而成，将任何一种观点简单化将无助于对埋藏在中国“国家-新闻业”关系中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动力机制的理解。本文将在下一节结合新闻业市场化的历史进程来印证以上观点。

四、产业化政策背后的经济软控制机制的形成

1. 国家财政危机与新闻业产业化政策的确立

文革结束后，为解决经费紧张问题，国家允许新闻机构利用自有资源从市场筹集宣传资金。新闻单位采用以收抵支的办法:将各类经营收入纳入到单位预算，与财政拨款统筹安排，编制统一的预算和财务收支计划。纳入单位预算的收入视同国家财政拨款，作为抵支收入，免征所得税和“预算调节基金和能源重点建设基金”。这种市场化筹集资金办法被官方称为“多种经营”。

在两条腿走路的财政双轨制下，高速膨胀的广告收入逐渐改变了新闻媒介以政府拨款为主的单一收入结构。1979 年中国广告收入仅 1500 万元，1980 年已经达到 1. 1 亿元，以后每年按照 40%的速度递增。到 2001 年，中国广告经济达到 794. 89 亿元，增长了 674 倍。从 1999 年开始，中国新闻媒介的经济自给度达到近 100%，除了少数广告收入不足的边疆地区新闻媒介(如宁夏电视台、电台)，中国绝大多数新闻媒介实现自负盈亏。新闻业的财政结构从 100%依赖财政拨款转为基本依靠市场创收。

2. 市场化政策的实质:以收支平衡为目的的垄断经营

国家对新闻业的双轨制财政改革，催生了新闻业走向经济日益自给甚至自负盈亏之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介的收入来源已经市场化。虽然新闻媒介能在事实上占有和使用其绝大部分经营收入，但这些收入的合法性仍然被 1978 年国家与新闻业之间缔结的隐性合约所限制。新闻媒介这种短期、非独立、脆弱的产权约定是 1999 年以后逐渐定型的国家经济软控制机制的根源。

为了让读者对中国新闻业市场化的实质有进一步了解，本文将以当今新闻媒介龙头——中央电视台为例，说明国家对新闻业的变相转移支付体制。之所以选取中央电视台为典型桉例，在于其在中国的核心地位以及中国新闻媒介市场化改革的高度同质性。前面已经详述，由于中国新闻媒介实行单位化管理，各行业、各媒介和各地区的财政方案基本类似。中央电视台与政府签订的经济合同方案，基本不仅为各地方广电机构所效彷，其合约实质也是全国各党报党刊相同或者类似的变体。此外，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超级航母，它拥有观众 10 亿以上，职员人数超过 1 万人，2007 年收入占据全国广播电视行业总收入的 1/6，足以代表整个中国新闻媒介市场化状况的基本面貌。

中央电视台与国家签订的核心契约，是财政包干。所谓的财政包干，就是与政府约定一定数目的财政拨款，在约定期限内不发生变化。财政拨款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家支付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工资，这部分数目较小；二是数目庞大的节目制作经费。国家下拨的节目经费完全来源于电视台自身经营收入——电视台将经营收入全部上交给国家后，由国家审批后再按双方包干协定的约定数目发还。也即所谓的“实行定收定支，以收抵支定额拨款，包干使用，减收超支不补，增收节馀留用”。根据约定，包干金额一定三年不变，每三年进行调整。例如 1991 年核定年收入 1 亿元，年度财政拨款 4500 万元。1994 年财政拨款改为 3500 万元，收入基数为 7. 5 亿元。1997 年上缴主管部门收入由定额上缴改为按收入比例上缴，上缴额度大增，广告收入按预算外管理，实行财政专户储蓄。

财政包干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在于它虽貌似让电视台经济独立的市场化改革，但仍然是一种变相的全额拨款制度。包干单位首先要完成一定数量的宣传任务，例如，电视台必须每年完成相当数量的播出时间、相当数量的播出栏目任务，然后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国家与电视台约定一个国家财政拨款的数目。因此，这种包干制度实质上是电视台与国家签订的一个

以任务完成为前提的短期合约。如果不完成任务，国家可以扣减其拨款。其次，国家给电视台的财政拨款全部来自电视台自行征收的广告收入。财政包干最有趣的在于其看似多此一举的广告收入流转过程，示意如下：

(1)广告收入→(2)工商局免税→(3)全部上缴财政部专户→(4)电视台打报告申请拨款→(5)财政部下拨与广告收入相等的事业经费。

其实，如果按照操作简便起见，国家不如干脆宣布广告收入完全由电视台自由支配即可。但国家宁愿麻烦绕一个大圈子，也仍然坚持保留转移支付的外壳。国家通过这种财政操作表明，广告收入性质属于国家委托电视台向社会代征的费用，而不是企业性质的市场创收。其适用法律框架属于政府征费的性质，其经济收入从法律上看仍然是国家拨款而不是企业收入，也没有所谓的《公司法》保障各新闻媒介的经营所得，主管部门可以随时对新闻媒介资产以行政命令调拨。通过财政包干制度的广告收入返还手法，国家完成了两个关系的认可：

（一） 电视业与国家的政治控制关系

电视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将是党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延伸宣传部门，必须无条件为统治者提供政治宣传服务，提供政治宣传任务而非提供公共服务是电视台最核心的功能。这种政治属性的后果之一，国家对电视台的控制是没有成本底线的。如果发生亏损，国家对电视台负有无限义务。从财政结构来看，沿袭至今的财政双轨制包括三个部分：广告收入、经营收入和财政补贴，即使地方广电机构同样如此。以上海电视台和东方电视台为例，虽然上海电视台和东方电视台是所谓的赢利大户，但依然享受着国家出于政治意义考虑的固定财政补贴。从 1991 年到 2000 年，两台共享受财政补贴近 1.5 亿元。这个款项为数不多，但由于其构成以人员工资总额与行政办公事业经费为主，已足可表明国家与电视台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权力关系。

国家对核心新闻媒介实行“全额拨款单位”的行政恩宠并非电视业的特权，在任何一家省级党报中都同样如此。例如，2005 年吉林日报集团和长春日报集团广告收入大幅度下滑后，分别向本级党委和政府争取财政支持。对人民日报、新华社这类核心媒介，国家更是不惜代价

维系这种政治控制。并非所有的新闻业都能有这种全额拨款的恩宠。国家根据对自身政权的重要程度，分别分配给新闻业各机构不同程度的行政恩宠。在这个政权核心圈内的，将获得高度的行政保护，例如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核心新闻机构，国家仍然延续了全额拨款的行政恩宠；在这个政权周边的新闻媒介，国家则随着行政级差而斟酌损益其恩宠。因此，只要国家经济在持续增长，广告收入对于那些核心新闻媒介来说永远属于不用担心失去的蛋糕，市场化是将这些媒介装进了一个保险箱而不是一个生死场。

（二） 电视业与国家的经济控制关系

新闻业的经济自主性越强，其对国家的政治依赖性反而越大。原因有二：(1)在财政包干的政治框架下，新闻业的资产增量都属于国家。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属于政府的转移支付，属性是费而不是税。这种转移支付来源于财政部、中宣部、广电总局之间的临时性约定，没有正式的法律制度支持。一旦停止财政包干制度，电视台将因丧失政策优惠而陷入困境。假设中央电视台改为公司制运行，仅仅支付在全国的信号落地费都足以令其破产。(2)新闻业所有资产存量都属于国家。即使电视台能稳定赢利，但在法律上资产可以随时被国家调拨，机构建制也可以随时被上级划转，产权地位非常不稳定，甚至比国有企业还要差得多。因此，电视台对国家的经济依赖貌似越来越小，但其经济自主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这种经济自主性与政治自主性的反向运动是中国新闻业在高度国有垄断结构下生存逻辑驱动下的一个显着特点。

综合这两层关系来看，财政包干制度的意义是在激励电视台经济自给与国家对电视台的政治控制二者之间维持一个脆弱的平衡。这种以经济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控制是中国新闻媒介的一大特色。

通过“自负盈亏”的财政包干政策及其变种(自收自支)和垄断经营这两大基本管理体系，国家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媒介经营制度，它利用国家独占的宣传资源向社会提供服务，并将收取的多种经营收入纳入国家财政拨款，成为宣传扩张的主要资金来源。这种体制从而被称作“一元体制，二元运作”(胡正荣，2003)

在“一元体制、二元运作”逻辑下，只要能挣钱而且不违反基本政治底线，新闻业市场化的步伐越来越大。例如，中央电视台于 1993 年尝试在《新闻联播》与《天气预报》之间的 1 分钟时间插播广告，最初还很担心会过于市场化而被国家禁止，但事实证明国家对此并不以为然，因为在财政包干制度下，新闻业的圈地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自身获利运动的一部分。国家一旦不担心发生政治控制危机，获利动机也随之产生——电视台的广告收入貌似商业活动，但在法律属于国家财政拨款性质，电视台赢利越多也意味着国家赢利越多，国家何乐而不为。到 1994 年进行黄金时间段广告招标，国家不仅没有禁止甚至反而表示肯定这种经验，表明国家与新闻业之间的官商式默契已经正式被国家认可。

在国家垄断经营媒介的制度前提下，传媒广告收入的增长全部落入了国家手中。从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的新闻业市场化改革给国家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新闻业是一个类似于石油、交通、通讯等国家垄断行业的高利润行业。国家逐渐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时代，包括商品资讯和其它资讯在内的公共资讯已经成为人们的基本消费品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它们不仅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而且为工商企业所必需。只要国家垄断新闻媒介这个公共资讯发布的唯一管道，就能通过向社会提供有偿服务，从而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周翼虎，2007)。只要操作得当，绝大多数新闻机构可自负盈亏而不需要国家更多的拨款。

在以上动力机制下，中国新闻业开始了其飞速扩张的过程。1978 年以来国家对新闻业的行政恩宠，为中国新闻业提供了一个几乎没有天敌的肥沃土壤。在国家长期垄断媒介市场、受众长期处于资讯饥渴的环境中，一个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广告收入日益增加的拓荒时期，新闻宣传作为产业的发展环境非常宽松，只要在话语实践上稍微有所突破的报纸和电视台都能迅速成名，并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特别在市场经济启动的早期，新闻媒介的数量还不很多，新闻业没有太大的市场压力，只存在挣多挣少的问题，不存在淘汰出局的问题。只要一个局部市场的平均利润不为零，就会有新的新闻媒介进入竞争。同时原有的新闻单位的沉淀成本基本由国家负担，只要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新闻机构就将继续维持运营。在利益驱动下，报纸、电视台和杂志越来越多，新闻媒介机构内部也在不断扩容，这些多样化的新闻媒介为市场经济的公众生活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选择。在国家驱动的市场化政策的打造下，一个由 890000 新闻记者、各级党报、电台和电视台组成的国家超级新闻工厂日益成型。

3. 从多赢走向零和博弈:残酷的新闻产业竞争

在简要回顾了中国自 1978 年以来市场化改革进程及其成就之后，本文还是要回到在开篇中提出的问题:产业化无疑使新闻业的经济自主性越来越强，但这种经济自主性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能转化为新闻从业人员追求其业务独立性？

在进一步分析国家驱动的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经济自主性将对 1999 年后的中国“国家-新闻业”关系造成何种影响之前，我们需要假设一个中性的新闻媒介——绝大多数新闻从业人员既不是国家忠实的宣传代理人，也不是热烈追求新闻自由的民主斗士，他们既乐于(而非坚定)追求业务自主权的职业伦理，同时也非常看重自身的物质生存条件，换言之，他们是一群机会主义者，在职业伦理和物质条件中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

在一个自利的新闻记者的假设下，是否追求取更多的政治自主性，取决于新闻业对一个可能发生的自主空间的预期。从中西方新闻业历史经验来看，绝大多数市场化媒体都是普遍保守的，只有少数媒体出现过激进的政治现象。只有当商业活动能扩展出一个比政府更强大的公共空间时，新闻媒体才可能积极追求业务自主权，并成为分离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在这种假设下，国家驱动的市场化改革对新闻业施加的约束强弱，直接决定了中国新闻媒介的行动策略。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由于国家对新闻业的单位化管理和审批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新闻业市场化所孕育出的只是一个立足于垄断经营基础上的、供求机制不对称的、不断自我深化的官商经济。中国各新闻媒介在争夺广告市场的激励下为国民创造出海量资讯，但这些海量资讯没有催生出拉美国家的瓦解机制，相反却在 1990 年代末期产生了结构性拐点，成为进一步促进新闻业走向政治依赖的催化剂。下面，本文将结合新闻业发展史实描述这个过程。

前面已经叙述，市场经济的总量增长、国家对新闻业的行政恩宠、新闻业的差异性竞争，使中国新闻业在 1990 年代在一片过于肥沃的土壤上疯狂生长，规模、种类达到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传媒业总体的平均利润开始下降，市场经济的自然淘汰规律发挥作用。1999 年后，国家正式出台了全国各新闻媒介在 3 年内全部转为“自负盈亏”的产业政策，从而将新闻媒介全面推向市场。随着产业化政策的全面推行，一个丛林时代开始悄悄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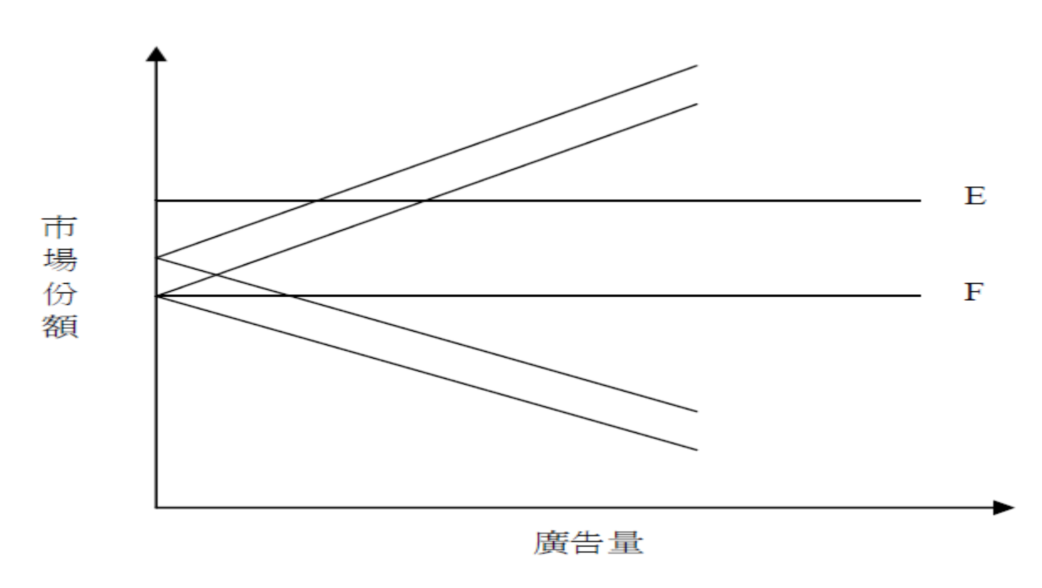
在 1990 年代末期以前，新闻业之间的竞争特点是多赢。虽然新闻业之间存在竞争，但这种竞争有效地促进了新闻内容和种类的多样化，从而国家、新闻业和公众三方都获得了帕累托改进。媒体经营收入的 75%-95%来源于广告经营收入。新闻业依靠自我资金积累的方式进入高速扩张期。

但 1999 年以来，新闻媒介的市场环境已经变得非常恶劣。仅仅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达三千多个电视频道(含市、县台)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中国电视业的竞争是多么残酷。如果将电视业广告 300 亿元的收入平均到每个频道，每个频道才 100 万元的利润。

在报业，一线大城市如北京的市场开发度已经接近饱和状态。2004 年，北京报业市场标准订户与总容量之比即开发度达到了 91%，只有 14 万户的增长空间，现有广告总额已占理想总容量的 85%。虽然中西部地区报纸容量还有巨大上升空间，但中国包括京广线以东的东部沿海地区报纸普及率已经超过 40%，达到中度饱和（叶文平，2004）。

如此众多的报纸，已经谈不到什么差异化竞争，新闻业的内容结构和新闻源高度趋同，为了最大限度争取广告收入，原先以差异性为主要竞争策略的电视频道与报纸无一例外地往综合性方向发展，取而代之的是惨烈的价格战和其它综合性的战争。2005 年在西部地区，报业普遍亏损。在东部地区，残酷的竞争已经使大多数报纸处于半死不活的临界状态。从全国形势看，虽然有些省报(报业集团)拥有数家子报子刊，但整个省报收入的 80%以上往往又依赖于其中一两张子报的支撑。全国规模最大的新闻媒体——中央电视台 90%的广告收入来源于第一套节目的广告，而当时全台已经建立了 12 个频道，这些频道普遍赢利不多甚至有大量亏损。整体来说，整个新闻业的生存环境已经相当不乐观。

更糟糕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坏的开始。根据西方新闻业“一城一报”的发展趋势，报业竞争将朝更加惨烈的寡头竞争和垄断方向发展。美国报业中只有少数城市如芝加哥拥有两家大报纸。这种形势在中国已经若隐若现。2003 年全国 2000 家报纸，230 亿元广告收入，前 20 名报纸占 94 亿元，1%的报纸广告收入占整个报业广告收入的 40%。即使在前面几家的报纸也将面临“赢家通吃”机制的威胁。赢家通吃时指这样一种机制:当同一市场中有不只一家新闻媒介存在时，大量广告会不成比例地向前面几家报纸甚至第一家报纸倾斜，即使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发行量差距非常小。



圖一：贏家通吃機制示意圖

该图的纵轴为市场份额，横轴为广告量。第一条横线 E 为主导报纸的市场份额，第二条横线 F 为第二位报纸的市场份额。当两家报纸发行量相等时，这两条横线重合。当发行量存在差异时，主导报纸的广告收入将会一路上扬，而第二位报纸的广告收入将会向下倾斜，显示其发行数量不成比例的广告数量。发行量只会呈现算术级增减，而广告量对此作出几何级反应。强势报纸发行成本较低而高比例的广告收入，而弱势报纸则必须以高发行收入成本争取较低的广告收入。

在一个“赢家通吃”的竞争时代，为了争夺注意力，大量的广告不会按比例地分配给各家报纸，在极端情况下，即使发行量第一位的媒介与第二位的媒介发行量实际相差不大，但广告商也倾向于往冠军媒介而非亚军媒介上投入最大数量的广告。因此，一份报纸必须向市场领头羊发起挑战，否则最终将出局或者处于一种不可逆转的永远差距地位。广告市场集中度越大，竞争成本就越高。当市场集中度达到 80%以上时，领头羊的地位将牢固确立，对其发起挑战的成功机会也就越小(黎明洁，2004；叶文平，2004)。这种赢家通吃的机制虽然不完全与中国新闻业市场相吻合，但基本上描绘出一个事实:随着一个日益统一的媒介市场开始形成，新闻



业的主要战场已经不是国家与新闻业争夺业务自主权的政治博弈，而是新闻业内部为争夺生存权的市场竞争。大量新闻媒介处于维持性财政的局面，而少数强势媒体为了争夺市场霸权而开展了越来越惨烈的竞争。2003 年进入市场的《京华时报》（吴海民，2004:292）如是描述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新闻业市场竞争形势：

目前各家报纸关于自身发行量的公开发布，几乎都夸大了一倍，几倍，甚至十几倍。而在谎言的背后，是一个无情的、冷峻的市场，这个市场的胃口并不算大，任何超出其消化能力的报纸供应，都会被本能地吐出来，化为废纸一堆。我们面对的客观事实是，各家报纸是在一个既定的、稳定的乃至固定的市场的有限范围内进行竞争的，这种竞争不存在共存共荣，只能是此消彼长，非此即彼，你死我活。

这种“你死我活”的生存之战从两方面对国家与新闻业关系造成了影响。一是竞争压力的驱动，导致新闻业试图向社会资本借力，以战胜其它竞争对手；一是国家成为这场新闻业内部惨烈厮杀中的最大赢家。

在这个突然现形的媒介争霸时代，各新闻媒体为了保住原来的市场分额，夺取新的市场分额，不得不扩张规模，更新设备，引进人才，先后进入一个新的资金投入期。新闻媒体普遍面临着发展资金不足的困难，强烈需求新的资金投入模式。从 1979 到 1999 年，中国新闻媒介都是依赖广告完成自我积累、滚动发展的模式。由于新闻业的政治特殊性，国家严格禁止新闻业从外部寻找资金。这种扩张模式虽然促进了新闻业的繁荣，但随着各新闻机构的资金压力越来越大，原有的资金积累管道已经完全不够。

例如，在 1990 年代早期，新闻业的进入成本相对非常低。例如，1993 年创办的《精品购物指南》报启动资金仅仅为 50 万元，不过 2、3 年就成为发行量和影响力都位居第一的北京生活服务类刊物；1998 年创办的《北京晨报》启动资金为 1500 万元，不到两年就进入了北京地区都市媒体的前三名。而到 2004 年《人民日报》办子报《京华时报》时发现，进入都市报市场的资金门槛至少为 4000 万元。人力成本、发行成本、工作场所、印刷成本以及竞争无形成本的剧烈上涨，都使新闻业依靠自身广告收入的发展模式撞到了体制天花板。

当原有的自我资金积累方式已经不足以为更大规模的竞争提供动力时，寻求更密集的资金投入成为新闻业之间的竞争策略。各新闻机构迫切需要打通新的资金积累管道来争夺媒介内部

的霸权。新闻机构渴望从体制外部获得新的资金，原先自我积累资金的方式开始向资本竞争的方式转变。

但社会资本进入新闻业存在体制上的禁区。对于那些已经进入体制内的社会资本，国家通过《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发生的判例确定了中国媒体所有权的根本性准则。《精品购物指南》作为一份 50 万元个人投资的小报，在创办之初创办人与主管单位私下约定为挂靠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这份报纸引起了创办人和主管单位的产权争端:创办人试图援引国有企业改革中集体企业 1999 年后风起云涌的“摘红帽子判例”，但 1999 年 9 月 27 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新闻出版署和财政部关于《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报社产权争议的批复中清晰地指出:“中国的报刊均为全民所有制单位。……报社创办时，如有个人、集体自筹资金的，不能认定为对报刊的投资，应按债权债务关系或者赠予来处理，由主办单位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退还。”“收、转、退”的政策这种“按借贷或者赠予来认定”的办法，即由国内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将这部分资金以收购的方式收回；或将这部分资金转让给符合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事业单位；或由外资及私人资本采取其它方式主动退出这一领域(周松林，2002)，使得市场力量不能强有力地影响到新闻媒介的基本制度。甚至可以反过来说，通过这一判例，已经将社会资本的力量对新闻媒介的影响几乎消灭殆尽。虽然还存在大量甘愿冒着高风险品尝禁果的民间资本，但对于这些侥幸进入各级新闻媒介的社会资本，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监控，一旦发现政治问题，就立即加以惩处。因此在政治压力下，进入体制边缘的民营资本会为了经济利益而主动规避政策风险，他们进入新闻业不但没有加强争取业务自主权的力量，反而对国家更加驯服。

在新闻业与资本的短暂恋爱结束之后，国家开始毫无争议地成为操纵新闻业“生存还是死亡”戏剧的主角。例如，国家至少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直接控制新闻业经济秩序的升降。

第一，国家可以允许新闻业将其广告业务、发行业务和印刷业务包装，借壳上市获得海量的资金。例如主办《中国电脑报》的赛迪集团，湖南广电传媒和中央电视台的无锡影视基地等。上市公司圈钱的效率显然要大大高于广告收入的积累。如果没有国家的行政恩宠，这些新闻机构将绝无可能如此轻易地获得数十亿的巨额资本，只有那些政治表现非常积极的新闻媒介才能获得这种特殊经济机遇。



第二，国家可以通过行政整顿将大批优质资源和新业务成建制、一揽子地划入新闻机构，例如各省成立的报业集团和广播电视集团。同样只有政治可靠的新闻媒介才能获得如此待遇，例如以党报为核心的各报业集团和报社免费获得了大量刊号，它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在市场竞争条件下需要无数轮厮杀才能完成的兼并任务，为进一步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第三，国家可以将最优质的新闻资源和传播管道无条件配置给那些对其政权稳固关系最密切的新闻媒介。例如最重要的报纸、电视台、电台都能获得优质新闻的第一落点、新闻管道的强制性传播。从而使最核心新闻媒介在内容的差异性竞争上占尽优势。这种原则一般是:如果中央级媒介与地方媒介有冲突，则中央级媒介优先；如果同等媒介之间发生冲突，则根据对国家政权的重要性进行调节。

这种政治恩宠与经济收益正相关的现象在电视业最为明显。中国电视业的广告收入结构存在一个与行政级别有密切关系的现象:根据作者统计，国家电视台广告收入与排名前 10 的省级电视台广告收入相差在 10 倍以上，如果考虑到全国省级电视台的广告平均收入，中央电视台与地方电视台的平均收入差距将更大。省级电视台平均广告收入又比下一级电视台高出 10 倍以上。这种行政级别越高的电视台广告收入越高的现象，与经营能力没有必然联系。由于不同行政级别的电视台覆盖的区域范围和观众数量不同，对广告的吸引能力不同。这种由于行政级别差异而产生的级差收入格局已经基本定型。

这种经济收入与行政恩宠正相关的关系表明:在一个不可动摇的政治框架下，原先认为曾经具有挑战国家政治权力机会的经济权力已经完全被边缘化，成为国家的驯服工具。随着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大，国家与新闻业关系的主要矛盾已经逐渐从业务自主权的争夺转向新闻业内部的生存斗争。在激烈竞争的形势下，依靠国家行政恩惠要远比任何公平竞争的道德都具有诱惑力和说服力。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各新闻机构开始自觉地依附其直接主管的部门，这直接促成了国家霸权话语的形成。

从 1990 年代末期开始，国家越来越娴熟地掌握了根据政治表现赐与经济机遇的手段。在报业，行政摊派仍然是最重要的创收手段。各地党报稳定刚性的发行量依然不能为任何市场力量所撼动。不仅如此，国家还动用行政力量将组织资源向高行政级别的新闻媒介集中。1996 年由新闻出版署牵头的报业集团改革，依托党报为龙头将分散的新闻机构改造成大规模经济实体。在 1997 年的广电业和报业大整顿中，国家将四级办电视、四级办报纸改为两级办电视，



三级办报纸。在此之前，各地依靠自有资金发展起来的广播电视台被取缔，转为转播中央和省级电视节目的转播台。全国电视台顿时由 4000 多各电视台减少到不到 400 个。各地报纸同样如此。大量刊号被取缔或转移到报社或报业集团。例如，2003 年国家规定国家厅局级机关不得创办报纸，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导向屡屡出现错误”、经济效益极差的《中国引进时报》被划归到《人民日报》下，作为该报宣传序列的一支被改名为《京华时报》。在此之前由于国家刊号管制，刊号这种稀缺资源的获取成本太高，因此限制了报业的扩张，而现在数百个刊号被国家无偿划转给各大报社或报业集团，岂不喜出望外。这种行政整顿将有限的管道资源进一步向行政背景强大的新闻媒介集中。

在内容上，优质的新闻资源也是“就高不就低”，首先配备给更高行政级别的新闻机构。世界杯、奥运会、两会、神州飞船发射、伊拉克战争、海湾战争等最优质的新闻资源都由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命令各地电视台不得转播，中央电视台独家转播，这种新闻资源的垄断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例如神州五号的发射转播为中央电视台带来了 6 个亿的广告收入。人所共知的春节文艺晚会也是必须由中央电视台独家创办。报纸对各类事件报导的规格也有严格的规定。不同级别的报纸记者享受到的新闻资源是完全不同的。

在广电新闻业，尽管国家不能控制观众用脚投票的行为，但国家可以用行政命令让地方转播和不转播特定电视节目以影响收视率。例如，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主要来源于中央一套，中央一套广告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新闻联播》与《天气预报》之间的 1 分钟广告收入。为了保证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国家不仅三令五申全国各地必须无条件转播中央台一套节目，而且禁止任何其它电视台在中央电视台的这 1 分钟区间插播自己拉来的广告，违规者将予以严厉行政惩戒。各级电视台同样照此办理:省电视台在省政府的支持下，要求下属各地无条件转播其全省节目，对其黄金时间段的节目中插播的商业性广告同样严格保护。

为了让各级党报更好地生存，国家还允许党报在正报之外，创办娱乐性、市民性更强的都市报。1990 年代市民报群、娱乐电视节目的崛起，背后都有行政背景的强力支持。虽然 1990 年代中期市场导向的报纸和电视栏目数量在急剧增加，但基本上都是依托于强有力的部门，是各级党委、政府出于牟利冲动而在市场圈钱的产物。例如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北京台《超级模彷秀》、中央电视台《幸运 52》、《非常 6+1》以及一系列娱乐节目和娱乐频道和以《南方都市报》、《华商报》、《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大河报》、《京华时报》为代

表的市民报纸其实都是党报、电视台母体的提款机。所谓“市场化运作”的都市报、生活报也基本由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创办的，是在“政治导向金不换”的前提下，由于党报无法大量创收而对党报的一种替代。各个市场化的报纸仍然是归属于各级党报，它们在人事和财务上实际上必须绝对服从党报机关。新闻业不断增加的娱乐体育影视内容的背后，都必须从背后强大的政治资源中寻求保护伞。即使以舆论监督大本营《南方周末》为例，该报纸批评政府的边界始终掌控在地方党委所能容忍的限度，而且绝对不能批评本地党委及政府，恰恰是一个从反面证明国家强大控制力的绝佳例子。

在这种以经济形式体现出来的政治控制框架下，市场化只能使新闻产业的资源加速向各级权力部门集中。1980 年代新闻业曾经出现的地方化、社会化发展趋势被逐渐遏止，在 1990 年代越来越向集权化发展。在逐利目标的驱动下，拥有权力背景的新闻媒介总是倾向于朝距离最短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依托主管行政部门的权力获得管道传播、新闻资源的再分配特权。各级新闻单位依托主管单位的行政权力，争夺传播管道、优质新闻资源和其它无形利益。

在新闻市场化竞争过程中，传播管道资源、政治影响力资源、广告收入资源越来越向少数具有政治背景的权力部门集中，而那些丧失权力支持的新闻机构在进一步被边缘化。只有那些在权力格局不断被边缘化的报纸，例如其主管部门在改革进程中被改组或丧失其政治功能，才真正要到市场上去自负盈亏。对于那些政治背景不够雄厚的小报来说，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们以《人民日报》的一份子报《京华时报》为例来说明。《京华时报》作为一份与北大青鸟合办的报纸，属于在工商局注册的自负盈亏的企业。因此，它没有《人民日报》多数子报的政治背景，不能依靠红头档强制发行，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生存。它虽然在市场上以“你死我活”的凶狠拼抢策略着称，但是在谈到政府管制时却完全换上了恭顺异常的面孔：积极争取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新闻出版局及各城区的理解和支持，是我们创办一张面向北京的地域化报纸的重要生存条件。创办之初，我们主动到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汇报工作，诚恳接受领导和协调，还将城八区宣传部门负责同志请到报社来进行恳谈。……当我们在政治上获得某种关爱和理解的时候，就说明，我们拥有可以调动的政治资源。当我们得到管理机关某种政策支持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具有优于竞争对手的宽松环境。当我们与有关方面维护着一条畅通的资讯管道，即使有时仅仅得到一条资讯，也意味着我们可能具有比竞争对手更为灵敏的反应能力，可能会在竞争中获得先机(吴海民，2004:231-232)。



从以上可以看出，市场化的新闻媒介的生存策略是非常清晰的:在市场上依靠内容差异化竞争，但是在政治上保持最大限度的恭顺以避免遭受打击。新闻业最初以市场的名义打“擦边球”获得政治声望和专业成就的努力，也获得了相当的经济利益。但是在丰厚经济利益导致同业竞争威胁到自身生存时，新闻业对政府的态度也急剧转变，甚至保持对政府的恭顺以规避竞争风险就成为从业第一要务。不管是市场化的新闻媒介和党的核心新闻媒介，都是如此。在一个国家合法性随着经济绩效日益增进的时代，市场上少了一份报纸并不会影响到大众的生活，却会对依靠该报纸为生的新闻记者造成毁灭性打击。这种生存逻辑促使整个新闻业朝功利主义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国家力量的崛起和生存逻辑的凸显局势下，新闻记者作为政治群体的力量进一步衰落，最终为新闻走向自觉为国家服务一棰定音。

五、结语:经济结构转型视角下的国家与新闻业关系

行文至此，本文已经完整地描述了 1978 年来市场化政策带来的自主空间或对自主空间的预期始终被国家所压扁的历史进程，最终导致新闻业全面与国家合作的动力机制。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强大的、不可逆转的动力机制不是由国家惯常使用的组织人事和内容审查等“硬”控制手段、而是由原先国家始终担心可能导致意识形态失控的市场化政策来完成的。

本文用“经济软控制”这一概念来描述国家驱动的市场化政策影响当代国家与新闻业关系的根本机制。经济软控制的基本原理是，只要新闻资源的进出管道还掌握在国家手中，这种局面将不会因话语形态和政治动员结构的改变而改变。虽然经过 30 年的财政双轨制改革，中国新闻产业已经将绝大部分资源运作放在体外进行循环，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新闻从业人员 60%以上是市场配置方式而不是计画方式管理，国家财政拨款在各新闻单位收入结构中也退缩到一个完全微不足道的象征性比例，但这个巨大躯体的头颅仍然牢牢地长在一个旧体制中。这个体制外的“躯体”完全依靠体制内的“口腔”(即资源进出管道)获得一切养料，从而“头颅”通过控制“口腔”而有效地指挥了一个庞大的躯体。换言之，形成国家话语霸权的最基本动力在于 1990 年代加速实施的产业化政策，它与中国特有的政治结构结合在一起，使国家力量不断强大，而新闻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却在不断削弱，最终国家通过控制传播管道和调配优质新闻资源强势地打败了新闻业。

本文将“经济软控制”形成的转捩点定在 1999 年。这个分期出于两个理由:一是 1998 年政府体制改革启动后，新闻业被正式要求自负盈亏，如何在一个逐渐拥挤的市场上养活自己的生存逻辑成为新闻业整个记者队伍最重要的动机。一是 1999 年《精品购物指南》产权桉明确了社会资本禁入新闻业核心业务的判例。这两个事件表明，国家通过行政强权最终排除了任何使新闻业脱离国家控制的因素，使生存逻辑成为最终驯服新闻业、使其与国家结成基于经济利益的互惠默契的决定性动机。

在本文开篇提出的两种观点之间的论争中，本文更倾向于认为新闻业产业化虽然在第一阶段可能使新闻记者群体变得更为激进，但在第二阶段最终导致中国新闻记者群体更趋于保守。事实上，现代化理论和批判理论可能都是对的，但它们都只猜对了中国 1978 年以来新闻媒介产业化进程下国家-新闻业关系演变的一面。

正如现代化理论所观察到的，从 1980 年代初期到 1990 年代中期，中国新闻媒介的产业化第一阶段确实对国家调控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虽然建国以来国家对新闻媒介一直保持了强有力的组织控制和话语控制，但经济控制状况却在 1980 年代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新闻媒介逐步拥有了相对较多的经济自主权，尽管政治话语还是被刚性地压制，但借助于市场话语和大众话语，新闻记者可以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与国家讨价还价，也就是各类“擦边球”活动。

但也如批判理论所言，新闻媒介产业化的第二阶段的直接后果，是在 1990 年代后期国家直接增强了对新闻媒介的经济控制能力。新闻体制的产业化改革使新闻业以高于 GDP 增幅的超高速发展，但同时在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开始遭遇笔者称为“市场化陷阱”的体制瓶颈。当新闻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个更为灵活的资本和组织重组法则，必然产生与国家对新闻业的单位化管理体制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由于单位制度的不可动摇性，新闻业的市场化反而逆向强化了国家的权威。由于控制了新闻单位的人事和财政大权，国家始终能够得心应手地将新闻业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保险箱。国家还鼓励新闻业通过向社会出租新闻机构所占有的传播平台换取广告收入谋求发展。这个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保险箱既造就了新闻业超高速发展的奇迹，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地导致新闻业只能在原来的保险箱内进行类似于黄宗智(2000)提出的“内卷式发展”:由于新闻媒介的数量只增加而不减少，也无法借助市场竞争来消灭部分媒介，因此随着新闻业生存空间的日益狭窄，市场开始由最初的多赢式竞争转变为零和竞争。

在这种形势下，新闻业全力转向为口腹而展开的内部竞争，在拉美等国家曾经对集体行动推波助澜的“海量资讯机制”在中国却成为牵制新闻媒介发挥其独立性的保守机制:市场化的新闻业虽然生产出了前所未有的海量资讯，但这些海量资讯背后却是国家支配下的残酷市场竞争。不断深化的产业化改革使中国新闻记者群体陷入了一个生存陷阱。为了在竞争中获取更多资金和行政支持，新闻业毫无悬念地全面倒向了国家，竞相依靠政治表现来获取国家的行政恩宠。虽然中国新闻业仍然存在各种擦边球形式的反控制活动，但国家从总体上牢固地掌握着中国新闻业改革主导权和进程，新闻业对国家的批评性报导越来越少。市场化在初期确实为新闻业带来了一定的业务自主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进一步增强了威权国家在新闻业的影响力。

一九九八年，何舟根据《深圳特区报》的个桉调查，推论出中国新闻媒介已经演化成一个“党的公关公司”，并认为中国新闻业处于政治与市场的拔河角力赛。十年过去，事实日益清楚地表明，媒介的经济自由并不必然带来政治自由。在国家权力的政治经济双重操作下，新闻业的市场化生存其实类似于“笼中鸟”而不是平等的拔河对手，“推与拉的战争”实际上只是一种对“市场经济下公共领域演化”进程的想象。作为知识份子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记者精神世界的悄然转向也从一个侧面暗示了大陆知识份子从理想主义向功利主义的蜕变。

一个曾经被新闻专业主义者寄予厚望的市场机制，在当代中国传媒领域却意外演化为中国新闻记者与国家紧密结盟的动力机制。这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只有回到作为国家政治喉舌的新闻业这个基本点来，才能真正看清中国新闻业市场化改革的初始动机和 30 年来的发展路径。本文虽然探讨了国家权力与媒介经济利益的密不可分性质以及基本传导路径，并在经济结构转型的框架下建立一个中国新闻业的当代总体图景，但由于资料的缺乏，对分区域、分类型的量化资料积累还远远不够，可以说，市场化与国家权力租金关系研究才刚刚起步。中国当代新闻媒介市场化悖论的根源在于，市场仅仅是一个中性的资源配置结构，它对民主的促进功能取决于谁在使用市场。在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十字路口，对“市场”解神化(de-myth)的理论要求也势在必行。随着研究的深入，本文作者越来越意识到用专业主义、自由主义逻辑来解释中国新闻体制演化路径的困难，也意识到中国作为强国家历史传统下操纵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其它机制的强大力量。本文相信，经济的背后始终是政治博弈的延伸。“经济软控制”，就是对中国新闻媒介当代生态的一个注解。



（周翼虎，社会学博士，长期从事传媒工作。本文原载于《新闻学研究》第一〇〇期，2009 年 7 月，原文链接：http://mcr.nccu.edu.tw/0100_pdf/100-3.pdf。）

【返回目录】



【果】

9-5 钱钢：中国传媒的发展路向



“改变受到控制，控制却正在改变，我们在控制底下改变，也发现控制出现了改变，控制与松动其实是同时存在。”

注：本文是作者 2007 年在台湾大学演讲的整理稿。

壹、 前言

大约五年以前，中共十六大召开，召开以后，《亚洲周刊》认为中国媒体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个专题:“中国媒体新轨道”。它指出在十六大以后，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三个贴近”: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此一迹象显示媒体将有所不同。不过没多久，《亚洲周刊》又做了一个专题:“广州媒体的冬天，《南方都市报》被整肃过程揭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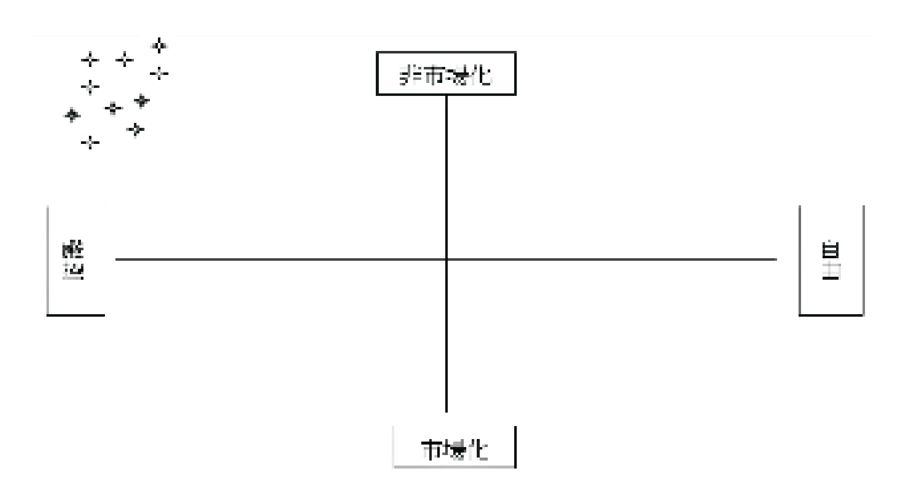
我们在给香港同学上有关中国传媒的课程时，曾请他们用纸笔写下来对中国传媒印象的三个词，出现最多的就是:“控制、欺骗、乏味、大话。”但近三年，我也看到一些同学们常写到“变化”。

何清涟曾替美国民主基金会所写《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此书更详细的版本就是台湾出版的《雾锁中国》，资料很丰富，但此书表述认为，中国“媒体”只不过是政府的宣传工具。但我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观察中国传媒各种报刊、周刊，可以看到各种矿难、股市、暴力、杀人凶手、性，会发现中国传媒并不都是“工具”。当然，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宣传功能无疑是存在的，但未必每个媒体都是工具。

我希望用三个词，来描绘中国的传媒:即英文的“3C”:Control、Change、Chaos(控制、改变、混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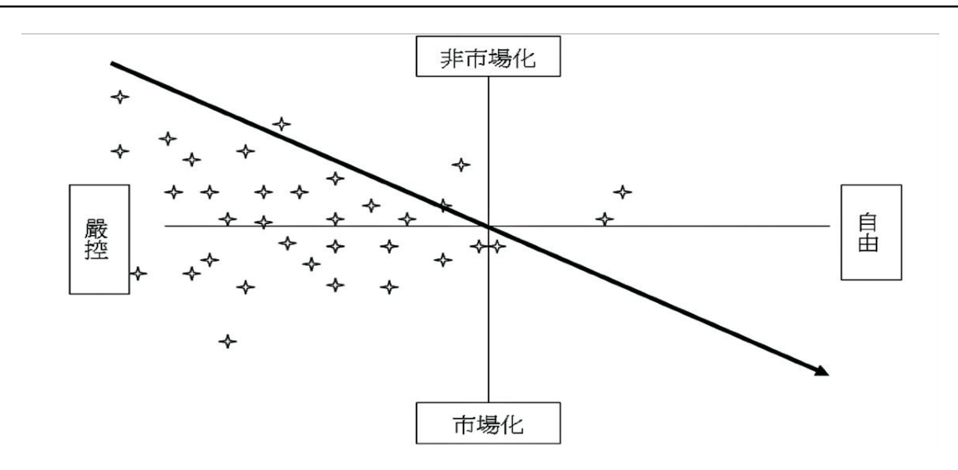
这与何清涟女士又有什么不同?“控制”与何清涟相同，但“改变”是我要多加着墨的，我认为由变到改，在又控制又改变的情况下，中国传媒产生了混沌的状态，这里的意思不是混乱，而是迷蒙的、不易看清的。在美国有一个新的学科:“混沌学说”，认为在不易看清的表象背后有着隐藏的规律(“有序装扮成随机”)。例如台风就是一个混沌现象，科学家要准确预测台风路径，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我用以下这个“传媒星空图”来解释中国传媒的演变:横轴是从严控到自由，纵轴是从非市场化到市场化。第一幅图示意文革结束时的状况:中国传媒很少，而且集中在非市场化和严控这侧。



第二幅图示意最近三十年来传媒的变动，总的趋势，中国媒体由非商业移动至市场化，从严控移动至自由。从非商业转变至商业的速度快，从严控到自由转变的速度却是很慢的，但仍然是在移动。另外，重要的是，中国传媒数量增加很多。总的来看，在传媒星空图上我们发现中国传媒从左上到右下移动。





如果我们看《人民日报》的版面，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传媒已发生很大变化，但是三十年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那种样式、腔调，今天还是存在的。例如《人民日报》上的常委照片，拍摄角度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握手、一样的常委，可以说是："几多常委，几多握手"，《人民日报》头版是政治局常委的包厢。

不过，除了党的机关报外，许多具有商业性的、独立意识较强的媒体，在报纸风格上有了很大不同。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此处所说的独立意识或商业性较强，并不是说它们没有党报的属性特点，大陆的媒体基本上都是党的系统里的一员，例如《南方都市报》，虽然重视读者市场，但仍受党政管制；它也不会遗漏党政重要的新闻，但版面已有点苹果化了。

对于某些地方开明的官员来说，党报刊登过多政治要员握手领导的活动，是感到羞耻的，例如《中国青年报》曾将"重庆地方领导为群众腾出党报一版"，列为今年的重大新闻。以赵紫阳逝世的新闻为例，中国大陆所有报纸，只有《南方都市报》敢放在头版，虽然只有小小一块，但已经是挑战敏感的边缘了(《人民日报》放在第四版气象报导的旁边)。相对而言，香港的《苹果日报》，则是以头版头条、大型照片表达人民的声音，这当然是因为香港一国两制，保留了新闻自由的空间。当《人民日报》仅以规定动作刊登纪念胡耀邦的新闻时，《南方都市报》虽然也选刊了新华社的枯燥照片，但却特意放大并大胆地摆在头版头，几乎放了半版。可说是"此时无声听惊雷。"是在"规定动作"限制中，作出"自选动作"的艰难挑战。

我们可以比较大陆《北京青年报》和香港《东方日报》2003 年对歌星梅艳芳去世事件的新闻处理。中国大陆与香港传媒出现相似的地方，两个报纸使用的头版照片是相同的，这十分有趣。然而它们仍有微小的区别，《北京青年报》在照片的上方仍放了与党政有关的新闻(胡

锦涛的谈话)，但位置很小，显示其兼具市场化和党报的正确性。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中国媒体的变化。

贰、Control:当然，控制仍是不言而喻的

SARS(非典)疫情被隐瞒了一个多月，刚开始有一点点报导，但很快被压制。在 SARS 疫情最重的时候，医院中有许多 SARS 病人，市民都不来医院看病；医院便贴上告示“目前一切安全，没有疫情，欢迎大家看病。”卫生部长在北京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看到外国记者戴着口罩访问，便说:“我们北京是安全的，口罩戴不戴都可以。”为了证明 SARS 并不严重，广州邀请外国足球队来比赛，巴西的领队在球场看到有部份人戴口罩，好奇地问中国官员怎么回事，官员急中生智回答说:“戴口罩的，是你们的支持者，没戴的则是我们的。”连罗大佑都被骗来广州开演唱会，事后罗愤怒谴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简直拿观众的生命开玩笑。

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中国媒体有关 SARS 的报导，在 2003 年 2 月中较多，但随即就减少了。在最危险、媒体最应该发挥效用的时候，却被压制。《南方都市报》曾想做关于 SARS 特别报导，然而消息传回北京，正在参加全国人大的省委书记大怒，记者被调走。当时国际间发生伊拉克战争，媒体便转移焦点至伊战，大幅报导。也就是说，中国媒体不能报导跟人民切身相关的 SARS 新闻，反而对美伊战争大说特说。一直到了四月，医生蒋彦永发表声明，才使得媒体回过头来报导疫情，官方才正式面对 SARS 问题。四月中旬，温家宝表示要惩罚隐瞒真相的高官(包括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四月二十号开始才看到媒体展开铺天盖地的报导，《财经杂志》表现更是亮眼，它本为双周刊，为了报导 SARS，临时改为单周发行，详细地报导了 SARS 的各种相关事件。

中国的新闻自由受到党的控制是明显的，可以说是一种“奉旨自由”。党究竟要媒体作什么呢?

一、政令传达、政策阐释。

二、政绩宣传、形象美化。

三、价值固化、行为喝止。



党对媒体明显的制度性控制，通俗地说则有“四证”：

一、准生证，批准媒体创办。

二、记者证，控制个人身分。

三、委任状，任免各级主管，尤其是总编辑

四、死亡证，下令关闭媒体。

对媒体的机动性控制则有：

一、打招呼，事前防范。

二、通气会，每日督导。

三、阅评件，日日监控。

四、宣传战，统发共见，统一发稿共见报。

据我的媒体朋友告知，目前媒体不得公开批评的项目有：军队、武警、公安的相关事件。民族、宗教、西藏、新疆等敏感问题。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突发事件。金融证券相关，会影响国家经济稳定与经济安全，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问题。未经公开报导，地方或部门已经依法处理、妥善解决的孤立事件及个别问题。涉及农村征地、城镇拆迁、水库移民、国有企业转制人员安置、企业军转干部安置、大宗商品对外贸易等，以及重大群体性事件、敏感桉件。

参、Change：小报大报调不同

虽然媒体均受控制，但是标准的中央大报和商业属性的都市报仍然是不同的。2006 年我做了有关“唐山地震”报导的话语分析研究，比较大报小报的用词差异，大报使用较多的是：感谢党、社会主义、公而忘私、科学发展等；小报则报导较多的寻亲、解放军、民间等词汇；需要说明的是：“解放军”在中国来说倒不是一个太负面的词。

另外，我们可以从一天的报纸来比较中国传媒的表现：2004 年 10 月 22 日这天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



新闻一:河南发生重大矿难，胡温命令抢救。

新闻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胡锦涛主持关于“先进性教育”。

首先是《人民日报》，事实情况是，先进性教育仍是头版头，矿难放在版眼，报导着重“千方百计抢救”，但刊登的照片是祥和的非矿难照片。《河南日报》作为地方官报，做法跟《人民日报》相似，照片是抢救矿难时，官员勘查的情况。两者大同小异，党的新闻摆在头条，矿难摆在二条，新闻的重点都是官员对于灾难的关注与重视。

《大河报》是《河南日报》的子报，偏向市场化，处理方式则是没登先进性教育，但摆放官员关心的照片。《北京青年报》处理方式和梅艳芳逝世新闻处理方式类似，摆放大张矿难抢救照片，头版头仍是先进性教育，但是版面小许多。

《南方都市报》跟《新京报》则都直接以矿难为头版，不摆先进性教育，特别的是《南方都市报》的照片是救灾人员将死伤者以担架抬出；《新京报》则是刊登了死者活着时的证件照片，我个人认为在新闻张力上，新京报的照片选择是较有品味跟影响的。

以上讨论可参考下表:

	先进性教育	河南矿难	照片	使用辞语
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	二条	祥和的非矿难照片。	“千方百计抢救”。
河南日报(地方官报)	头版头条	二条	照片是抢救矿难时，官员勘查的情况。	胡锦涛温家宝“高度重视″。
大河报(河南日报的子报；偏向市场化)	无	头条	摆放官员关心的照片。	千方百计抢救。
北京青年报	头版头条(但版面小许多)	二条(大得多)	大张矿难抢救照片。	发生特大瓦斯爆炸
南方都市报	无	头版头	照片是救灾人员将死伤者以担架抬出。	河南特大矿难，62人死亡86人失踪。



新京报	无	头版头	刊登了死者活着时的证件照片。	河南特大矿难62人死。

至于死伤人数是否由新华社统一公布?是的，并且在矿难发生后一天天逐渐追加。基本上各报的报导在方式上都是没有违规的；但是，不同类型媒体的总编辑则善于把新华社统发稿作最大的不同编排方式，做到最适于报纸属性，而不是只循着政府的角度走。

我们进一步来谈中国能否做到新闻监督呢?监督本身会不会有问题呢?舆论监督其实仍是有可能的，我们也可以在电视媒体上看到舆论监督等类似的节目。

追求新闻监督的动力来自三方面，第一种是对于新闻自由的追求，还是有很多像《冰点》、《南方都市报》的媒体人，希望追求新闻自由、监督政府。第二种是政府管制的需要，上级政府利用新闻监督来管制下级政府，也就是“中央收拾诸侯”的做法，会利用既定的媒体来报导，例如“焦点访谈”，中央政府也希望造就一个监督性的媒体形象。最后是资本牟利的冲动，许多媒体希望以这种揭弊的新闻来获取发行量、收视率，乃至广告。这三种的力量的合力造成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有机会可以从事舆论监督。因此，需要从多层面的角度来观察新闻监督，而非单一层面的解释。

我们可以比较 2005 年的 6 月这几则新闻的处理：

6 月 8 日:河南副省长买凶杀妻。6 月 10 日:广东汕头宾馆大火。6 月 10 日:黑龙江百名小学生死于洪水。6 月 11 日:河北定州血桉，平民械斗。6 月 18 日:安徽泗县假疫苗伤童

很显然河南副省长买凶杀妻桉，涉及重要官员，中国媒体是不可以充分报导的。新华社稿仅简单带过，香港《亚洲周刊》则有大幅报导。值得一提的一个怪现象是，内地媒体信息显然很不灵通，甚至在这位副省长被捕后，还在报上表扬其人大作正面宣导！

黑龙江洪水事件较受重视，新浪网作了专题，报导较突出。汕头宾馆大火在《南方都市报》报导较多；定州血案报导则相当少。

舆论监督的报导不是不能做，但确实仍然有高度的风险，我们以《南方周末》为例来说明。

一位《南方周末》记者的来信告诉我:当期的《南方周末》被禁了四篇稿子，最后竟然缺稿子填充版面，被禁的包括前面提及的副省长杀妻案报导、“宁安洪灾”也被禁、“汕头大火”亦被禁、“定州血案”当然更被禁。结论是:本期本报，尸横遍野。

不过，另外有一个安徽泗县假疫苗事件，则做得很大，从上到下各媒体都铺天盖地的做。从以上讨论，我们总结一下舆论监督的尺度:

第一、高度敏感、易激发民怨，均不可报导，如副省长杀妻、定州血案。(报导者后遭惩处。)

第二、对地方政府形象造成一定损害，可报导，但有节制。如黑龙江大水、汕头大火。

第三、被追究者是小人物，俗称“打苍蝇，不打老虎”。如泗县疫苗桉。

不过，“打老虎”也有玄机，老虎也并非完全不能打的，但是不同类型媒体处理的分寸即有所不同，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下台事件为例，《人民日报》又是刊在气象版，《北京日报》亦摆在不显眼处;《人民日报》的子报-《京华时报》，则以头版头刊出。由此可见，即使同样的报团亦有不同的排版方式，当然这也是大陆报业改变的轨迹。

肆、Chaos:混沌

中国传媒从控制、变化，再到混沌，出现许多现象。近三十年来，从非市场化到市场化，有明显的前进。管制也从严控到逐步的松动，开始显示变化。新闻媒体有两个战场，一个是在争取自由空间，一个是在争夺市场的份额，这两个战场不完全一样。所谓媒体竞争，指的不仅是商业竞争，如何扩大发行量、市占率，也是自由竞争:在一个“严控”的情形下，如何争取自由，走向业化，例如，备受关注的《财经》和《南方都市报》两个媒体，便是在争取自由空间的战场中，前进的步伐最为明显而引人注目的媒体。

既要听话，又要赚钱，这已成为很多总编辑的现实选择，但往往也造成新闻专业失守。例如:有一个摄影记者在一个大雨天，扛着全副装备的摄影器材，在下水孔盖附近，等候路过民

众骑脚踏车经过并因暴雨涨水而滑倒的画面。显示新闻为了追求市场，却可能无视于新闻伦理和人性。

另一个桉例也显示出日益严重的新闻伦理危机:2005 年，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少女捐肝的报导，被称为是 2005 年“中国第一感动”的新闻事件。内容是一位未满十八岁的少女，看了 CCTV 的节目《感动中国》，节目内容为母亲捐出自己的肾给女儿等。天真的少女也决定捐出自己的一部分肝脏，给需要的病人，于是签了字，媒体也报导了。

但忽然少女消失了，原因是家长说由于少女年纪太小，不能捐肝，便将其带回家。少女的家在四川的小县，《天府早报》领导便召开编采会议，认为不能看着一个重大的新闻就这样熘走。决定派出四个记者和编辑，赶赴少女老家，劝说少女回来捐肝。少女真的回来了，父母也跟着回来了，跟报社谈判。报社很高兴，因为少女回来了，每天都是新闻，每天都是关于少女要捐？不捐？捐的条件等等。终于少女要推进手术房，当天新闻标题是“悲情捐肝，女儿笑的坦然，妈妈哭的揪心。”照片也拍到伤心的妈妈，而旁边站的是报社的记者。

这则新闻，表面上似乎是非常正确的，助人为乐是高尚品德；而商业上，也能够有效吸引读者眼球，增加发行量、阅读率、影响力。这在中国称为“策划新闻”，但是背后却隐藏了严重的新闻伦理失序。今天中国媒体的情形就是这样，迈向自由的步履，迟滞不前。

而中国新闻史最可耻的一页，则发生在 2004 年，中央电视台竟然在俄罗斯发生人质绑架危机的时候(2004 年 9 月 6 日)，在电视上进行有奖征答:请问俄罗斯危机目前共造成多少人死亡?选项 A、402 人，B、338 人，C、322 人，D、302 人。并要求答题直接发短信至中央电视台。这个短信征答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商业活动，由电视台与电信部门合作。众所周知，中国是人口众多的短信大国。但这真是丧尽天良的事情，别人的国家与人民受难，我们在这进行有奖猜题。这事惹火了中宣部，因为涉及中国与俄罗斯的外交问题，因此，中宣部把每一层把关的编辑人员撤职。但我们要问，这是怎么来的？

这就是由于前面这种又要政治正确，又要搞市场化的媒体发展空气下所产生的畸形现象，与少女捐肝与拍摄雨天摔车没什么两样。更深一层来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党跟国家的垄断企业，会造成权钱结合的怪胎，浮出表面的便是一种恶质化的媒体现象，缺乏专业与人性。

我常常这么看:今天的中国，进步、停滞、甚至倒退，是同时并存的。2006 年的冰点事件中，媒体遭到整肃，龙应台及时的发表“请用文明说服我，致胡锦涛的公开信”，震动海内外共同起来声援《冰点》，一个月后，《冰点》保留了，但主编被撤职；事件至此似乎打成了平手，一比一或者零比零。

《冰点》虽然遭到整肃，但是，新闻媒体并未气馁，我们来看另一个桉例，2006 年中国媒体出现了两大报导禁区，一是文革四十年，另一则是唐山地震三十年。虽然中宣部禁止唐山报导，但事实上却出现了大量的报导。我比较了这一时间新闻的出现量，文革的新闻报导确实被消灭殆尽，但各大网站却出现了唐山地震的专题，包括新浪、网易等等，还有活跃的个人博客。

原来，他们报导唐山地震的策略，是由各大网站和商业性小报一同发起“唐山寻亲”活动，报导当年获救的人想要寻找并邀请救助他们的医生或士兵，再度回到唐山去看看。这是一个以感情、人性为诉求的议题和征稿过程。中国传媒把真情、真话作为“唐山报导”的传播重点，用人情、人性、民意、民间、公益、公德、公众权利、政府职责等，构成当局难以限制的话语空间。

在大量的寻亲报导之中，就不期然的出现了尖锐的文字，《南方都市报》在这篇评论《请让唐山市民正当哭一场》之中批评了官方的仪式:

“一大清早，武警就开始驱逐百姓。不获入场的只好站在警戒线外，甚至要用望远镜才看的清纪念仪式，一场应该属于他们的仪式。”

原来武警封锁现场的原因是胡锦涛要来，这样的言论其实非常大胆，后来还遭到中宣部严厉批评。但这次的报导竟然能够冲破了中宣部的禁令，也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混沌”现象。

另外一个有趣的桉例是，CCTV《新闻调查》的记者柴静采访我，做了一期唐山三十年的报导，但媒体领导本来根本不让此节目制作，柴静等人硬是突破禁令；但制作完成后，领导审查后仍不允许这则节目播出；柴静坚持领导看了这则内容后再决定；领导看完真的颇为感动，还掉下眼泪，但仍然板起脸，删除了一些较为尖锐内容，便也播出了。

播出后，中宣部领导打电话来关照，认为此节目违反禁令，表示要处罚，处罚的方式则是命令制片人再制作一个歌功颂德、颂扬社会主义的节目，要求在五天之内去唐山采访连带制作，

下一周就得播出。于是六个编导车轮大战赶工出来，制作片人说:“恶心，实在恶心!”但接着说，“值!”

这就是今天中国传媒，进了两步，又退了一步，但还是进了一步，从这个具体桉例中，也许才能较为理解中国媒体的真正状况。

改变受到控制，控制却正在改变，我们在控制底下改变，也发现控制出现了改变，控制与松动其实是同时存在。

伍、网路的崛起

观察 2007 年中国传媒最新的演变状况，可以发现的是:官方的控制更精致化，政府越发精于公关操作。调查报导则陷入困境。2007 年的调查报导比前两年都不如，被禁止的题目太多。但是，有一项另人特别关注的现象，则是网路媒体的表现十分惊人，远超乎我们意料之外。

例如，2007 年济南“7. 18”暴雨中的受难者，官方公布只有 26 个人，按照政府规定，灾难人数只能根据政府发布数据，不许媒体自行报导。但是，门户网站腾讯(大家更爱称它 QQ)总部向全部的 QQ 网友下达召集令，请网友帮助寻找受难者的照片、事迹、影片，以及任何网友所看到的事件。当天晚上很快就收到网友的资料、影片，内容非常感人。我发现这是网路创造出的一种从来没有的调查方式，它的速度惊人，因为从来没有一种媒体可以这么快速地接近真相!这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网路时代、公民记者时代。这是未来可看到的一个希望。

另一个桉例是，QQ 提出了一个“晒工资”活动给网友参与，目的是了解中国的工资情形，请每位网友公布他的年龄、工时、及工资等，就可以真正了解中国工人详尽的工资水准。我原来以为这里面会有人恶搞，结果几乎没有，共有 1，388 人参与，公布了 1，000 人左右，政府的数字不实就不攻自破。

进行网路媒体创意的不仅是民间的公民，也有正规媒体联手，很多在官方媒体工作的年轻优秀同仁也利用网路，大展身手。例如，柴静利用网路向公民收集豪华公共建筑照片，她的征稿启事是这样写的:

你从来不知道这个楼花了多少钱，也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告诉你，虽然这办公楼上亿的造价，是你这样的人每个月从工资里扣出去的钱，不够的话，它可能是你父亲养老的钱，是你母亲治病的钱，是那个每天在跟你眼前伸手乞讨的人本来应该得到的钱。你中考的政治题里有一道"公民如何行使监督权"有什么意义？从明天起，如果你经过它，拿起你的相机，拍下来，或者用笔记下来传给我们。你是公民，也是记者。

这个帖子后来被《天涯论坛》转录出去，网友提供了非常多的照片，包括各级政府的豪华大楼，照片也很难造假，因为建筑物本身就是在那边，很容易核实。很多所得甚低的地方政府的大楼竟然盖得和美国的白宫和国会一样豪华堂皇！而这又一次让我感受到网路以及公民记者的力量，将会改写中国的新闻史。不过，很可惜，这件事并没有完成，因为中宣部开始对《新闻调查》这个节目和柴静发出严厉的批评与查处，禁止这个节目的制作播出，中央电视台同时点名柴静三十几次！网友只好质疑："柴静被河蟹了？"（"河蟹"谐音胡锦涛所说的"和谐"，网友拿来借用，被河蟹了就是说柴静的博客被关闭，河蟹因此成为控制的另一种修辞。）

陆、结论

最后做一个小小的展望，中国传媒会走向什么地方呢?根据这张星空趋势图，应该有四种可能性。左上角的极左是倒退的可能性，目前几乎不存在，因为要从市场倒退到非市场，或者再回到文革时代，实不太可能。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近来几次的表现也让我有点忧心。左下方"金权共谋，听话发财"，也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既要赚钱，又要在政府允许范围内报导，往往放弃新闻自由来换取经济利益，这是目前重要趋势，未来也很可能继续如此。

第三种是将来中国如果发展成宪政社会，如香港、台湾，但毫无疑问的，一定会出现"市场万能，恶质媒体"，媒体炒作煽色腥的现象。无论如何，我们一要警惕不要回到极左最坏的可能；同时，我们当然要努力朝着右侧中部－－也就是自由与责任的"公共传媒，自由负责"的方向前进，自由而负责是媒体永恒的命题，也由新闻人自己的良知所建立的；事实上，每一个传媒人从现在就可以开始做，并不必依赖政府。

（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曾任《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本文原载于《台大新闻论坛》第七期，2008 年 7 月，原文链接：http://ntujournal.typepad.com/files/7-3.pdf）

【拓展阅读】

钱钢：黑幕就这样揭开了

2013 年中国的首场风波，起于我曾工作过的《南方周末》，我不曾想到。一个多月前，我在香港大学演讲《十八大与中国政改前瞻》，希望政改从善待媒体、善待百姓起步，答问时有朋友认为过于软弱。未几，这“软弱”诉求便遭遇强悍对手。

这场风波被称“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其导火线，是《南方周末》2013 年新年特刊在制作时遭广东省委宣传部粗暴干预。各界抗议声中，新闻审查成众矢之的。

要读懂本次事件，两篇文章可供参考。一篇是著名媒体人程益中先生的《中共钳制媒体揭秘》，一篇是曾礼先生的《究竟谁删改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曾先生是派驻《南方周末》的审读员，他在事件中发博客反戈一击，提供了关于新闻审查的确凿证据。

中宣部“阅评”与“禁令”

确切说，内地并没有国民党时期那种成文的新闻审查制度。毛泽东时代，舆论一律，自不必论。邓时代，新闻改革曾被提起，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曾提出“报纸登什么不登什么应当由报社自己决定”，但六四后媒体回到严控状态。江时代，对媒体的日常管制主要通过“事前禁令”与“事后追惩”。

我在 1998 年到 2001 年期间担任《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见证了诸多“禁令”与“追惩”。禁令是在出版前规行矩步，追惩则是通过宣传部阅评组对媒体实施监控，发现“问题”则下令惩处。那时《南方周末》平均每年收到十多件中宣部“阅评”，上级（《南方日报》）领导每每心惊肉跳，接到阅评即招我等谈话，商量检讨或处分事宜。我就是在这种“阅评”累积到一定数量时，因一文惹祸而中箭落马。



广东省委对《南方周末》有过保护。我当值那些年，环境逐渐恶化。但那时，尚没有来自编辑部之外的事前审查。我在《南方周末》期间，参与过三期新年特刊策划制作。这三个特刊，是编辑部自主制作的。

程益中说，江时代后期，宣传部门的“禁令”已转入地下，不形诸文字。2005 年后，控制加紧。中宣部继阅评制度后，又创立审读制度，向各重要媒体派出审读员，对媒体的内容实行刊前审查。同时，一批忠实的宣传官员被任命为报纸总编，严防死守。已经如此草木皆兵，对一些视为异己的媒体仍不放心。宣传部干脆跳到台前，对《南周》这样的报纸发威。

审读员曾礼先生披露，自从 2012 年 5 月新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到位后，对报纸的管制和监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南方周末》每期选题都要上报省宣，批准后才能采写；重要报道和社评，都要报省宣审阅后才能出。有一次报纸已开印才通知撤稿，结果印了十几万份报纸作废（另据南周朋友告之，2012 年发生过 4 次报纸开印后停机销毁事件）。

2013 年南周新年特刊的制作过程，实属当今内地新闻审查的活标本。这次风波中，《南方周末》新闻职业伦理委员会发布了新年特刊出刊过程，所列事实，班班可考，活画出新闻审查之蛮横粗暴。

我数次经历南周特刊操作，知道特刊是《南周》知名品牌，为读者关注，策划过程十分艰辛，在动辄得咎的舆论环境下尤其不易。本次特刊在 2012 年 12 月初开始策划，初步决定主题为“过河”。编辑部的方案报给总编辑黄灿后，一直没有回音，直到中旬，黄灿提议，以“中国梦”为关键词，明显是要迎上所好。

《南方周末》如何连挨五刀

12 月 23 日，编辑部拿出策划文案，24 日，黄灿将策划案送省宣审查。这是新年特刊制作中的第一次事前审查，这种审查还将反覆多次，《南方周末》为此身挨五刀：

第一刀：多个选题被否。26 日，传来省宣第一次意见，意见似集中于“人物”。多篇人物报道被令撤除。

第二刀：新年献词两度送审。《南周》的献词原稿题为“中国梦，宪政梦”，黄灿不满意，修改，送审；奉命再改，再送审。31 日的送审稿减至 1000 字，标题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

第三刀：大砍版面。31 日晚，流程已到最后阶段，黄灿传达省宣意见，年度新闻事件盘点整个板块被删除。稍后又有指令，再有两篇文章被撤。编辑不得不对花近两小时重新调版。

第四刀：欲颠覆头版。在编辑做版期间，黄灿用手机拍摄头版版样，发给省宣审查。2013 年 1 月 1 日零点前后，黄灿突然转达省宣最新意见：第一，头版大禹治水图格调偏暗，且易被外界做歪曲解读，要求换成一张航母的图片；第二，不能用“中国梦梦之难”这六个字作为特刊标题。听到这种意见，编辑的情绪几乎崩溃。预订签版定样时间早已超过，大改几无可能。最后经争取，大图保留，头版标题改成“家国梦”。

第五刀：最蛮横的一刀，发生在报纸编辑流程已结束后。1 月 1 日凌晨 3 时，完工，特刊诸责任编辑集体署名签版、常务副总编最后签字出片，责任编辑们关闭手机休假。然而，天亮后，省委宣传部却召见总编副总编，责令改版，焦点是头版和献词。省宣提出在封面大图上增加一段导言，此事后来在网络上被传为系部长庹震亲自撰写。目前可知的情形是，导言由副部长口述、南周副总记录、手机短信发回送审，省宣改定发回见报（这段发生低级错误的文字，究竟经谁审定，仍不详）。另外，责令已定稿的献词第三度送审。审后的献词被删几十字、加入一百余字。惟一一处“宪政”字样被彻底消灭，加入的百余字包括“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等十八大报告用语（何人所加，亦不详）。1 日晚，省宣再发指令，将封面标题改为“追梦”。在责任编辑、校对均休假不在班的情况下，南周总编、副总编二人只好亲自到出版室操作，落实省宣审查意见。

阅读本文的读者中，相信有许多传媒朋友。请问诸君，见过这样的出报流程吗？对内地的新闻控制，我不能说不熟悉，可是眼前的事实仍令我震惊！还有什么不在巨细无遗的管控之下？策划案、选题、题目、文稿、图片……一切一切，都必须唯“萱萱”之命是从，而报纸的记者、编辑、总编，都沦为被驱使的家丁。《南周》的员工，常连续数日不眠不休，不是为了提高报纸水准，仅仅是为了应付审查官的折腾。这样的折腾，一而再，再而三，经年累月，无休无止，一如噩梦。

《南方周末》是一件产品，一件商品，当然是特殊的商品；它是一家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当然，老板是党。可是，今天中国总算已有“现代企业制度”，试看今日之国企，还剩几家，上级党组织可以视管理层为无物，到企业指手画脚，恣意妄为？中国计划经济的痼疾，那些最陈旧最丑陋的东西，如今竟顽强存活在宣传管理系统中。

第一声“不”

南周事件的最大意义是揭开了黑幕。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里，新闻审查变本加厉，事前审查肆意横行，然而一切皆在黑箱之中。这些年，《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发出愈来愈多的叹息——报纸批评和监督的锋芒削弱了，许多重大事件的报道，南周缺席，版面上多了莫名其妙的官话套话。原南周记者李海鹏在微博写道："我 02 年到《南方周末》，09 年离开，亲眼见证它无一日不在严苛管制之下。一棵树，今日断其一枝，明日断其一根……"读者未必知道，正是那些事前审查的手，抹去了几多真相，禁锢了几多真言，掐灭了星星点点的思想火花。《南方周末》的员工们打落牙齿带血吞，哑忍已久，这一次终于走到极限。

他们的诉求有限，只是废除事前审查（出版前预审），要求编辑自主。经此一役，宣传部应有所忌惮，但任命听话的总编、禁令、追惩，这些手段将延续。兑现宪法第 35 条，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路还长。

然而毕竟开始了。体制内第一声"不"喊出来了，规模空前的博弈发生了。相信领导人会明白，何为利，何为弊，谁是给他们减分添乱的恶吏，谁是新政正渴求的呼应者支持者。真的，请从善待媒体、善待百姓开始，政改，不能再拖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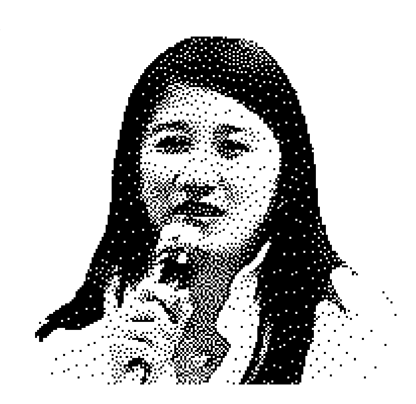
（标题为编辑所拟，原题"《南方周末》与新闻审查"）

（本文原载于 2013 年 1 月 13 日《明报》。）

【返回目录】

9-6 王毓莉：驯服 vs 抗拒：中国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新闻专业抗争策略

“整体而言，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与支配者间的交互渗透与斗争，是相当激烈的，通过一次次的冲撞与测试底限，其目的虽然不是为了创造一个全新的体制，而是期望透过每次与支配者的交锋，在严密的新闻控制下，拓展新闻专业表现的空间。”



摘要：本研究主要援用 James C.Scott，佐以 Michel Foucault，对于“权力”与“反抗”的论述，并透过深度访谈法与文献分析法，探讨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从事新闻产制时的驯服与抗拒策略。研究发现，中国大陆新闻组织与管理机构当中，存在着接近圆形监狱的机制，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同时扮演着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双重角色。新闻工作者透过时空转换、责任转移、报导事实、合纵连横、反客为主、钻研漏洞等隐藏文本的抗争策略，期望争取更大的新闻专业表现空间。

关键词：抗拒、政治权力、新闻专业主义、隐藏文本

壹、研究动机与问题意识

古典权力观，总将权力视为少数资源，集中在某些特定人士手中，带有上对下的对抗权力意涵（李猛，1999）。而这样的论述逻辑，往往只是将媒体老板视为组织内最大、甚至是唯一会影响新闻工作自主权力的拥有者，新闻工作者则是被宰制的一方（Murdock，1982）。过去对于中国大陆新闻自由的探讨，也大都流于“民主”与“不民主”、“自由”与“不自由”的二元对立论述。

张文强（2002），认为上述的古典权力观，不能完全解释权力的运作，因而针对台湾媒体组织中权力运作，探讨新闻工作自主问题。以古典权力观为基础的新闻专业论述，在处理组织内部权力问题时，似乎于无形间简化了权力本质。在真实情境中，权力源自组织不同层面，细腻且多样性地发挥影响，且新闻工作者亦能展出相对应的权力抗拒策略。

中国社会结构随着改革开放演变，伴随着政治领域权力的减弱，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权力正在逐步成长，原先政治领域垄断一切权力的单级结构，正在向三个领域分享权力的多级结构转变，造成社会自由空间的出现和不断扩大（田中初，2005）。

中国大陆新闻改革的发展在此情境下展开，不管是陈韬文提出的“媒介的钟摆现象”（media oscillation；Chan，1995），陈怀林与陈韬文（1998）认为中国大陆所拥有的是“鸟笼里的中国新闻自由”，或是王毓莉（2010）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等论述，都说明了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度正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做不同程度的推进。特别是在新闻舆论监督的表现上，出现了一些改革派媒体，即便在中国高度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新闻环境中，这些具有新闻专业主义认知的新闻媒体，仍然能够有所作为。

张裕亮（2005）指出，中国大陆的报业，正从党国化，走向商业化、分权化、与集团化。赖祥蔚（2002）进一步提出，中国的一些具有市场化报业，在不公然挑战党国禁忌前提下，善加运用制度因素的变化，寻求有力的尝试性创新突破，也从而弱化了政权的控制。王毓莉（2009）从分析中国大陆《南方周末》的文本中发现，《南方周末》的内容藉由跨地区新闻舆論监督中，采取“多重消息来源”、“事实标准”、“安全选题”、以及“避免究责”等避祸策略，企图突围官方政治控制，而在跨地区的监督直接程度与监督具体对象方面，都有更直接批评的语径表现。

陆晔与潘忠党（2002）则认为，中国大陆新闻从业者建构专业主义话语的历史场景，面临党对媒体的控制、市场对媒体的诱惑和支配、以及专业服务意识对媒体自主的压力。由于不同的传统和推拉力量通过这些机制约束、促成、选择并固化各种不同的新闻实践，专业主义的意識形态在实践中，必然出现碎片和局域的呈现。

而从新闻实务界中，若干较市场化的媒体桉例，可以一窥中国大陆实务界对于专业主义的追求。《财经》杂志总编辑胡舒立，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尖锐地挑战了中国言论自由的边界，当其它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很久之后，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一直到

2009 年才与新闻部多位高层，以与幕后股东因理念不合为由，陆续离职（连隽伟，2009 年 11 月 10 日；Osnos，2009，July20／方可成译，2009 年 8 月 1 日）。而广州的南方报业集团中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屡屡冲撞体制，时常以“出格”方式从事新闻报导。

过去针对中国相对较市场化的新闻媒体产制相关研究，侧重在针对特殊媒体的新闻个桉进行叙事文本或内容分析的考察（武婧，2006；姜红、许超众，2008；孙旭培，2001 年 12 月 18 日；高菲，2006；乔云霞、胡连利、王俊杰，2002 年 10 月 18 日）。然而，这样的论述，不足以解释现阶段发生在中国大陆新闻产制端的种种现象。

本文主要期望援用耶鲁大学教授 James C. Scott，佐以法国大学思想史首席教授 Michel Foucault，对于“权力”（power）与“反抗”（resistance）的论述，发展出研究架构。并透过深度访谈法与文献分析法，深度访谈对象包括一向被认为改革派的南方报业集团内不同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以及透过中国大陆新闻学者的解读，期望更全面性与深入的了解改革派传媒，在面对中国高度国家权力控制下，新闻传媒在从事新闻报导产制时，新闻主管与工作者，在驯服与抗拒的过程中，发展出怎样的隐藏式抗争策略。

由于研究者企图了解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面对官方权力的隐藏抗争，在研究设计形成之初，便了解对于纯粹使用深度访谈法，未必能够得到问题的解答。原因之一，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将这些隐藏抵抗的敏感资讯揭露，恐有秋后算帐之虞 [1]；其次，新闻工作者对于境外研究者，可能存有部分戒心。为解决此一限制，本文发现一些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发表文章或报告，期间谈及采访争议性议题的桉例、或者部分大陆学者，针对新闻记者的研究发现，可作为研究的重要补充。因此，决定采取两种方法并行。

研究者尝试突破困境，透过前南方报业集团局内人的牵线，采用滚雪球方式，成功访问上海、广州、北京三地的 13 位受访者，其中包括 8 位新闻实务主管或记者（包含现任主管、卸任管理阶层、曾被整肃的卸任主管、与一线新闻记者），和 5 位具有相关研究背景的新闻传播学者。基于研究主题的敏感性，本文将受访者意见作匿名处理（见表 1）。

表 1：深度访谈对象一览表

访谈对象（姓名笔画序）	职称或职业经历	访谈时间	访谈城市
S1	《南方都市报》新闻工作者	2009.06.18	广州
S2	《南方周末》新闻工作者	2009.06.22	上海
S3	《南方都市报》新闻工作者	2009.06.18	广州
S4	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管	2009.06.17	广州
S5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者	2009.06.25	北京
S6	前《南方周末》新闻主管	2009.06.19	广州
S7	前《南方周末》新闻工作者	2009.06.19	广州
S8	《南方周末》新闻部主管	2009.06.19	广州
S9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者	2009.06.22	上海
S10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者	2009.06.26	北京
S11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学者	2009.06.26	北京
S12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者	2009.06.17	广州
S13	《南方日报》新闻工作者	2009.06.18	广州

贰、理论架构发展与相关文献探讨

本研究引用 Scott 在 1985 年《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和 1990 年《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HiddenTranscripts）两本着作中（Scott，1985，1990），对于农民反抗与农民政治中权力的运作观察，并佐以 Foucault 规训与圆形监狱的分析，做为研究架构发展的主轴。

一、弱者的武器

Scott 的研究重点，主要不在于农民的反叛与革命，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农民的日常反抗，包括嘲笑、讽刺、磨洋工[2]、开小差、装傻卖呆、小偷小摸、暗中破坏、流言蜚语等等。这些手段，被他称为“弱者的武器”（郇建立，2007）。

Scott 认为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间，并非截然的顺从或反叛的对立命题，而是在不顺从与抵抗之间，有许多复杂且不同的动机与方式可以选择。而 Horsley（2004，p. 8）也指出，支配必然引发愤怒，而愤怒带来抵抗。并非所有被压迫者都拥有公开反抗的条件，如果知道公开罢工换取来的是永久性的解雇或入狱，工人会选择怠工（slow down）等方式，无论资本家采取劳动或薪资控制，工人也会产生平等的对应，如：安静的抵抗等策略（Scott，1985，p. 34）。

Scott 在观察马来西亚农村后所提出的“日常抵抗”（everyday resistance），指的就是被支配者在缺乏公开的反抗环境下，只能私下采取“弱者的策略”，其反抗目的不是推翻整个压迫性结构，而是尝试在现有结构下，让损失降到最低，以维持其生存条件（Scott，1985，p. 301）。而这些抵抗通常在小团体、个人中执行，如果是大团体，也会采取隐匿与伪装等方式，以躲避监视（Scott，1990，p. 200）。

这类反抗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画、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路、通常表现为个体自助的形式、以及避免同权威发生任何直接的、象征性的对抗。此种做法，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风险（郇建立，2007）。Scott 指出，弱者的反抗，也并非微不足道，限制了许多统治者的野心，缩小了国家的政策选择范围，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cott，1985，p. 36）。

二、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

支配者从未绝对控制整个舞台，在权力运作的网络缝隙中仍有缝隙。从属者与统治者的互动间，可区分出“公开文本”（public transcript）和“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Scott，1990）。

Scott 指出，农民运动的抗拒手法，是避免公开的与权威结构产生冲突，但终究可达成抗拒的目的。他认为过去相关研究的取材，皆来自于大量的公开档桉或官方的文本（official

transcript），官方文本中，被支配团体的表现、动机、与抗拒行动的解释，受到主流菁英分子的影响，无法清楚地反映出被支配团体的行为，因为被支配团体往往也会隐藏其意见，使其不呈现在官方的文本或档桉中。公开文本指的是支配者与其宰制的从属者之间的公开互动言行，如：佃农虽然会在背地里咒骂地主，但在地主面前又必须表现得必恭必敬，所以如果只是观察这些表现在外的公开文本，无法掌握两者间权力运作的精髓，只有从隐藏文本观点切入，才可以找到隐而不显的抗拒行动（Scott，1990，p. 2）。

Scott 指出，权力越不平衡，则公开文本越容易接近刻板印象，他认为尽管支配者从未绝对控制整个舞台，而且在权力运作的网络缝隙中仍有缝隙，但是从属者的行为，经常还是照着支配者希望的方向走。所以如果只观察支配者与从属者间公开文本，很容易落入霸权理论（hegemony）所主张，受支配者乃是受到支配意识形态洗脑，因而产生志愿性的服从现象（Scott，1990，p. 2）。

由于 Scott 不相信公开文本是权力交锋的全貌，所以他提出了隐藏文本的概念，他认为如果公开文本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在舞台上的表演，那么隐藏文本就是发生在幕后的论述与行动，而且此部分是权力所有者，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他认为如果要了解权力的运作全貌，更需要去观察被支配者在隐蔽处的“下层政治”运作，亦即被支配者如何伪装、如何发展、又和公开文本间有怎样的关联（Scott，1990，p. 4）。

Scott 认为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之间，是不断斗争的区域，而非一面实墙（Scott，1990，p. 14）。不过，Scott 也提出，这并不是说公开的言行，便是虚假的，而隐密的言行才是真的，更重要的是研究两者之间，如何互相界定、交互渗透与斗争的过程。

此外，Scott 曾提出“测试底限”（testing the limits）的概念，说明被支配者的容忍度到怎样的程度？然后为了生存，这些从属者会按照统治者所订下的规范，游走在其边缘，尽可能不去碰触底限，他称这样的阳奉阴违做法，只是表面上看起来象征性遵从，但却很技巧地达到抗拒的目的（Scott，1990，pp. 193-196）。

Scott 隐藏文本的概念，被认为呼应了 Goffman（1959）以戏剧的概念，解释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模式，提出的台前与后台比喻。只不过，Scott 透过田野调查，提供了实务上的策略，他将其形容为“政治伪装的艺术”（the arts of political disguise；Scott，1990，p. 136），将避祸伪装分成三种方式（pp. 140-156）：（一）匿名手法（anonymity）：包括使用流言蜚

语（gossip）、谣言（rumor）、匿名的威胁与暴力、匿名信、以及匿名的群众反抗来达到反抗的目的；（二）委婉手法（euphemisms）：透过隐约的方式，来呈现修饰过后的讯息；以及（三）发牢骚（grumbling）：发牢骚的目的，往往不是简单的个人意见表达，而是企图去给菁英的压力，并且保持某种程度的模糊性（a certain vagueness）。

回顾相关研究中，Scott 的“隐藏文本”与“公开文本”概念，常被运用于从事各种文本的研究，如：圣经、法律或公听会中文本的隐藏性（Blommaert，Bock&McCormick，2006；Horsley，2004；West，2000）。该理论也被运用于针对不同族群，如：外籍配偶、空服员、澳洲大学学术工作者、外来移民，在从事日常工作时，抗争的隐藏文本（沉幸如，2003；张贵闵，2007；Anderson，2008；Murphy，1998）。以及从组织传播角度，藉由弱者的武器与隐藏文本概念，分析员工在情绪劳务中的认同、权力、隐藏文本、策略性互动等（Tracy，2005）。众多文献中，相当缺乏将 Scott 理论，应用在传媒研究的领域，只有针对电影《贫民富翁》的研究（余韬，2009），以及李小勤（2007）的新闻相关研究。

李小勤（2007），在文中曾提及 Scott“隐蔽的脚本”（hidden transcripts）和“公开的读本”（public transcripts），但最后以“传媒越轨”（media deviance），作为研究主旨。该研究指出，“传媒越轨”表现在意识型态发生松动的非民主社会中，传媒报导与权力中心意识形态相背离的议题，不过，这些议题通常是权力弱势群体所关心的议题。

李小勤只针对《南方周末》对于农民工的报导与再现，做为政治话语越轨框架的研究，从传媒对农民工报导的正面、中立、负面，指出越轨策略的方向性变化，并指出三种传媒报导农民工新闻越轨的包装策略：红灯停、打土围子、见木不见林[3]（李小勤，2007）。

针对 Scott 理论的应用，金光亿（2008，页 15）提醒，多数西方社会学者认为，国家与社会是对立的。但东方国家的历史较长，老百姓具有强烈主人意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批评国家，但是有一种情感是始终存在的，那就是“这是我的国家”，地方所寻求的是要确立自己的社会空间，并不是反对国家，所以应用上要充分考虑社会的历史、结构、传统等。

虽然，郭于华（2001 年 11 月 27 日）认为，底层群体的农民，面对强大而严密的统治阶层，对立的双方因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可以称为对抗性的对立面，因而弱势一方反抗的逻辑，就会发生扭曲和畸变。赵鼎新（2007，页 14）也从社会运动角度认为，Scott

弱者的武器理论过于静态，并无助于理解社会运动或革命发生的整体原因，应进一步探讨如："在什么情况下，受压迫群体的日常抵抗将转为政治诉求？"等问题。

然而，本研究探讨的范畴，并非一般社会运动，对于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而言，新闻管制被视为政治管制的一环，一时之间，很难发生体制上的彻底变革，因此，本文无意探讨新闻界是否本质上反对国家，或者何时会产生政治诉求的行动，而是试图借鉴 Scott 隐藏文本的抗争策略角度，观察长期受到政治权力控制下的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如何追求新闻专业主义的表现。

三、Foucault"规训的权力"与圆形监狱

Foucault 希望探讨的不是以往那种由上对下的传统式高压的压迫统治权力，而是主张权力也是可能产生由下对上的抵抗，是一种存在于自身运作范围内的直接生产作用。Foucault 认为应将权力放在其它权力关系的网络中分析，他将权力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行动模式，因为权力只能在行动中存在（Foucault，1994，p. 236；转引自高宣扬，2004，页 173）。而"规训机制"和"监狱制度"，即为权力运作的方式与场域。

Foucault 指出，权力规训有几个特点：首先，权力不可被特定人、阶级所拥有，或是被一方独占有，而是存在于所有社会关系中。权利是动态的、流动的，并非静态的。其次，权力不只是压迫性，也是生产性的。第三，权力存在于微视面的日常生活，强调微细（capillary）分散的权力观，反集中化（汪育如，2005，页 21）。最后，有权力，就有抗拒。Foucault 认为，权力并不如传统认为集中于一个中心点，而是有对抗，应该在"力"的范围内，分析权力机制，这样可以摆脱长久以来，迷惑政治思想界的君主，也就是"法律体系"，从力的关系内在的战略出发，去研究权力机制（Foucault，1978／尚衡译，1992，页 74-82）。

然而透过规训，却依然会产生反作用力，现代权力机制为消除此一潜在危险，设计了监狱制度（黄煜文，1978，页 175）。Foucault 以英国哲学家 Jeremy Bentham 设计的"圆形监狱"为例说明，透过圆形监狱的掌控，将罪犯彼此之间作隔离，却又能够在同一个空间内以方便监视，透过种种曲折的通道与光学设计，被囚禁者甚至看不到监督者的影子。透过监视者与

被监视者不对等的设计，不但能够预防被监管的人有串通共谋的危险，还能避免权力来源直接遭受反抗（Foucault，1977 / 刘北城、杨远婴译，1992a，页 200-201）。

Foucault 将此种环形敞视的监督系统，称为“权力的眼睛”（Foucault，1994；转引高宣扬，2004，页 198），就此产生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的现象，在此机制下，甚至连监督者（典狱长或狱卒）自己都会被观察。监督者自己也与圆形监狱这个机构拴在一起，成为了权力运作的一个必要齿轮，而监督者也承担起这种实施权力压制的责任。从而把这种权力关系施加在自己身上。自己也成为了管制下最直接受影响的人（Foucault，1977 / 刘北成、杨远婴译，1992a，页 204）。

此外对于自我产生监视效果，Foucault 也曾讲述一个精神病桉例，说明精神病人受到了规训，但却不是透过刑具，而是透过了话语，把恐惧移至管束对象的内心，使这种罪过变成秩序的一部份，使负罪感成了疯人自己的意识。换言之，这种罪过使得疯人变成永远可能受到自己或他者惩罚的对象。承认自己的客体地位，意识到自己的罪过，疯人就会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成为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主体。也就是说疯人透过把自己变成他者的客体对象从而恢复自己的自由（Foucault，1973 / 刘北成、杨远婴译，1992b，页 216-217）。

张文强（2002）从 Foucault 的权力观出发，以封建采邑的概念研究台湾的媒体组织，认为媒体工作者对组织与新闻专业的效忠，以及主管、老板提供的庇护，形成一种封建式的权力关系，权力可透过各阶层的管理者扩散出，达成更为严密的管制。

而中国政府对于新闻业的管控，在 1978 年以前相对紧缩，主要是为了稳固统治。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闻媒体控制，在 1978 年至 1989 年，是管制相对宽松时期，然而八九民运发生后，对新闻媒体则采取了新的管理方式，采取更聪明、更隐蔽的措施（何清涟，2004）。在进入网际网路的资讯公开化时期，中国政府的政治控制权力在新闻事业的运作，更加复杂与细致。而中国的新闻媒体一方面需要回应政治权力控制，但是新闻专业精神的发挥，在中国大陆的新闻业中，也正兴起。

本研究认为，Scott 的理论适用于，探讨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二元主体权力交互情况，对于解释中国传媒组织中，存在政治权力者、媒体主管、一线记者三者间关系，与可能产生的自我监视状况，有所不足。而 Foucault 的权力论述，则着重在分析支配者如何“驯服”？被支配者是如何“被驯服”，以及如何让支配者无从反击，但实际上中国大陆的传媒环境，仍存在

着下对上的抗争情形，这种抗争存在于媒体与国家机器、媒体与消息来源、传媒主管与记者，各种不同权力关系中，而 Scott 的抗争论述，正好可以补足。因此本文决定以两者做为研究架构的发展。

然而，权力关系的各种面向，相当多元而复杂，但是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聚焦在：国家机器与新闻机构间权力关系、国家机器与新闻主管间权力关系、新闻主管与一线新闻记者间权力关系、以及新闻工作者（主管与一线记者）与国家机器间的隐性抗争。进行以下研究问题之探讨：

研究问题（一）：中国大陆的国家机器，如何控制新闻媒体？

研究问题（二）：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在驯服、抗拒之间，扮演怎样的角色？

1.“圆形监狱”的全景敞视主义与自我监视效果，是否产生在新闻媒体的组织与管理阶层中？

2. 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在权力运作的规训机制与圆形监狱中，扮演何种角色？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角色？或是双重角色？

研究问题（三）：新闻媒体工作者，如何实践新闻专业的抗争策略？

1. 中国的新闻媒体工作者，其抗争策略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表现与执行为何？

2. 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与支配者间，交互渗透与斗争的过程为何？如何测试底限？

参、国家机器对于新闻媒体的控制

本小节无意对中国新闻控制，做全面性的检视。主要透过了解中国大陆政治体系，经由怎样的规训化机制与策略，对新闻体系行使控制的权力，藉以作为对新闻工作者所处环境的认识，协助读者进入本文的研究重点。以下针对研究问题（一）分析中国大陆的国家机器，如何控制新闻媒体。



改革开放前，媒体的报导对于政府而言，只是党的权力在媒介中进行延伸和反应（张志安，2010）。中共中央以集权的管理方式，媒体的组织与运作由各级党委直接掌控，媒体只要考虑政治宣传，不用顾及经济效益（王毓莉，2010）。改革开放后，传播媒体得到新的改革与属性定位。1998 年总理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视察时，曾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中国新闻网，2008 年 10 月 13 日）。新闻业顺势而变，从报导方式到社会功能认定的转变，从文本形态到价值面，中国大陆新闻业，已与 30 年前大不相同（张志安，2010）。

中国大陆主管新闻言论的机构，由上而下为中央宣传部至各省市宣传部。中央管理新闻传播较严谨，部分地方则较有弹性。中央级的媒体新闻，最常受到审核的控制，或是遵守中央的规定，必须规避敏感及负面的报导。像是《新华社》的内参[4]，在某种情况下，也许会决定一项党的政策，或是一项法规要不要立法（张志安，2008，页 50-53）。

然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对媒介的管理与规制，一开始倾向只作宏观的原则性规定，但近年来，日益演化成越来越微观和具体的管制，如：针对具体个别的媒介内容，进行干预。与中国形势大好的经济领域的改革，正好相异（胡正荣，2007 年 4 月 15 日）。受访者（S3、S4、S7）指出，中国的传媒面临的管制，是随着政局与政策而持续变动，时松时紧，在夹缝中求生存，并且找寻任何可能与言论空间，进行博弈的机会。

至于地方媒体的新闻控制上，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媒体"间的三角关系。而曾华国（2006，页 225）研究也指出，由于问责制度下，地方首长希望保住乌纱帽，因此地方宣传部长背负着，不要出乱子的责任。为了粉饰太平、不惊动中央，地方政府倾向控制新闻来源、对中央级媒体不友善、以及希望地方媒体不报自家省内丑闻。

受访者指出，出事的单位就算第一时间来不及阻止记者采访事件，但从采访后到完稿刊登，有足够时间让相关单位找关系，反应到上层，因此记者从地方采访回来后，往往禁令随之而至（S1）。而当地方首长没有拦截到新闻稿时，在下达禁令时，往往以红头文件[5]或拨电话来执行（S8）。过去常以红头文件下达禁令，近几年的大都直接电话打进编辑部，且不准录音，一方面可以不留书面证据、另方面控制可更即时与直接（S5、S8）。

而政府对某则新闻下达的禁令，往往没有解除的期限，媒体只能等风声过后，再找机会报导。如下来的是指责媒体的文件，那么报社内部有专门的委员会要负责处理写报告（S2）。至于处置媒体的手段，有针对个人与组织。如：因报导西藏问题，《南方周末》主管遭到中宣部



直接点名，必须退出第一线工作，且不能任正式职务。中宣部甚至曾经规定南周内部人员，禁止接受外媒采访，甚至派两名员工长期进驻报社，监管内部一举一动（S7、S11）。

除了前述直接而明显的新闻控制外，尚有多重规训化的机制与策略，如透过间接迂回的手段：使用通稿、公关施压或说情、视线转移、及封口费的方式，来进行新闻控制。

报导湖南嘉禾高考舞弊事件[6]中，中央政府高层领导，要求湖南省内的一切媒体，立即停止对此事件丑闻的一切正面和反面报导。全国媒体只能采用《新华社》的“通稿”，并且召回所有在湖南采访的记者，使得《长沙晚报》记者所写的 5，000 字稿件难以发表（孙旭培，2004）。

其次，政府直接明目张胆地使用“公关施压或说情”的手段，来阻碍对自己不利的负面报导消息。与我们一般认知沟通、建立形象的公关不一样，在这里具有粉饰太平的负面意味。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庄殿军，也有过类似“被公关”的经验。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在 2003 年播出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境内涌泉村，五天内连续三个农民连续自杀的事件调查新闻时，省委书记来电话“关切”（赵华，2008，页 42-43）。

此外，社会普遍存在“说情风”，上海媒体《外滩画报》对于平安保险公司进行长达半年的追踪报导，保险公司对于该报即将进行的负面报导，希望当面向报社“沟通”，甚至提出和报社合作的可能，但都被该报社一一拒绝。最后保险公司找来相关官员向报社进行关说，仍然被拒，但最后仍因不可抗拒之因素，终究未能刊登该篇报导（耿瑛、鞠靖，2010，页 68）。

至于“视线转移”，此种方法是以团体采访为名，转移记者的注意力。2000 年，河南洛阳大火采访的记者指出，上午八时记者接到宣传部主动来电，说明省领导要看望家属，并发表重要谈话，请各地来的记者们，于九时整随车出发，记者在车上不断询问是哪位领导要来？陪同者却闪烁其词。车子绕行许久，少数记者要求下车转移采访阵地，只剩下几名坚持留在车上等领导出现。少数记者前往洛阳酒店，准备采访国家安全生产专家人员时，赫然发现许多高级轿车停在门口，经查原是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正在 20 楼会议室，针对火灾一事开内部会议。记者们才恍然大悟，宣传部派采访专车，是在转移记者视线（田中初，2005，页 216-217）。

此外，用红包贿赂收买，或是俗称的“封口费”，也是权力对于媒体的一种控制方式。越是富有、或与政商关系越好的媒体，在舆论监督上的表现便越弱，在商业化利益诱使下，有些记者会去领厂商红包，或是参加有利益性质的记者说明会，媒体们俗称此种会议为“吹风会”

（S5、S7、S11、S12）。“红包”或“车马费”成了新闻圈的潜规则，实际上不合法。这样的潜规则在媒体当中也不容易被揭露，因为大部份的记者都默默认同行内不说行内的事。没有拿封口费的记者碍于陋习，也不会去揭发其它拿了红包的记者。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受访者（S2、S5、S10）均提出，不同地区新闻管制松紧程度也有差异。广州、上海、北京之间差异很大，此与当地发展历史和权力结构有关。如上海是新闻重要的发祥地，同时也是 1960 年代文革思想发源地，所以意识形态的控制，一直都是比较紧的，以偏左的意识形态，来遮掩经济的偏右，管制常比北京更严。广东的地理位置特殊，媒体不报导，隔天香港的媒体也会报导，且当地领导人也较开明，因此新闻氛围较开放，也因此孕育出《南方周末》，这样批判性相对强的媒体。

然而国家机器对于新闻控制的力量虽大，如同 Foucault 所言，权力是生产性的，也就是说越多的压制，反而往往会造成更多欲禁制的内容被陈述。透过规训产生的反作用力，出现在跨地区新闻舆论监督的报导类型、以及来自于网络媒体的压力。中国大陆对于新闻媒体，从中央和党的控制至地方保护主义的控制，是严谨而且较难突破。跨地区的监督报导方式，游走在中国政治体系的边缘，报导其它地区既不受到控制，也能避免红包或是广告的利益考虑诱惑。

整体而言，中国大陆政治体系对新闻体系控制权力的行使，对于中央级媒体采取自上而下严密的控制，地方媒体则在地方保护主义之下，接受来自中央与地方政府，双重的权力控制。除了直接的新闻控制外，还包括多重规训化的机制与策略运用。

肆、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在驯服与抗拒之间扮演的角色分析

以下针对研究问题（二），分析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在驯服、抗拒之间扮演的角色。

中国政府的权力分配，或是媒体阶层的权力分配，其情况自然比环场监狱的理论假设，还要来的复杂许多。因此若以 Foucault 的理论分析媒体，应着重分析组织组成中，每一个环节的权力施展，如政府对媒体、地方领导对媒体社长、总编辑对记者等等。若政府是监督者，媒体就是犯人。如果用在媒体编采部门的话，那么官派的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如：社长、总编辑，就是扮演着环场监狱中监视者的角色，而基层记者，则是被监督的犯人。

一、新闻媒体组织与管理阶层中的全景敞视主义与自我监视效果

中国的新闻媒体经过长久管制下来，许多新闻工作者心中，已存在着“度”的概念（段功伟，2010；张志安，2010；黄缨杰，2010；赵华，2008）。“度”在中国媒体术语，指的也就是“红线”、“尺度”的意思。也就是说随着被管制经验的增加，媒体已经很熟悉政府的议题尺度，因而不等权力前来干预，自己便会严守规矩。就如同 Foucault 环场监视主义论述所言，犯人知道自己正被监视，因此不敢轻易做出任何踰矩的行为。

部分受访的管理阶层（S3、S6、S7）表示，中国媒体工作者的自我监督，确实存在，而此机制甚至是报社经营下去的必要条件。在踩到底线之前记者必须要有所拿捏，冲动的记者虽然较有冲劲，但往往分寸也拿捏得不好，此时身为媒体主管，出面说服与协调变得十分重要。

此外，媒体在选题上，也产生自我设限的偏向情况。媒体中对科学文教类的报导题材偏多，主要不是因为此议题特别重要或受市场欢迎，而是由于政治与社会议题，通常敏感性高，不好碰触（S1、S6）。

上述管制阶层的痕迹，事实上在媒体单位中似乎屡见不鲜。赵华（2008，页 29，101）针对央视节目分析便指出，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也曾停止记者已完稿的调查性报导在《新闻调查》节目中播出。其过程是该台长预先揣摩上意，不等权力者发布报导禁令，便从经验上判断播出后，应会被惩处，而自行停播，产生自我监视的效果。

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 Foucault 所说的全景敞视主义与自我监视情况，在中国大陆媒体组织与管理阶层当中，确实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会顺从压迫，在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前提的情况下，有些媒体还是会有所抗拒，将于后文中说明。

二、新闻媒体管理阶层扮演的角色分析



中国媒体组织内的权力布局与人员编制，比起前述监狱的分工，更加复杂。中国大陆媒体的权力者从最上层的金字塔尖端开始，往下绵密的安排各种权力的管制，如此分工不但使得管理更容易，对于报导内容的管制也更为严密。中国大陆媒体的内部，采取三个阶层的管理机制。由上而下，依序是：主编（高阶）、主任（中层），记者（基层）（肖经栋，2010，页 78，85）。主编与主任，则同属于媒体中间管理者的职位。

媒体中间的管理阶层，实为对上对下的双头角色，扮演居间的协调者。上级往往透过电话，或是各种正式、非正式的文件对媒体下达禁令。如果报导出了问题，媒体主管便需要出面对上做“检讨”（S8）。一如何清涟（2007，页 255）在论及南方报业集团的主管任务时指出，向上级主管单位写检讨，是《南方周末》总编辑必练的基本功。

中国大陆媒体常被要求和政府站在同一条线上去解决问题。但新闻媒体通常在挖掘新闻议题后，发现事件多为民间抵制政府的角度，一旦报导，便容易违反中央的决策，反之，如完全遵循中央决策，则引起民众反感。此时管理者居中，一方面基于新闻专业，须让记者继续从事报导，另方面又得从旁了解与厘清事件状况，协助政府透过沟通，化解问题（S1、S3）。

但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 Foucault 所假设的环场监狱的情况，新闻媒体主管，除了身兼管理者与协调者的角色以外，在媒体这个“监狱”里，犯人有可能跟管理者，站在同一阵线抵抗上级权力压力。也就是说，在监狱的想象里，管理者总是帮忙对下压制犯人，但是在新闻媒体这个行业，新闻记者有时往往能够取得管理者的庇护，不总是需要听命于权力。一位受访记者（S3）即表示，

昔日记者和编辑争取采访权，是一种常态，记者拿出一个麻烦的稿子，编辑爱死了，因为你是行使了报社的权力和义务，因此当你受到一些处罚时，大家都能理解，但不会因此让你丢了工作……

在中国媒体组织的环境里面，管理者确实难为。受访者以《南方周末》历任总编辑举例，新闻主管本身的信念与态度，影响着其站在官方、或是站在一线记者多一点（S8）。在不同的领导风格下，记者所能发挥的舞台，也会有所变化。

一位曾担任《南方周末》与《南方都市报》新闻部主管的受访者认为，他会要求第一线的记者不要自我审查，因为后面的审查已经够多了，这不该是第一线记者要管的事，往上更高层，

自然有人会做处理或对外解释的动作（S6）。因此，在受到长官庇护的前提下，受访记者（S13）便表示，之前曾经采访某银行行长打人的事件，行长威胁要打给市领导，该记者与编辑讨论后，还是决定先发稿出去，他认为南方集团的报社，还是比较有理想性，批评下来时，只要不是重大失实问题，来自内部压力不大。

《南方都市报》报导孙志刚在狱中被霸凌致死的事件，激起了中国大陆舆论的哗然，最后导致国家废除了收容制度，广东政府领导也因此被认为有缺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前社长范以锦，在此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则偏向保护记者，对上级做出抵抗。受访主管（S8）说，南方集团是依照逐一题材与政府进行博奕，透过控制情绪与发挥理性，想办法将报导拉回新闻本位。

综合上述，新闻媒体的中间阶层主管，实担负着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双重任务。如果报导出了问题，除了帮忙上级管制下属，有时还要原则性地保护下级，帮忙对上抗争，才不会使得下属心生不满，影响到媒体的运作。然而不论是面对从上而来压制的力量，还是面对从下升起的反抗力量，中间者都首当其冲。《南方周末》因时常抵触政府禁令，编辑主管屡次遭政府撤换。有些新管理者上任后，无法获得底下员工认同，此时记者会采取较为抗拒的态度（S8），在管理者没有充分取得协调的情况下，《南方周末》便爆发过大批记者的出走潮，此事件看在许多资深记者眼里，依然觉得殊为惋惜（S2）。

至于在新闻媒体管理阶层驯服、抗争策略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方面，由于新闻媒体管理阶层，面临对上（国家机器）、对下（基层新闻工作者）的双重角色，因此，在双头角色上，都有驯服与抗争的作为。在媒体工作者的行为与新闻文本的呈现上，所谓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实为一体两面的存在关系，公开文本背后，隐藏了行为者想要表达的隐藏文本。

当新闻媒体管理阶层扮演被支配者角色时，其实是跟第一线新闻工作者站在同一阵线，做出抗争策略，与基层记者站在同一战线，使用隐藏文本的手段，来达到抗拒的目的（详见第伍部分分析）。

伍、新闻媒体工作者实践新闻专业的驯服与抗争策略分析



处于第一线新闻媒体工作者，看似在权力生物链的最末端，必须向支配者驯服，然而在新闻实务的运作上，也不难发现第一线的记者，或者单打独斗，或者与媒体主管共谋，出现对国家机器抗争的行为。以下针对研究问题（三）：分析中国的新闻媒体工作者，其驯服、抗争策略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表现，以及其与支配者间，交互渗透与斗争的过程。

一、新闻工作者抗争策略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分析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向是中国社会各个领域规避、软化、抵抗上级政令的有效方式。新闻记者面对权力支配时，往往主动适应，透过临场发挥或报导资源，来达到抗拒的目的，而非一味的退让（田中初，2005）。

新闻工作者往往在从事抗争策略时，公开表现的是接近驯服的公开文本，而其骨子里所隐含的，是具有抗拒意涵的隐藏文本。在此本文以隐藏文本的分析架构为依据，汇整出一套属于中国大陆媒体工作者的避祸抗拒策略，分别为：“时空转换策略”、“责任转移策略”、“报导事实策略”、“合纵连横策略”“反客为主策略”、及“钻研漏洞策略”六种策略。并将每个策略的实施方法，分析如下：

（一）时空转换策略

中国大陆对新闻的管制，呈现时松时严的状况。时空转换意指，运用采访与刊登报导的时间与空间策略，来突破新闻控制的限制。

1. 等待时机法

各种国内外的重大事件，都会影响到当时中国有关单位，对于新闻管制的松紧程度，例如奥运时期外国媒体增多，所以管制相对开放。但待奥运结束后，正好遇上世界金融风暴，局势不平静，所以又再管制，待平静后又会再开放。故针对某些重大新闻，以南方报业集团为例，即使禁令已经发下来，通常还是会要求记者把采访作完，先储存起来，等待中央级的媒体发布，再赶紧跟进，或是等到禁令较松时，再将报导发出，上述种种进退的考虑与作法，皆是为了避免冒险冲撞（S2、S4、S6、S13）。另外肖经栋（2010，页 121）也指出，《江南都市报》新闻部主任张宁，在《南昌晚报》任职时，针对南昌淹水问题，有系列监督报导的想法。但由



于涉及南昌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批评，因此他先暂时搁置调查好的报导，后来转至隶属于江西省的《江南都市报》任职时，便可以不受南昌政府的管制，将先前想法付诸实行。

2. 见缝插针法

有时记者报导被禁令牵制住，但一旦情势改变，便能把握时机，将许多不能被报导的讯息，偷渡进报导里面。如《21 世纪经济报道》资深记者左志坚（2010，页 226）指出，该报曾经想报道上海市官员贪污腐败的相关案例，但当局严令不准报导，于是他们便将稿件暂且按住不发。几天后，因别的案子，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孙路遭到司法判决，便赶紧趁着写孙桉的时候，将本来不敢报道的消息，通通隐晦地写了进去，成功偷渡了本来被禁止的案例。

3. 减少权力反应的时间

到现场进行实际采访需要充分时间，但在中国大陆，往往记者到当地采访之前，就已经被上层权力单位知道，接着该单位便会要求报社召回记者，禁令马上跟着下来。因此减少权力反应的时间，也成了记者顺利报导的一种手法。

过去任职于南方报业集团高层主管便表示，一些禁令或重大事件，媒体可以抢在有关部门通知或禁令到达之前，把报导发布出去。如检察院的案子后续，可能会送到法院，但通常法院的案子，都会规定要等到审判结束后，才可以进行报导，记者就会利用开庭前空档，把报导刊发出去。这种媒体操作面的技巧，在平面、电子与网路媒体都适用（S2、S13）。

值得注意的是，网路的兴起，似乎更有助于抑制权力反应。有些引用网路消息的报纸，当天采访，当天出稿，报道速度迅速，报道往往在官员还不知情时，便已刊登出来（S1、S2、S3）。

4. 版面乾坤挪移法

媒体编辑有一种隐藏文本的编辑手法，即利用报纸各个版面不同空间，把会被政府盯上的重要新闻，排在报纸不起眼的地方。受访者当中一报纸主管，便提到观察中国报纸的时候，不要只考察头版头条，因为头版的内容，往往都是跟政治妥协过后的产物，有时反而是监督力度最弱的文章（S2、S8）。

《南方日报》记者段功伟（2010，页 139），在《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的报导当中，便采用正反双方的说词，把与官方口径不同的报导，放在较不起眼的第三版，以免让官方

或外界指责是“添乱”或“帮倒忙”。最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果然他们放在第三版的报导说法才是正确的。这便是善用了一些“隐藏”的技巧，使得报导得以发声。

陆晔（2003）研究指出，另一种抗拒策略，则是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将集团内媒体做“任务性”区隔，形成“母报对上，子报对下”；或者在同一份报纸上把版面分割，一部分版面对上，另一部分版面对一般民众。达到所谓的“两老满意”，此种变通方式，既不冒任何抗拒宣传管理的风险，完成自上而下的宣传任务，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媒介自身的利益。

（二）责任转移策略

为避免自身或引述的消息来源，被秋后算帐，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转移自身责任，以规避责罚的方法，便应运而生。

1. 隐匿消息来源法

受访者（S1、S10）指出为使自身不受到权力的报复，记者将有争议的新闻来源隐匿。如中宣部公布禁令，不允许转载《南方都市报》网路报导，其它媒体若欲转载，势必会面临风险。然而南方报系内的小媒体，可引用《南方都市报》作为消息来源，而其它媒体就可以引用小媒体作为消息来源，如此最后媒体在引用消息来源上，便不会出现《南方都市报》关键字眼，藉以模糊原始消息来源。

有时权力单位规定，实体媒体不得被转载时，如《南方周末》会将消息放在南方报系的网路上，此时其它媒体要转载《南方周末》的报导，就可以改以转自网路的名义，而不违反规定（S13）。此外曾任职南方报业集团的受访者（S7）指出，报社一开始在文章上为编辑者挂名，但此制度后来取消，有时也模糊化报导的时间、地点，目的是为了保护采访记者。

2. 转换消息来源法

将消息来源转换他处，使得自己不会成为第一的带头揭露报导的媒体，自然也能避免遭到究责。通常受管制相对不严的媒体，也就容易收到其它消息来源所提供的报导题材。如有一件新闻新华社记者早已知悉，但碍于政治岗位不便报导，此时便可以私下将消息来源分享给当地媒体，等当地媒体一报，新华社便可跟进报导，且不用冒政治上的风险，因为这时，报导的不是他们，他们“只不过是跟着报”罢了（S1、S5）。

另外，网际网路的兴起，也提供了新的博奕筹码给传统媒体。《南方都市报》的“网眼版”，若某件事件事涉敏感，可能无法报导，记者编辑可能会自己上网站发帖，引发讨论后，再以网路热帖的名义来报导，其实很多桉例都是记者自己做的（S9）。这就是利用事实不可以报导，但谣言可以报导的漏洞，将消息来源顺利转换成不好攻击的目标，顺利躲过受罚（S5）。

（三）报导事实策略

1. 强调新闻事实法

涉及批评性报导时，报导过程必须将各个新闻讯息进行平衡客观的梳理，以确保事后官方追究时，能提出有利的报导事证来保护自己（S2、S10、S12、S13）。也因此，像经常被官方盯上的南方报业，内部就规定，报导不能再用“据记者了解”等类似的模糊字眼，必须把资讯源交代清楚，以此来规避一些事后审查的风险（S2、S13）。“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决不说假话”成了《南方周末》的一句经营口号。如此一来，有关部门就算想要打压，也不知从何下手。

其中从事新闻编辑工作的受访者也表示，只要把事实报导出来，不一定要站在哪一边，而且政府官员也抓不到你的把柄。如报导某人因为某事被抓了，却绝不谈他被抓对不对。只说政府准备推什么政策，但绝不论政府推这个对不对。其实阅听众都是聪明的，只要媒体把讯息播报出来，不用媒体去表达立场，他们就能知道（S1、S6）。

2. 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生存本事。古代因为不能直接得罪皇帝，因此就算不赞同，写文章时也得包装一点东西，如此透过较隐晦的方式，进行打游击、曲里改旁、指桑骂槐。在特定的背景下，就是能让人看得懂，甚至让官方理解是一套，但民众的理解又是另外一套（S2、S6）。

发展特殊的写作体例风格，以撰写故事夹叙夹议的报导陈述方式进行，被《南方周末》主管称为“南周的话语系统”。是刻意形成的一种风格，并形成共识，对于一些可能比较敏感的事件，使用比较隐晦的话语来包装，对于禁止说的话，采取打游击的春秋笔法，实行隐藏式文本（S6）。

另外，针对某些事件，官方常规定要报导就只能使用新华社通稿。有些媒体便会改采用写社论的方式，在内容中夹叙夹议，或导入感性诉求的故事，藉此弱化文章的批评力度（S3）。

（四）合纵连横策略

在中国新闻界，有时候独家反而是危险的。因为目标容易遭到权力的集中攻击。面对难度大、争议性高的新闻题材，有赖一些外部策略，才能达成报导的目的。地方媒体编辑常需要对照参考中央级媒体的报导议题，以避免内容特立独行被官方盯上，此动作被称为“对版面”（S10），这和其它国家媒体“抢独家”的思维，非常不一样（S2、S6、S13）。

1. 民粹法

利用广大的民意，迫使主管单位屈服，在中国已成了一种越来越有效的办法。像是辽宁省西丰县，因为记者报导一篇题为“辽宁西丰：一场官民较量”的新闻，而派警察来抓记者。当事人下台后，七、八月又在其它单位偷偷上台，网民发现后，穷追猛打，搞得该书记又被迫下台，该单位被迫表示官员任命是有问题的（S5）。

受访的媒体主管（S1、S2、S4）乐观的认为，舆论环境不管多艰难，民意兴起，一定就会开放。其中，网路扮演尤其关键的角色，网路发达的地方也比较容易出新闻。由于网路没有边境，对中国舆论监督非常强大，强大在民间的舆论、新媒体的舆论和传统媒介的舆论，形成一种“合力”现象、强大舆论。即指，老百姓有意见－上网发布－形成民意、舆论－然后传统媒体编辑报导。如此利用民众的力量，让权力者对于新闻报导，必须做出一些让步。

2. 合作突围法

中国大陆虽然缺乏有影响力的记者组织，但是小范围的记者组织还是存在，时间一久大家彼此之间相互熟悉，自然会形成松散的记者群体。而这种记者群的内部讯息沟通比较顺畅，一旦碰到重大事件，往往也会联合其馀媒体相互讨论，尤其是批评报导，记者联合起来做，以此来降低风险（S8、S13）。

媒体之间虽不连系，但勾结，并保持良性的互动。由于中国大陆媒体有地区的差别，不同媒体管制的松紧程度不一，有时候是与国外媒体合作，有时是与中央级媒体合作，如果中央媒体监视的紧而不能报，就送到广东等相对开放的媒体去报导。如果还是被管制，就在送到网路

上去报导，只要让新闻上了谈论平台，就有机会成为全国性大新闻，给了官方压力（S1、S5、S8）。

《南方周末》在媒体阵线之中，便时常获得其它媒体不敢报导的消息，等《南方周末》一报导，其它媒体便以盟友之姿纷纷跟进，形成更大的报导力量（S8）。这样的方式有合作也有竞争，但是至少在禁令颁布以后，如能利用这些彼此合作的方式进行突破，对于报导策略而言也是相当有效的（S2）。

（五）反客为主策略

中国大陆媒体的特殊环境，使得媒体产业落在许多权力的阶级之中。有时记者往往会利用这些阶级，来对自己上一级的管理者进行突破。而藉由这种方式，能让媒体由被动的状态直接转为主动，进而掌握到控制权，往往让被压制的相关单位有如哑巴吃黄连。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一有机会立刻把握住，进而掌握主导权，其实际意义与喧宾夺主相同。

有的记者，会主动将事件送交到上一级的政府进行审查。或是访问上一级的政府，以上司来当做靠山，让低层涉弊单位较不敢有所异议（S1、S2）。就像是记者想要批评江苏某一学校，便可以先将报导给江苏省教育厅看，然后直接去采访，这样就可以说是政府经过采访许可的，要求对方配合采访（田中初，2005，页 237）。

（六）钻研漏洞策略

中国大陆没有成文的《新闻法》，各种管制报导的禁令没有具体法规条文可寻，记者便有了许多找漏缝钻的机会（S10）。例如官方禁令规定：事实不可以报导，那谣言并未禁止报导。因此有些记者便以猜测性的报导方式，同样把事实勾勒出来（S4）。

事实上，跨地区新闻舆论监督的作法，便是记者利用漏洞所钻研出的突破报导方式。地方政府对媒体监督本地政府有严格的管制，但却未说不能去监督别地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眼看媒体不是监督自身，因此就睁只眼闭只眼，媒体因此又成功地创造出额外的报导空间（S5）。

综合上述，可发现记者能够避免被权力打压的方法有相当多，这也是中国大陆特殊的体制下，所产生的媒体独特现象。其中记者的反抗行为，可以是个人的、也会运用集体行动的合纵连横，相互形成松散的记者联盟，彼此合作达成报导目的。跟其它国家的新闻媒体比较，这些策略显得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且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大陆媒体这样的抗拒发展还会持续

的改进，尤其是网路的高速发展，更使得抗争策略的发展，带来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快速的变化，值得我们持续研究与观察。

二、新闻工作者与支配者间的抗争分析

在中国政府对新闻的管制下，中国媒体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在报导重大、或较敏感的议题之前，必须要先经过主管单位的审核，或是向上级“请示”。对于大部分记者都懂得，报导前应该要清楚底限在哪里，勤于向上级“请示”，才不容易误踩红线（肖经栋，2010，页 4）。尤其是越靠近中央，且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媒体，越是需要请示，播出前的送审，更是自保的最好手段。

媒体未经请示踩线后，所遭遇到权力的惩处的桉例为，2005 年河南汝洲市发生一起煤矿事故，当时《河南商报》的记者范友峰发现了这个消息，便两度前往当地进行采访，总编辑马云龙看了记者的写稿以后，下定决心要揭发，交代记者要留下证据，以便将来打官司用。但尽管媒体备有录影录音等证据记录，最后报导发出后，《河南商报》还是被停刊整顿一个月，理由是“报导严重损害中国新闻界的形像”，马云龙也被勒令解聘（张志安、黄缨杰，2010，页 177-178）。

《南方周末》便是清楚知道舆论监督的底限在哪，才能在改革中求生存（肖经栋，2010，页 115）。《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向熹，形容南周的生存状态为，在市场上获得广泛影响的同时，却屡屡出现危机。而前社长范以锦总结其经营心得指出，中国办报的基本规则必须遵守，要注意新闻的规律，也要注意国情。所以《南方周末》是在两者之间调节，底线要自己拿捏。如果不注意国情盲目冲撞，最后便无法生存。但是如果凡事不及时报导，该告诉民众的不说，那么报纸同样会走向灭亡（范以锦，2006，页 54）。由此可看出，媒体在中国经营时，如何在市场与政治之间做好策略上的拿捏，并掌握底线，成了生存所必须的熟知的艺术。

测试底限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媒体看重的不只是当下节目可不可以播出，还更看重以后这种报导路线能不能走下去。当时央视《新闻调查》节目，其中一集因评审没过，而后续的制

作与播出显得格外艰辛。反之如果测试成功，那么以后可以播出的路线变宽广的多，就等于是把限制的窄门缝又撑大了一点（赵华，2008，页 50）。

因此，为了要最大可能的拓展新闻的模糊边界，各种抗争手法，其实是媒体转型生存的必要手段。新闻改革虽然有明确的边线，但政府的新闻禁令是具体的，一旦实际应用在新闻实务上，还是无法将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穷尽，这时在安全区与禁区之间，就会出现灰色地带。媒体必须善用一些之前描述过的“边缘突破”、“打擦边球”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底限”和“技巧”，来不断的测试如何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张志安，2010）。

而对于具有冲劲的记者来说，灰色地带是新闻实现主动性、开拓性、创新性的最好时机。每一次在灰色地带的冲击，都有可能把危险的东西转化为合法和安全的事情，进而逐渐缩小禁区，使之成为事实而让大家接受与习惯（田中初，2005，页 224）。如针对“不准报导”、“暂不报导”、“谨慎报导”、“不要炒作”、“以发通稿为准”、“按通发稿发表”等不同的说法，记者就可以有不同的发挥空间。这是根据长久以来的新闻实务经验，所判断出来的策略（田中初，2005，页 234）。

在这样的测试与打擦边球的抗争中，媒体一些测试底限的“创意”便很常见。例如 80 年代初期，广东《羊城晚报》复刊不久，发生了一起船难意外，死了两百多人。有关单位马上封锁消息，要求媒体不许发表死亡人数。当时《羊城晚报》吴姓总编辑，便将记者调查到的资料，整理以后发表见报。有人问他为何不发表死亡人数？他回答：“不，我只发表生还人数。”此例便是记者钻过禁令上的漏洞，将想要发表的讯息发布出去的桉例（田中初，2005，页 235）。

陆、结论与讨论

中国大陆政治体系对新闻体系控制权力的行使，对中央级媒体采取自上而下严密的控制，地方媒体则在地方保护主义之下，接受来自中央与地方政府，双重的权力控制。除了直接的新闻控制外，多重规训化的机制与策略还包括：使用通稿、公关施压或说情、视线转移、及封口费的方式，也被用来进行新闻控制。

本研究发现，Foucault 所说的全景敞视主义，在中国大陆新闻组织与主管机构中，确实存在，接近圆形监狱的机制，存在于新闻媒体体制，其中，政府扮演监督者，媒体管理阶层，如同狱卒，而第一线新闻记者就像是犯人。

然而，媒体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会顺从压迫。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同时扮演着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双重角色，采用公开文本，表示对上驯服，另一方面，也透过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对下展开驯服管理措施。至于其抗争策略，则常基于避祸或庇护记者，选择与记者站在同一战线，运用类似排版技巧或版面区隔等“隐藏文本”的手段，达成目的。

新闻工作者的抗争策略与隐藏文本的执行方式表现在，“时空转换策略”、“责任转移策略”、“报导事实策略”、“合纵连横策略”、“反客为主策略”及“钻研漏洞策略”上。且可发现，记者的反抗行为，可以是个人的、也会运用集体行动的合纵连横，相互形成松散的记者联盟，彼此合作达成报导目的。

李小勤（2007）指出，传媒的越轨对组织而言，并非冲红线、有意识的地对立，其本意是推动正当的争议，甚至是对核心意识形态的维护。但因为核心意识型态张力与冲突，多在幕后，是统治阶层隐蔽的脚本，需要传媒的推测揣摩，所以传媒的弦外之音，往往会碰触到某些敏感地带，嘎然而止。

然而，本研究显示，即便在新闻控制严苛的中国，对于权力抵抗的隐藏作为，确实存在于新闻实务界。在中国的新闻体制，未能从事根本的制度变革之前，本文无意探讨这样的抗拒策略，最终将导致怎样的结果，因为权力端终究拥有中国新闻传媒的生杀大权。过去中国大陆新闻的相关研究，重视分析公开文本，忽略了 Scott 所说的权力研究的死角，本文价值在于观照新闻工作者隐藏文本的反抗策略，企图勾勒出新闻控制权力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整体而言，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与支配者间的交互渗透与斗争，是相当激烈的，通过一次次的冲撞与测试底限，其目的虽然不是为了创造一个全新的体制，而是期望透过每次与支配者的交锋，在严密的新闻控制下，拓展新闻专业表现的空间。

此外，中国大陆目前对于新闻媒介的新闻控制，已经避免赤裸裸公开行刑式的强制性作为，而是采取各种不同的干预与施压手段，规避社会各方与国际社会的谴责。在一个尚不具备充分新闻采访权的中国大陆新闻界，更是需要运用本文所提的隐藏文本抗争策略，为采访与报导争取更多的新闻专业空间。



学者曾针对台湾报社研究指出，媒体配合新闻工作者对组织与新闻专业的效忠，形成一种封建式权力关系，因而他主张发展新形式的迂回策略回应新闻工作自主（张文强，2002）。本文呼应这样的观点，并建议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者应持续采取隐藏文本策略，为推进新闻自由空间而努力。此外，中国大陆的新闻专业教育中，则需要多传授隐藏文本抗拒的技巧，让新闻界的生力军未来投入实务界，藉以在中共政治权力控制下，尽可能地发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注释：

1 研究者赴中国大陆田野调查时，南方报业集团内部人员表示，2009 年为「两南年」，中央对于南方报业集团的两份报业，控制得相对严厉，而部分南方报业集团主管与一线记者，也都相对噤声。

2 磨洋工，意指在一定时间内可完成的工作，但是采取怠工方式，慢慢做。

3 红灯停：见到红灯才停，任何其他时候都往前冲；打土围子：在权力压力较大时，权力弱势选择让权力中心可忍受、又具典型意义的「小土围子」攻破；见木不见林：规避风险的方式，让案例说话，做到不颠覆制度、不对抗政府、不做整体的否定。

4 内参，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华社内部（不公开）发行的机密文件，是中共高层重要的政治信息文件之一。其内容包括与政治有关的核心内容，如领导人有关政治的态度和决策方向等。

5 不同于立法规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公布于报刊媒体的发布方式，而是在权力机关和有关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内部层层传达。文件的结尾都会有传达到哪一级的要求，比如省军级、县团级等，有的还有密级要求，如加注绝密、机密、保密，因其上部的标题为红色，人们习惯称之为「红头文件」。

6 2000 年 07 月 13 日，湖南嘉禾高考产生舞弊事事件，造成严重的后果，致使该考点 510 名考生中的 203 名考生，被省教育厅招生考试中心取消高考资格，77 名考生相关科目作零分处理，嘉禾县各类教育全国统一考试考点资格被取消。

7 孙志刚事件发生于 2003 年，指的是原籍湖北黄冈的孙志刚被广州市政府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的事件。此事件虽经官方声称为收容所员工犯罪的个案，却引发了中国国内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

参考书目：

中国新闻网（2008 年 10 月 13 日）。〈「清正廉明」「不做假帐」：朱镕基四次破例题词〉。取自「湖南红网」http://gaige.rednet.cn/c/2008/08/18/1576167.htm

方可成译（2009 年 8 月 1 日）。〈胡舒立：中国最危险的女人〉，《绝版青春——方可成的博客》。上网日期：2009 年 9 月 12 日，取自 http://www.fangkc.cn/2009/08/page/3/（原文 Osnos, E. [2009, July 20]. The forbidden zone. *New Yorker.* New York, NY: New Yorker Publishers.）

王毓莉（2009）。《中国大陆，<南方周末>跨地区新闻舆论监督报导之研究>，《新闻学研究》，100: 137-187。

王毓莉（2010）。《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一个新闻舆论监督的考察》。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左志坚（2010）。〈《21 世纪经济报导》：调查如何彻底〉，张志安（主编），《潜入深海——深度报导幕后三十年的深度轨迹》，页 220-230。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田中初（2005）。《新闻实践与政治控制：以当代中国灾难新闻为视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余韬（2009）。〈弱者的武器 《贫民富翁》中的叙事时空与内容分析〉，《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 9-103 。





何清涟（2004）。《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中国人权研究报告”》，《何清涟文集》。上网日期：2008 年 12 月 17 日，取自“百家争鸣”http://www.boxun.com/hero/heql/35_1.shtml

何清涟（2007）。《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文化。

李猛（1999）。《福柯与权力分析的新尝试》，《社会学理论学报》，2(2): 375-413。

李小勤（2007）。《传媒越轨的替代性框架：以<南方周末>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2: 133-160。

汪育如（2005）。《免不了的一刀—台湾产妇的社会建构》。东吴大学社会研究所硕士论文。

沉幸如（2003）。《天堂之梯？—台越跨国商品化婚姻中的权力与抵抗》。清华大学社会研究所硕士论文。

沉业川（2010）。《社会记录：一个异类央视节目的五年史》，张志安（主编），《潜入深海——深度报导幕后三十年的深度轨迹》，页 40-57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肖经栋（2010）。《记者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尚衡 译（1992 ）。《性意识史第一卷：导论》。台北：九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原书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The will to knowledge.* Ne 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武婧（2006 ）。《从“小心中毒”到“放心食用”——<每周质量报告>2004 年变调分析》，展江、白贵（编）《中国舆论监督年度报告 2003-2004 》（下册），页 852 -866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金光亿（2008 ）。〈民俗文化的构建与国家—社会关系——以韩国江陵端午祭为例〉，《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术通讯》，4: 11-15 。

姜红、许超众（2008 ）。〈从「斗士」到「智者」：舆論监督的话语转型——新世纪以來《南方周末》文本分析〉，《新闻与传播评论》，7 。取自
http://journal.whu.edu.cn/research/read_research.php?id=1107

段功伟（2010）。《经略蓝海—一位时政记者的职业行思》。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胡正荣（2007 年 4 月 15 日）。《媒介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取自“中华传媒网”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546

范以锦（2006）。《南方报业战略—解密中国一流报业传媒集团》。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郇建立（2007）。《“弱者的武器””及其意义〉，《二十一世纪》，6 月号。取自 “乌有之乡 UTOPIA”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707/21050.html

孙旭培（2001 年 12 月 18 日）。〈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导为例〉。取自”中华传媒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611

孙旭培（2004）。《当代中国新闻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

耿瑛、鞠靖（2010）。〈外滩画报：深度报导的另类探索〉，张志安（主编），《潜入深海—深度报导幕后三十年的深度轨迹》，页 67-82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高菲（2006）。《叙事学视野下的<每周质量报告>》，展江、白贵（编），《中国舆论监督年度报告 2003-2004》（下册），页 843-851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高宣扬（2004）。《傅科的生存美学—西方思想的起点与终点》。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张文强（2002）。《媒介组织内部权力运作与新闻工作自主：封建采邑内的权力控制与反抗》，《新闻学研究》，73: 29-61。

张志安（2008 ）。《深度报导从业者的职业意识特征研究》，《现代传播》，5: 50-53 。

张志安（2010 ）。《导言——深度报导 30 年：轨迹回望与专业反思》，张志安（主编），《潜入深海—深度报导幕后三十年的深度轨迹》，页 3-22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张志安、黄缨杰（2010 ）。《报人马云龙的新闻口述史》，张志安（主编），《潜入深海—深度报导幕后三十年的深度轨迹》，页 167-178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张贵闵（2007 ）。《国家、移民、身体：中国城市外来人口生育政治》。清华大学社会研究所硕士论文。

张裕亮（2005 ）。《从党国化到集团化——大陆报业结构变革分析》，《东亚研究》，36(1): 49-104 。



连隽伟（2009 年 11 月 10 日）。〈谈判破裂 《财经》胡舒立辞职〉，《中国时报》。上网日期：2009 年 11 月 10 日，取自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50501833+112009111000247,00.html

陆晔（2003 ）。〈权力与新闻生产过程〉，《二十一世纪》，77: 18-26 。

陆晔、潘忠党（2002 ）。《成名的想像：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71: 17-59。

郭于华（2001 年 11 月 27 日）。《“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 ——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取自“学术中华网”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1126

陈怀林、陈韬文（1998 ）。《鸟笼里的中国新闻自由》，何舟、陈怀林（编），《中国传媒新论》，页 50-65 。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

乔云霞、胡连利、王俊杰（2002 年 10 月 18 日）。〈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现状调查分析〉。上网日期：2003 年 4 月 2 日，取自「中华传媒网」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xsqk_view.jsp?id=1114

曾华国（2006）。《中国式调查报导》。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黄煜文（1978）。《傅科的思维取向—另类的历史书写》。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

黄缨杰（2010）。〈在细雨中呼喊：《新周报的短暂历程》〉，张志安（主编），《潜入深——深度报导幕后三十年的深度轨迹》，页 23-39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赵华（2008）。《央视新闻调查幕后解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赵鼎新（2007）。《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更新与中国经验》。台北：巨流出版社。

刘北成、杨远婴译（1992a）。《规训与惩罚一监狱的诞生》。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原书 Foucault, M. [1977].*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

刘北成、杨远婴译（1992b ）。《疯癫与文明》，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原书 Foucault, M. [1973].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赖祥蔚（2002 ）。《国共政权控制报纸的政治经济比较》，《新闻学研究》，73: 133-165 。

Anderson, G. (2008). Mapping academic resistance in the managerial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15* (2), 251-270.

Blommaert, J., Bock, M., & McCormick, K. (2006). Narrative inequality in the TRC hearings: On the hearability of hidden transcripts.*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5* (1), 37-70.

Chan, J. (1995). Calling the tune without paying the piper: The reassertion of media controls in China. In C.-K. Lo & M. Brosseau (Eds.),*China Review 1995* (pp. 5, 1- 5, 16). Hong Kong, China: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 (1973).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R. Howard Trans .).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1)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A. Sheridan, Trans .).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5)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The will to knowledge.* (R. Hu rley, Trans.). London, UK: Pengu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6)

Foucault, M. (1994).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 Vol. I-IV. Paris, France: Gallimard.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 New York, N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Horsley, RA (2004). Introduction 一Jesus, Paul, and th e “arts of resistance”: Leaves from the notebook of James C. Scott. In R, A. Horsley (Ed.), *Hidden transcripts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 Applying the work of James C. Scott to Jesus and Paul* (pp. 1-28). Leiden, The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rill NV.

Murdock, G. (1982).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In M. Gurevitch, T. Bennertt, J. Curran, & J. Woollacott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pp. 118 -150). London, UK: Methuen.



Murphy, AG (1998). Hidden transcripts of flight attendant resistance.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1* (4), 499-535.

Scott, J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the peasant resistance* .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C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Tracy, SJ (2005). Locking up emotion: Moving beyond dissonance for understanding emotion labor discomfort.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72* (3), 261-283.

West, I. (2000). Debbie Mayne's trans/scripts: Performative repertoires in law and everyday life.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5* (3), 245-263.

（王毓莉，中国文化大学大众传播学系专任教授。本文原载于《新闻学研究》第一一〇期，2012 年 1 月，原文链接：http://mcr.nccu.edu.tw/110/110_02.html）

【返回目录】



9-7 芮必峰：媒体与宣传管理部门的权力关系——以“命题作文”为例



“‘党管媒体’是我国现行新闻体制的一条重要原则，但这里的‘管’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领导与被领导或上级与下级之间的权力关系。事实上，在整个‘权力’的具体实施和运行过程中，宣传管理部门与媒体之间绝非只是简单的主动与被动或‘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在具体新闻生产中，我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表现为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即与执政党的关系。“党管媒体”是我国现行新闻体制的一条重要原则，但这里的“管”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领导与被领导或上级与下级之间的权力关系。事实上，在整个“权力”的具体实施和运行过程中，宣传管理部门与媒体之间绝非只是简单的主动与被动或“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本文试图以具体新闻生产中的“命题作文”为例，来考察我国媒体与宣传部门的权力关系。

一

“命题作文”，顾名思义，是指宣传主管部门根据一定的宣传目的和需要指派所辖媒体所做的报道，业界也称“规定动作”。多数情况下，命题作文是由党报、党刊和国家通讯社来承担，它是“命令型新闻体制”下“常规”新闻生产的一种“特色产品”。考察这种特色产品及其生产过程和方式，对进一步认识宣传管理中的权力运行及其关系似乎更具典型意义。



从近年来的新闻实践看，命题作文的主要形式包括“典型报道”和“主题宣传”两大类型，前者通过“对具有高度示范性、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工作经验的深入报道”来“集中体现有关宣传导向”，影响和带动“一般”，属党报宣传的“常规型武器”；后者“以党和政府重大战略、重要决策为主题，通过精心策划，分专题、成系列、多角度、立体式地集中推出重点报道，迅速形成声势、规模和高潮，营造浓厚氛围，有力引导舆论，是近年来新闻宣传中采用的一种新形式。“典型报道”和“主题宣传”当然也并非全都是来自上级宣传主管部门的命题作文，但一些重大“典型”和“主题”的报道与宣传基本如此。

下面是 2004 年 4 月一次重大典型的宣传。

2004 年 4 月 11 日起，中央 13 家主要新闻媒体按照中宣部的部署和要求，精心策划、组织青岛港桥吊工人许振超的先进事迹报道。和所有的重大典型报道一样，这次报道从典型的确定、宣传基调定位到协调组织、集中推出、层层深化，都是在中宣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刘云山同志到青岛港码头看望并接见许振超，并高度评价在许振超身上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的精神、民族的精神、时代的精神，特别是体现了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作为，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贡献，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牺牲的青岛港精神”。这既是此次典型报道的总体指导思想，也为这场宣传确定了基本基调。

中宣部副部长李东生亲自坐镇指挥，与许振超先进事迹采访团记者座谈，“要求记者们思想认识到位，增强报道实效，提高典型宣传的社会影响力，并提出增强典型宣传的实效不仅是中宣部对新闻媒体的要求，也是媒体自身提高影响力、公信力的需要，希望记者们把许振超先进事迹的采访报道当作加强与改进典型宣传的探索与尝试”。在报道集中推出前，中宣部新闻局、宣教局还“召集各新闻单位负责许振超典型宣传的领导和记者进行座谈，从发稿日程、规模、规格、规程以及改稿、评稿、版面安排、专题节目刊播等各方面作出详细部署”，组织者表示，典型宣传结束后还要进行评比和总结。

面对这样高规格的“命题作文”，各媒体领导自然高度重视。《人民日报》当时的总编辑张研农、副总编辑江绍高作出特别批示，要求选派得力记者参加，确保报道高出一筹；承担宣传任务的中央电视台记者“鼓足勇气向台领导申请(关于许振超的报道)每集(在“新闻联播”播出)3 至 4 分钟的时间，罗明副台长明确表示:为保证宣传的质量我给你们 4 分钟，新闻做得好还可以长”，片子做完在审查中尽管时长超过了 5 分钟，但领导还是觉得不解渴，又让延长

了细节的长度；工人日报社总编辑、副总编辑亲自参与报道的策划，审定稿件和版面，并在编前会上多次明确："宣传重大典型是新闻媒体的重要任务之一，对中宣部部署的'规定动作'，不但要积极完成，而且要当作硬仗打，力求'打'出特色、'打'出彩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农民日报》、《法制日报》等新闻单位的领导也都就此进行了具体安排和部署。参加许振超先进事迹采访团的记者普遍"深感责任重大"、"压力很大"，有的"还有点说不出的惴惴不安"。他们完全了解这次刚性宣传任务的性质与分量。《法制日报》记者袁成本说："记者曾多次参加中宣部组织的报道，关于许振超的报道，其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中宣部李东生副部长称这是'一级典型'，新闻局胡孝汉局长称之为'超级策划'"。随便交代一下，我国典型宣传中的"典型"是分级的，"一级典型"是最高级别的典型，不仅宣传规格高，政治待遇也高，比如会专门组织其先进事迹报告团、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等。典型是由地方组织一级一级往上推荐产生，全国性典型的级别最终由中宣部确定。

二

如果仅仅从自上而下的确定、部署和指挥看，以上描述似乎表明："命题作文"是我国宣传管理中既定"权力"结构关系一个缩影，中宣部处在这一权力关系的顶层，通过所辖媒体领导层这个中间环节，领导和指挥具体新闻从业者的新闻生产。在这种关系中，处于权力结构上层的管理者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相对而言，处于下层的新闻生产者成了某种唯有听命或服从的被动因素。从这样一幅侧重于一般权力和义务关系的抽象结构图中，人们看到的"权力"似乎只是那种政治意义上的和高高在上、多少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控制力量，它不仅能够脱离具体的新闻生产者而且能够脱离具体的行使过程而客观存在。

但事实上，任何权力一旦脱离了具体的行使过程就只能成为一种虚设。就是说，权力唯有在行使过程中才能产生实际效力。因此，只有着眼于具体的运行过程才能发现真实的权力关系。

"对许振超的采访和报道是个硬任务，必须完成，而且要完成好"；"写许振超是个命题作文。题目是中宣部出的，如何写好，是记者的事。"；"以往我们在正面主题性报道中遇到

最多的是‘命题作文’式的新闻，做得即使不够生动感人，对记者来讲也无妨碍，因其特殊的指令性要求照样可以播出”。如果将参与许振超事迹采访记者的这些话，与张志安对新华社记者朱玉的一段访谈联系起来，我们也许能更清楚地发现媒体及其从业者对诸如典型报道之类的命题作文的基本认识和态度。

张志安:在我看来，在新华社做记者，尤其做您这样的记者也许有些两难:一方面，要做不少命题作文、正面报道，另一方面又要结合自己兴趣做舆论监督的报道、批评报道。您会不会感觉有一些矛盾?

朱玉：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问过我，尤其是搞舆论监督的人。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有时候会议论说，朱玉早晚要精神分裂，一方面要写中宣部命题，塑造一些正面的大典型，一方面又要去搞舆论监督。我就跟他们说，到现在我还没分裂，就因为我的心态调得比较平和……

我觉得，我是把它作为社会的优点和缺点来写的，这样的话，你就发现，你接触到的不是一个偏颇或偏执的社会。要是单写一方面，你就会觉得，你完全就是一只脚站立。像我这样的话，就可以去接触一些人格比较好的人，也去接触一些比较丑恶的东西，两者结合起来才是比较完整的社会。从职业要求来说，既然是新华社的记者，新华社的性质决定了新华社的任务，决定了我不能以一个专门揭黑的记者身份出现，这是你所处的单位所不允许的。如果你想这么干的话，你肯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要不然，你就会在那儿很痛苦，找不着自己的位置。

写命题作文，这是我的工作之一。我把它视为党让我出一份黑板报，它是老板，让我去做，我肯定要把它做好。我把自己比作是一个在生产线上工作的人，我没有权利说，我只爱螺丝帽，所以我拒绝生产螺丝钉。写一个人物也是，你不管是不是命题，都必须写好。开放式作文要写好，命题作文也要写好。另一方面，它们是在让你去开启不同的词库，运用不同的思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写的时候在开启大脑不同的区域。比如调查性报道的逻辑性很强，一环扣一环，最后导致整个证据链的存在。我觉得，这些都是对记者能力的锻炼。我也不想做一个只会写命题作文的记者。

宣传也是我的工作。我把宣传和情感抛(分)开了，因为在调查性报道中，我得承认我投入感情了。但宣传的时候，我可以完全把它当作工作职责。比如你在制造一个螺丝钉，不需要多

么热爱这颗螺丝钉，只要丝丝入扣地把它做好，因为这是你的职责，你必须做好。但是，偶尔你也会热爱上你的某个作品的，尤其当它对社会产生了影响之后。

关于命题作文的这些基本认识和态度，显然与过去宣传管理中的指导思想和方式方法有关，它们是新闻生产者对既往宣传管理实践“反思”的产物。我们不妨将它视为一种回应“统治技术”的“个人技术”。

“统治技术”和“自我技术”是我从米歇尔·福柯那里借来的术语。1982 年，福柯在反思自己的研究工作时总结说：“如果我们要想分析主体在西方文明中的谱系，我们就不仅要考虑统治技术，而且还要考虑自我技术。我们还必须指出这两种类型的自我之间的关系。当我从前研究精神病院、监狱等机构时，也许我更多强调的是统治技术......但是，在今后的几年中，我将从自我技术方面入手去研究权力关系”。在我们看来，两种技术实际上构成了权力运行相辅相成的两个面，并形成吉登斯所谓“控制的辩证法”（dialectics of control）。

三

中宣部对许振超宣传的高度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将这次宣传作为改革典型报道的开始。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坚持正面典型报道坚定不移的前提下，努力解决正面报道下功夫不够，深入采访不到位的问题，改变把典型宣传仅仅当作完成任务的观念，使之成为媒体增加发行量、扩大收视率的需要；二是不再给采访记者提供现成的文字材料，而是让他们尽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去深入采访，挖掘材料。从宣传管理看，前者属于指导思想上的改革，后者属管理方式的改革。李东生副部长对参加采访的记者说，增加典型报道，提高典型报道的效果，不是中宣部的任务，而是媒体自身的需要。他要求“不允许要任何文字资料，记者自己深入生活，先让典型感动你，否则你可以不写。”

在规定动作中留出一些自由发挥的余地，努力使典型报道这样的命题作文成为媒体自身的需要，而不是中宣部的硬任务，显然是为了提高典型宣传效果，同时也是“统治技术”对“个人技术”做出的回应。但这种回应能否真正达到预期的目标，管理者自己也没有绝对把握：“稿

子见报后，如果在编辑部楼道里，同事们对稿件能自发议论两句，在地铁或公共汽车上普通乘客对先进人物有些了解，典型宣传就算成功了”。管理者完全懂得，让所辖媒体做命题作文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宣传效果的实现尤其是实现的程度则取决于一些他们难以控制的因素，它们给权力的实际运行带来一些难以预见的后果。

宣传管理中的权力正是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对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中不断生产、流动、变化着。由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抽象的权力结构，而是具体的权力关系了。

“党管干部”是“党管媒体”的重要保证。媒体领导对命题作文必然要表现出“高度重视”。上文我们已经看到各媒体领导对许振超宣传的重视情况，查阅 2004 年 4 月 11 日至 15 日中央各主要媒体，它们都在重要版面和黄金时间大量报道许振超的事迹，并开设专栏，配发言论、图片、相关资料等。但这样做是否一定是出于“媒体自身的需要”？以下是其中一些媒体对当年典型报道情况的总结摘录：

《人民日报》：先进人物典型是社会的产物，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人为地拔高、硬捧，会带来负面影响。在社会转型期，先进人物典型报道尤其要发挥“引路”和“示范”作用，引发大众传播的正向功能。

新华社：典型的选择应遵循“少而精”的原则。既然是典型，就不能过多。一方面要选好典型，发掘出真正能打动全社会的人物，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事迹一般、境界平平的人物典型的宣传。

《光明日报》：不同媒体同时推出一个典型，如果主题雷同、内容相近、表现手法相差不多，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建议今后中宣部在推出典型人物时，更加重视各新闻媒体的个性，

也就是重视各媒体不同受众不同的新闻需求。经济日报：首先是典型报道要把握好“密度”……在一个时期以内，如果我们宣传的典型过多、过密，反而很难取得好的效果。……再者，每家媒体报道的总量是固定的，报纸的版面数量是固定的，广播电视的节目

时间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在一个时期内过多过密地宣传典型，就可能影响报道的丰富性，而单调的报道又会影响受众的兴趣，使我们媒体对受众的吸引力下降，这样反过来又会影响典型报道的效果。还有，典型过密，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受众的逆反心理。典型过密过多，会使

受众的注意力不断转移，我们宣传的典型成了一个一个“流星”，就很难发挥先进典型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宣传典型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法制日报》:典型报道不宜过多过滥，典型的选择应当少而精，要有针对性要能反应百姓心声，太多反倒不成其为典型，会流于泛泛，在人们心中掀不起波澜。

……重大典型报道参加报道的媒体不宜过多，有些媒体可考虑采用新华社通稿。

这些建立于充分肯定典型宣传重要性和必要性前提下、嵌在不同语境中的体会和建议，至少说明这些媒体对大规模、高密度的典型宣传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另外我们还发现，绝大多数媒体的典型报道，包括继许振超之后对任长霞、牛玉儒、马祖光、周国知、赵家富、李建宝、常香玉、李素芝的报道，都是在中宣部严格规定的有限时间里集中推出的，此后很少再见到相关报道。看来媒体仍然把典型宣传作为“中宣部的任务”来完成的。这些显然并不是宣传管理者所满意的后果。当然，从宣传许振超开始的典型宣传改革也收到了一些预期的效果，对此中宣部新闻局、参与报道的媒体和记者都有详细总结，这些总结已被编辑成 60 余万字的《为时代英雄放歌》，于 2005 年正式出版。

四

再看具体参与典型报道采写的记者们。我们还记得他们接到所在媒体布置的采写任务后的心情，这些压力和不安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上级对这次典型宣传高度重视，并且尝试着在规定动作中留出些自由发挥的空间，后者更增加了他们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对典型宣传有自己的既定认识，对能否做好这篇命题作文心中没底。中央电视台记者杨铭军回顾说:“其实仔细想想也是，细数我们记忆里以往被宣传过的那些先进典型人物，哪一个不是靠填鸭式的方式，以海量信息灌输给普通老百姓的?在那些铺天盖地、声势浩大的宣传报道中，先进人物们的名字和事迹频频出现在报纸电视上，但事后却往往会成为过眼的云烟，能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淡淡痕迹的还有几个？许振超是谁？他有什么样的事迹？我怎么才能让他感动观众？带着这样

的想法，我开始走近许振超。”新华社记者林红梅在采访前也有“抱着看看这个典型究竟怎么样的想法”。

类似将信将疑的态度，使他们在整个宣传活动中始终权衡着每一步行动的后果，不断调整着“自我技术”。当通过采访“获得了大量生动鲜活的素材”后，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创新”，尽可能提高典型报道的感染力。正如《农民日报》记者宁启文总结的:“典型报道的使命是‘宣传’，但运作理念应该是‘新闻’，处理好宣传使命与新闻运作规律之间的关系，是典型报道能否收获预期传播效果的关键”。的确，尽可能运作新闻理念来完成宣传任务，是参加许振超事迹宣传的记者们回顾总结时谈论最集中的话题。《人民日报》记者李丽辉面对近百件关于许振超的事例，经过仔细考虑决定从两个方面选取素材:“一是把人物放在时代背景下，找出最能体现典型本质和意义的事例；二是把人物放在读者心中，找出最能令人信服和感动的事例。”2004 年 4 月 12 日刊发于该报头版头条的长篇通讯《新时代的中国工人许振超》，作者删去了春天景致的描写，直接进入宣传主题:

够普通的岗位——吊车司机；够单调的工作——把货物从码头吊上车、船，或是从车、船吊到码头。30 个春秋就这样悄然而去。然而，人们说，30 年来，从他坚守的这个普通的操作台上流泻出的，不是单调的音符，而是一曲曲华美的乐章。他，就是青岛港的吊车司机，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桥吊专家，一个一年内两次刷新世界

集装箱装卸记录的人——许振超。

结尾表态性的“豪言壮语”被修改为表达心声的“朴素的话语”：

在热火朝天、一派繁忙的青岛港码头采访许振超时，这位朴实的“老码头”指着熙来攘往的货船，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货走得快，走得好，咱心里就踏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温秋阳采访中录了 800 多分钟的音响，“确定了用音响串联全篇，用

音响体现人物个性，用音响把握通篇节奏，用音响点明主题的思路”，让音响这一广播优势发挥“传真、传情、传神”的听觉冲击力。如节目中许振超谈到工作压力：



(出录音)许振超:特别工作遇到阻力的时候，多种工作一起压来的时候，有时候真压得你直不起

腰来，唉，说句不好听的，跳楼的心都有。都 50 多岁了，还遭这个罪!也就瞬间吧，反过来讲，这些工作都推着你，自然而然地就去干了。有时候确实累了，但我对自己说过一句话，

“你要是个男人就挺住了”。 记者:有没有那种快顶不住的时候?许振超:有啊，但咬咬牙就过去了。所以，我说，困难是喊出来的。困难有没有?有

啊。都在那喊困难困难，最后不都解决了吗!

节目中还用了一段许振超谈到去世的二弟的音响:(出录音)

许振超:我怎么也没想到，刚过 50 岁呀。连句话都没有，哎呀，我那个悔恨呀，特别痛心。用手扶着二弟的头，整整守了他 24 小时。盼望着奇迹发生。(哭)想想这几年，我自己确实工作是忙，这一块我确实疏忽了。对家人的愧，对老人的愧，对兄弟的愧，一起，我大哭一场。不过，在我心里，二弟还没走。有时候，我和我对象说，老二可能出去了，不行，咱退休吧，出去找他去。

以上描述清楚地显示，“个人技术”并不是对“统治技术”的消极响应，它始终都在积极主动地回应着“统治技术”。事实上，无论是媒体、媒体领导还是具体的编辑记者，都掌握和控制着管理者实现宣传目标所必需的某些“资源”。从权力关系着眼，典型报道中折射的并非单纯是由科层组织规定的、局限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权力与义务的二元关系，更不是统治与反抗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由多个权力主体参与的、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博弈关系。媒介产品就是这种博弈的产物。权力各方根据自己对过去宣传管理及其相关知识的了解，小心翼翼地利用自己掌握的那部分资源，参与这场新闻生产的权力游戏，并在游戏过程中仔细权衡利害、得失，对每一次行动的结果做出预判，继而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然而，他们清楚地知道，关涉结果的许多不确定因素根源往往超出自己的掌控之外，各方都不得不利用对方来增加对行动后果的可预见性，以不断接近或实现自己的预期目的。其间，谁也不愿意轻易破坏基本的游戏规则，因为他们各自的利益都包含在这场游戏之中。我们认为，在具体新闻生产过程中，大量存在的是这种冲突中的合作、合作中的冲突，而不是那种要么是“对抗”



要么是“合谋”的二元对立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复杂关系中，新闻生产的所谓“空间”，或者“临场发挥”中的所谓“场”以及“策略突围”中的所谓“围”，被一次次构筑，又被一次次打破。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生产同时也是新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芮必峰，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本文原载于《新闻大学》2011 年 02 期。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8735）

【返回目录】



【感】

9-8 长平：大陆媒体：新的裂缝，新的光亮



“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完全不能在大陆发文章，不想只写给美国人看，没意思。我希望更多大陆人看到，但另一方面，我绝对不能因为这样就委屈自己。我，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许多同仁，不是一下子站到对岸去，而是在试探边界。对极权体制来说，边界是不清楚的，它不是法治社会，边界明晰，我们要去领会领导的精神。”

多少年来，大陆的新闻与言论环境不断在宽松与紧缩间起伏摆荡，始终被外界视为观测中国政治改革步伐与温度的重要指标。一方面，官方不断强调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另方面，大陆宣传部门仍不断划定报导与评论的禁区，媒体也往往在各种压力与考虑下自我设限，而坚持新闻理念的媒体人则仍顶着压力，尝试突围的可能，撑开言论空间，深入报导社会实态，努力让媒体扮演好权力监督者的角色。

今年初以来，大陆媒体风波不断，更出现多起政治权力与资本打压、威胁、羞辱和追诉记者的事件，部分大陆媒体及从业人员一方面对于种种不合理的压制展开了抵抗，一方面也对媒体本身的诸多弊病进行了反思。在这群抵抗者和反思者当中，南方报业集团的长平是个代表性的人物。

长平，本名张平，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南都周刊》副总编辑，现在是南都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是大陆知名的媒体人、专栏作家，在他十多年的媒体生涯中，曾多次因为坚持信念、挖掘真相而遭到当局打压整肃，是大陆自由主义报人的典型。

约一个月前，传出有分管文化教育系统的国保警察到报社找他谈话，而他在办公室的座位则遭撤除，同时大陆宣传部门下令他的文章不能再于《南方周末》与《南方都市报》上刊登。此事有部分海外媒体加以报导，许多大陆媒体人与网民也表达高度的关注。



《旺报》向来以促进中国大陆政治社会良性转型为职志，关注中国公民社会的孕育与茁壮，也因此特别盼望大陆媒体环境能够向上提升，能够在转型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特别专访了长平，深谈中国媒体环境的光亮与黑暗，对大陆媒体生态的反思，以及个人的定位与信念。访问纪录经长平本人审定，将连续两天在本版刊出。

以下是专访内容。

问：不少评论都指出这几年大陆的媒体管控越来越紧缩，一些人还提到了“新国家主义”的抬头，你怎么看这样的趋势？

答：在媒体管理方面，这些年更技术化，管的更具体，更到位。比如说在十年前江时代，当局在互联网的管制方面缺乏技术，所以当时纸媒常收到禁令：“不要转载网路消息，某某消息是谣言”，现在很难收到这样的禁令，反而是网路会收到禁令：“不要转载《南方都市报》的新闻”。因为网站管理有序了，管好了，网站有问题的话，就直接删掉，根本不需要发禁令给报社，反而报纸有时会出点问题。这是个有意思的转变。

光明与黑暗的角力

另一方面，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几年是有些发展。这其实是 1989 年后国家教育宣传的成果。那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派学者或是出（国）去，或是不能谈原先的理念，大家都去搞国学等研究。李泽厚有句话：“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描述了现状，没有说原因。

这种现象不完全是自然发展的，思想家是不得不淡出，政治高压不允许思想家存在，大家就去钻故纸堆。当局也想利用国学，提倡民族精神，慢慢的教育了一代人，加上百余年来国仇家恨的历史记忆还是很深，这些结合起来，让民族主义情绪一波波的发展，再和技术一结合，对媒体的管理就相对容易些。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技术还在发展，如推特等也有当局管不了的地方；另方面，在民族主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会开始反省，出现不那么“纯洁”的思想，这会给当局带来新的麻烦。和过去比较，管的是紧了，但是也要看到新的裂缝在出现，新的光亮在照进来，这两者谁强谁弱，现在还不好说，还在变化中。



当党报必须面对市场

问：今年以来，大陆媒体发生了许多事件，比如两会期间 13 家报纸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共同社论，湖北省长李鸿忠抢夺记者录音笔引发连署抗议，媒体人连署抗议《重庆晨报》在三名记者被警方拘传时的表现，还有多位记者被通缉、威胁等等。中国媒体人展现了对理想的追求与对压制的抵抗，能否谈谈你的观察？

答：首先，要看到媒体型态的变化，以李鸿忠事件来说，过去能进入那种场合（两会）的都是党报。在过去，记者首先是进不去，进去了也不敢这样提问，即使提问，报社也不会支持，报社领导的利益是在官场。

现在，即使是《人民日报》，它也要面对市场，要办《京华时报》，那个被怒斥的记者就是《京华时报》的。《京华时报》报社领导的利益是在市场，要把报纸办的有人看、有广告，所以从利益出发，也要支持记者出位，提不一样的问题。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过去是“先媒体后市场”，媒体从宣传机构中剥离出来，走向市场。现在，如网易、腾讯等新媒体一开始是做游戏等别的生意，挣了钱再来做媒体，是“先市场后媒体”。

另一方面，管制让有理想的媒体人感到很压抑失望，有机会的时候，市场导向和专业主义这两股力量就会结合，共同来反抗。这批人中很多是受 80 年代影响，希望媒体更开放，而这几年媒体的发展，专业主义的理论如独立性等，也比较多的深入媒体人的思想里。

我们经常联合起来

还有就是媒体平台的多元化，传统的连署抗议是很有风险的，现在有很多网路的技术可以运用，可以很快、很安全的出来，这几股因素结合起来的确形成了一种反抗的姿态。

李鸿忠事件当然是有点妥协，是假装或真的认可体制设定的法律程序，向人大提出诉求，这是合理合法的。而《重庆晨报》事件，连署人没有针对当局，是针对报纸，这是反抗的策略。另外，当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相比而言，媒体人比较谨慎，可能还不至于让当局分心来镇压。

户籍制度是个安全的话题，讨论多年，体制内外几乎达成必须改变的共识，现实上也难以为继。所以，共同社论的主其事者是藉这个话题推动一下，采取了这样的形式，宣传部门可能首先是震怒于这个形式－“联合起来”，要把这个趋势打掉。其实，我们经常联合起来，只是都是由宣传部统一安排的……。

问：近来一些大陆领导开始搞网络民主、网络问政，还出现伍皓（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样具有开明形象的宣传部官员，你对这些现象有何看法？

答：这是一种控制的方式，通过“亲民”，让你觉得我跟你是一致的。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不需要官员说你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这很荒唐的。

领导该不该上头版

就像汪洋说媒体不要把我放在头版，其实从另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干预。过去可能老是把官员考察等新闻放在头版，所以没人看。但作为一个地方的主政者，你成为焦点人物是应该的，因为你那么大的权力，掌握那么多资源，媒体应该监督你，你确实该上头版，凭什么说你不要媒体报导？

过去上头版，是拍你马屁，现在你不好意思了，问题是我可不可以把监督你的东西放在头版，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从媒体自身来说，听到这句话都很高兴的，把他放在头版，大家都很痛苦，因为不可能把让他难堪的新闻放在头版。

至于伍皓，我写文章批评过他，伍皓找人跟我交流，说我误解他了。伍皓走的是差异化的路子，他这种做法让媒体受益，多了新闻，他用的字眼如透明开放，也是媒体欢迎的。他在官场上被视为异类，确实受到批评。

但是伍皓的新闻观念还是宣传的那一套，他自己也不避讳自己是为政府服务的形象雕塑师。他不是站在新闻专业主义立场做事，他的那些主张是包装策略，也没意识他自身的矛盾。比如他认为媒体应该公正客观，不应该报导低俗，所以他说我就下了禁令。但是从新闻理念来说，禁令的恶可能大于媒体没把握好尺度。他本身就是充满各种矛盾的混合体，说的、做的、想的不完全一致，包含各种人的投射，官方和媒体都想利用他，反对者看到他的矛盾，拥护者会看到自己感兴趣的那面。

写文章不能太策略

有人觉得应该维护伍皓这样的官员，不要太批评他。我觉得写文章、做学问、做媒体，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就事谈事情，不能太策略。做政治的可以这样，但不能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政治家，中国的官本位让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主席。

问：我碰到一些大陆从事 NGO 工作的朋友，他们对媒体在培育公民社会上的角色有很大的期待，你自己怎么看中国媒体在社会进步上起的作用？

答：报纸会被一些人当作导师的角色，报纸本身也是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可能会随着社会发展，和其它力量合力把社会往前推，媒体不可避免会成为其中一个角色。另一方面，媒体自己也应该扮演好这样的角色，主动做一些事，这还是有一些想象空间的。这个政权对媒体的依赖性比较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的作用会大于其它社会媒体的作用。在民主的台湾，言论自由，在头版骂骂马英九，大家也就看看。如果在中国大陆几家媒体一起骂，可能就是大事。所以权力大，责任大。媒体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但老实说，媒体人在中国不是弱势群体，媒体人的权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你愿意跟权力合作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好处。现在的权力会直接诱惑你，合作一个项目，钱很多，用起来很随便，不公开，不受监督。前几天有个宣传部长来找我，请我帮他写点宣传文章，我拒绝了。事实上，这是可以跟对方商量的，可以写的不那么赤裸裸，可以骗老百姓觉得是作者真的想写的文章。像我这样拒绝的人不多。

媒体会成利益集团

中国媒体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媒体堕落、做坏事的机会比别的地方多。现在也是几股力量在较量，政府部门想给媒体好处，而很多媒体造反是为了被招安，包括南方报业里也有这样的媒体人，想被招安，官员请他吃顿饭就很高兴。我对这些比较警惕，中国媒体的反抗是不清晰的。媒体会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与其去看媒体可以开拓很多空间，不如看到、更要看到媒体很容易干坏事。

冯小刚、郭德纲这些人羞辱记者，从另个角度看，其实媒体作为一个整体，被羞辱并不冤枉，媒体有太多的羞辱与自我羞辱。大部分记者都是要拿红包的，拿钱替人写新闻，就不太可能批评，而拿了钱再批评也很奇怪。

政府部门开新闻发布会，给红包往往比企业给的多。跑线的记者一个月可能收到 7、8 千，而报社工资可能只有 4、5 千。就凭这个被骂，一点也不冤枉。

问：最后谈谈你自己吧。你从《成都商报》、《南方周末》到《南方都市报》，几度上下，现在也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我读过你在《南方传媒研究》上的文章，谈你自己的“怯懦和无能”，你说“我最怕别人夸我勇敢，因为我深知自己内心充满了畏惧”。你怎么看自己在媒体走过的艰辛路？

答：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你选择这条路，可能就会走到今天。和我一起走入这行的，早年文章写得很漂亮，很有正义感，但他们选择媒体管理的路，就必须放弃很多东西，甚至必须入党。我一直是两条路在走，一条是写文章，以个人身分发言，另一方面，我也在做新闻媒体管理、做编辑，这两条路实际上有一点冲突，最终必须选一条。

中国行政化很严重，每个行业的管理者都可以对应一个级别，在报社也等于是做官。

做官和作文有冲突

做官和作文是有冲突的，做官最大的密诀就是“不说话”，这跟民主社会不一样，民主社会是要多说话。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主政之后，国内外媒体都会说他“很神秘”，但我们很难想象：欧巴马是个神秘的人，大家都不了解他，突然就当上了总统。可是在我们这里，为官之道就是“少说”，这个政治特点影响了每个行业。

很多人文章写得很漂亮，不写了，我很遗憾，但大陆人为何多要选择当官这条路，因为中国官本位文化太强，所有优势资源都倾向于官僚体系，当官权力大，没有监督，办事容易，收入高，享受多。

我自己也矛盾，几次下来，几次又混上去，按照体制内说法，就是没管好这张嘴，还想发言，觉得自己有些想法，有这个能力、机会表达出来。我觉得媒体不缺管理者，但是缺做事的，所以我愿意在这方面多做点。而且我在做媒体管理时，多数是做采编，也是希望中国的言论状况有改变，有正常的言论空间。

曾尝试正常的呼吸

以前我们的评论，要么是官方《人民日报》社论的性质，大家都朝那个方向写，或说在里面塞一点自己的想法；要么就是写杂文，指桑骂槐。我在《南方周末》做新闻部主任、做头版编辑时，就尝试“正常的呼吸”，希望做一点既不是气喘嘘嘘、气急败坏，也不是要憋着，而是要正常的说话。后来在《南方都市报》写时评专栏，觉得既然占着这个口岸，自己就有责任发言。大事情出来，有些读者等着你说话，忍不住会去说。最后可能就会有个选择：要么说，要么不说。这时，如果选择不说而去作官，会有一点违背自己兴趣和一贯的主张。

问：不过很多人会说，忍一忍，等你到了某个位置讲话会更大声，就能说真话？

答：是，这是中国人的逻辑。就像赵紫阳，至今还是有很多人说他应该忍一忍，保住权力，说不定还能干更多的事。我觉得这样的人很多，有些人的确是在忍辱负重，逐渐向权力高位走，我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到一个时候就突然发言，我不完全否定这样的情况。但不能所有人都这样，因为这会成为一种借口。

妥协是没有边界的

最重要的是，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妥协是没有边界的，你以为你到了那个位置，还是原来的你吗？可能已经变了，因为你必须改变，官场文化中强有力的酱缸，会把你染成你当初反对的对象。换句话说，我对自己没有那么自信，所以随时保持清醒，不敢去染一下。

问：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你对媒体生涯有过怎样的想象与规划？

答：我曾经有过很具体的规划，但你会发现身不由己的时候很多。10 年前，我在《南方周末》时，一腔热血，觉得找到了事业感。我以前是学文学的，写小说、写诗，自己的规划是在那条路，不怎么认可媒体，媒体的文字都很粗糙嘛！

进入媒体一开始是为稻粱谋，后来觉得还有点意思，到了《南方周末》，觉得这事说不定还可以干下去，干一辈子也可能。那时候是有些想象，而且觉得中国的进步是看得到的，越来越开放、民主。后来，有一天突然就说你犯了错误，你不能在《南方周末》做头版编辑，甚至不能做采编了，当时觉得打击很大，不可思议，等于你的职业想象都没有了。

应会一辈子写下去

当然，后来社会变化，让一些本身未必很强硬的指令无法实施，我又做媒体，这时我就很难有一辈子的职业规划。如果有，我只能管到我能做到的部分，比如，我应该会一辈子写下去。原来我还想做张好的报纸，甚至做大。但现在看来决定这事的因素有很多，有些因素你可能可以去克服，但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比如你就是要报导假新闻，或者有些事你就是不能说，你不照着办，可能就会有麻烦。

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完全不能在大陆发文章，不想只写给美国人看，没意思。我希望更多大陆人看到，但另一方面，我绝对不能因为这样就委屈自己。我，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许多同仁，不是一下子站到对岸去，而是在试探边界。对极权体制来说，边界是不清楚的，它不是法治社会，边界明晰，我们要去领会领导的精神。



空间有多大？不知道，不去撑就不知道。试图撑大空间，把边界扩展，我要做的是这个。但这的确是很难，很多人觉得你螳臂挡车，太自大了。

我只是希望能够对得起自己的性格和观念。媒体有时候管得紧，有的时候管得松。紧的时候可能连现在这个位置都没有，松的时候或许有机会做得更多，不管如何，我只能在能说的时候尽量说。

“我认为媒体在专业问题上应该有更精细化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在一个粗鄙化的管理体制中，让自己也变成一个粗鄙化的对象，那是一种自甘堕落——即使你是反叛的姿态。”这是长平写的一段文字，反对两种粗鄙化，需要勇气，也需要洞察。

“长平是今天中国的媒体人中不多的清醒且自省的人。做为媒体中人，首先他能跳脱出来，认识到媒体的诸种问题，更重要的是认识到问题之后他不犬儒、不抱怨，能宽容、理性地看待且身体力行。”这是一位大陆媒体人在通信中描述的、她所认识的长平。在访谈过程中，我确实读到了这样的长平。

这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知道他的历程。

离开大学校园后的长平，进入家乡四川的《成都商报》当记者，因为一篇采访歌手崔健的稿件，碰触领导认定的敏感话题，最后被迫离职。

在《南方周末》，这个中国自由派媒体的旗舰，长平灌注了极大的热情，却因在报导张君案、这个 10 年前大陆破获的重大犯罪团伙时，触及农村青年出路、农村政策等问题，遭到撤职。

辗转回到南方报业的长平，在《南都周刊》副总编辑任上碰到西藏“三一四”事件，面对大陆巨大的反西方媒体浪潮，他写了篇文章，提醒在反击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虚假报导时，要看到新闻控制以及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造成的伤害可能更大。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北京晚报》甚至以《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一文点名批判。

报社在压力下决定，长平不能再从事新闻第一线工作，也无法担任行政职务。一年后，蒋经国百岁诞辰，长平在《南方周末》撰文肯定蒋经国晚年的政治功绩，也点出是反抗运动不懈的奋斗促进蒋经国的觉悟和反思，逼迫他作出正确的选择。此文一出，《北京日报》又以〈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一文加以批判。

历史上，我们看到太多反抗者，或屈服、或沉沦、或过激、或愤懑，又或不断自我膨胀，这些都没出现在长平身上。他还是那个秉笔直书、理直气和的长平。

（杨伟中，《旺报》主笔。本文原载于 2010 年 9 月 24 日出版的《旺报》。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8739。）

【返回目录】

9-9 左方：《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节选）



“《南方周末》尽管大胆改革，勇于创新，但办报也有谨慎一面。为了报纸的安全我们提出‘四个维护’作为办报的红线，就是要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现行政策、维护现行政治体制、维护社会稳定。这四条红线必须守住，如果冲破这四条红线，我们早就完了。”

第二次转型

《南方周末》第二次转型，是 1987 年秋天我跟黄文俞的一次谈话引起的，因为明年是《南方周末》创刊的五周年。我们准备出一个纪念画册，想请黄文俞写篇文章登在纪念册上。因为黄文俞是广东新闻界的老祖宗，是个思想家型的报人，我们都很崇拜他。

我向他汇报了《南方周末》的情况之后他很高兴，他说他已经宣布绝笔了，但是你既然来找我就以信代文给你们写一封信吧。正是这封信里面，他提出“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对不能讲假话。”他这句名言，现在已被定为南方报业集团的报训了。我问黄文俞，现在改革开放那么多年了，新闻界也谈新闻改革，但是讨论的都是怎样写短新闻，怎样处理会议新闻，最敏感的话题也只是党报纸应该不应该有社会新闻。

我说毛泽东讲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那么今天要搞新闻改革，新闻改革的对象是谁？这个首要问题大家都不讲啊。黄文俞说，不是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就是不愿意讲，改革的对象就是真理报模式嘛。他跟我讲，一解放他就在新闻单位工作，知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派人到苏联去取经，毛泽东曾经指示先全部搬过来。以后慢慢改，所以派到《真理报》去取经的人，把《真理报》的新闻理论、办报理念、宣传方法、

规章制度乃至内部组织结构都全部搬来，所以现在全国都是一个脸孔，全是一个模式，这就是《真理报》模式。我说《真理报》模式模式的本质是什么？黄文俞就笑了，他说我没办过解放前的报纸，要有对照才能看清楚。

这个问题你最好去问萧干。后来我果然到北京去问萧干，萧干说黄文俞他搞了十多年《真理报》模式怎么不知道《真理报》模式本质，他狡猾不讲。我说那你讲吧，萧干说《真理报》模式的特点：第一，它是只根据红头文件办报，不根据社会实际去办报的。第二，它只是对上负责，《真理报》模式是没有读者的。

第三《真理报》模式是用一种假、大、空的语言来写报道，文体也是公式化的。我们新闻界有句行话说叫做“新华体人民语”，就是新华社的文体，人民日报的语言。第四个它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谁讲传媒是商品就要打成右派的。所以，它是用政府的钱去办报，用政府的钱去卖报给读者看，从而使报纸成为喉舌和工具。

正是萧干的话让我们对《真理报》模式定义和本质有所了解。在这一次与黄文俞谈话中，我问黄文俞，我们的报纸要怎么改，黄文俞说左方你不要想要创一条什么新路，你倒回去就行了嘛。我说倒到哪去？他说倒回到上世纪 30 年代的进步新闻传统中去，我们中国有我们很优秀的新闻传统，解放后把这些传统给扔掉。说你的任务是要跟我们中国原来的新闻传统重新接轨，他说我也接过一次轨，但是我是偷偷接的。我说你怎么接的轨？

黄文俞就给我讲了他创办《羊城晚报》的故事，1957 年反右派运动刚结束，陶铸叫黄文俞筹办《羊城晚报》，陶铸交代他说，如果你办成小《南方日报》就不要办了。他很烦恼，全国的报纸都是一个样的，你让我办一张区别于全国报纸的一张晚报，那该怎么办。

他后来就找了邬维梓，这个人是在国民党时候办过报。解放后调进《南方日报》，大家称他为“编辑王”，后来被打成大右派。黄文俞其实跟他交情很深，把他放在资料室编地方新闻志。

黄文俞请他出主意，他在深夜拿了很多解放前的报纸和香港的报纸，偷偷到黄文俞家里去，他告诉黄文俞，你要办一张新的晚报，要遵守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原则，新闻必须采取攻势，你要敢于碰新闻，抢新闻，要搞点社会新闻，人家不敢，你要弄。晚报应该以副刊为主，每天

要出两个副刊，一个文艺的，一个杂谈的。黄文俞后来接纳他的意见，办了《花地》副刊，专门登文艺作品。

《晚会》副刊，专门登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另外再在一版开辟一个叫《五层楼下》的子栏，是社会新闻。他说没想到就是凭着一个栏目、两个每天出的副刊，结果《羊城晚报》风行全国。黄文俞说我这是偷偷接了一次轨，你现在可以大胆地公开地接轨了嘛。我问我们优良的新闻传统的精粹是什么？黄文俞说是忧国忧民，关怀弱者群体。

我又问黄文俞，要打破《真理报》模式会有很大阻力，突破点在哪里？黄文俞说突破点是市场，如果领导批评你，你就说你们是上报摊的要读者掏钱买，而你又规定一年给报社赚多少钱，我不这样办报纸卖不出去，我哪有钱交给报社，到时候还赔钱呢。果然后来宣传部有人问过我，《南方周末》一版的版面画的花里胡哨的，不象《南方日报》的增刊，我说我是街头报，是杨子荣，不扮成土匪的样子怎能消灭座山雕。

致力新闻改革

我向大家传达了谈黄文俞的看法，《南方周末》的同事都很赞同，觉得如果我们在新闻改革上很能有所作为的话，再辛苦也值得，大家的思想统一了。我也是从《真理报》模式那里干过来的，《真理报》模式简单说就是党性大于人民性，党是代表人民的，党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声音，党性越强人民性就越强。但是它具体实施，则有很多潜规则。这些潜规则细分有几十条之多，虽然我不是学新闻的，但是到《南方日报》工作了几年之后，就无师自通了。

举例来说，如果报道涉及批评一个县的书记，必须要通过省组织部批准，涉及批评一个乡党委书记，必须要通过县的领导批准。我们的记者是党的记者，我无论到哪里去是受党双重领导的，在报社我们是接受报社编委会的领导，当时《南方日报》的编委会是省委的派出机构，总编辑可以列席省委的常委会会议，以便直接传达省委的声音，记者到地方去，我们要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所以记者到下面去，都要向当地书记汇报，记者是带什么任务来采访的，去哪里采访好。当地领导往往还会派人陪同采访，报社写社论、评论文章，必须经过省委书记审查。

报道省委书记参加的活动，都要给他看过同意才能发表。一次省委书记林若接待波兰的领导人，波兰领导人说，我们这次来是要向中国学习，林若回答说，你们改革早，是我们向你学习。记者在消息上把这段话写上了，结果受通报批评，林若说他对客人说客气话，他没资格代表中央表态向波兰学习。检法部门是绝对不让碰的，解放军的问题更是禁区。记者发现社会存在阴暗面，只能写内参，不能写报道。只有内参送上去，上面认为应该写才能写批评报道，发生突发事件，报社无权主动采访，一次有一架台湾运输机起义降落白云机场，陈培得知消息后请示林若，林若说你们不要管，接着负责新闻的副总编辑张踪也得知消息请示，陈培说不许派记者，结果晚上香港的电视台播放了省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原来香港记者混进省委安排起义飞行员住的珠岛宾馆，省委被逼向香港记者发布新闻，却没有内地传媒参加。这些潜规则我都懂。所以打破《真理报》模式就是要打掉这些潜规则。我就是怎样探索打掉这些潜规则的呢？

有一个外省的县委书记，把前任的儿媳妇强奸了。那位儿媳妇求他给她安排一个工作，他假装胃疼叫她给他扶进房里，结果把她强奸了，我就真名真姓地把这个事情揭露了，因为这是第一次碰见在职官员我就用一个很隐讳的标题，好像叫《生生的果子》，避免这些检查官们引起注意，我们揭露派出所一个所长，逐步揭到省公安局，我们从揭露一个县长，最后揭省委书记，我们就曾揭露过河北省的省委书记。

一个出版商出书触犯了他，他把人家抓起来。后来中央检察院几次让他放人，他不放，我们把这个事揭露出来了。他们的宣传部长给我打电话，说谁给你们的权利点我们书记的名，我说我报道有没有违背事实的地方，如果有请你指出来。他说你敢到石家庄来吗？我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干嘛不敢到你们石家庄，他说你来呀，我说我没事跑那去干什么，如果有事的话，我来了你也不知道。

后来这位书记因为贪污进监狱了。有人问我，你敢碰解放军吗？公检法你们都碰了，我说是啊，说从理论上来说新闻应该没禁区，但是解放军是有明确文件规定，报纸不能批评。连内参都不能写跟谭军波提出一个题目叫做《红绿灯下谁是老大》，批评广州军区的军车，得到了广州市交通局的大队对此很支持，给我们提供大量材料和照片。

我拿大样送给李孟昱说时，他你们批军区行吗？我说我们有大量的材料，我们不怕军区。他问谢非怕不怕广州军区，我说谢非肯定怕。他说那你怕不怕谢非，我说那我当然怕谢非。他说你不拍军区，谢非常怕军区，而且你又怕谢谢，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样吧，我把这篇稿送

广州军区宣传部请他们审。结果军区宣传部打来电话说不能登。我说我没问你能不能登，我是请你给我核实是不是事实，登不登是我们报社的事。

后来军区政治部主任亲自打电话来，说这个事已经报告我们军区司令员了，司令员说不让登。我说我们服从军区司令的指示，我们不登了，但是我们有一个要求，你们派人来听听我们的意见。接着他们派了两个校官来，接着广州军区搞了一次军车大整顿。

解放后全国报纸都没有谈过性的问题，把谈性一律视为黄色，我们给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潘绥铭开辟《性与你》的专栏，一期登一篇，登了将近两年。

中国曾向世界宣布我国没有吸毒者，我们连载了长篇报告文学《疯狂的海洛因》，我们不但存在吸毒，还存在贩毒和种毒。江泽民阅读后很重视，作了批示，说吸毒问题要从小孩抓起，指示公安部、卫生部、教育部的领导都要阅读《南方周末》的长篇连载。

像这些例子很多，《南方周末》就这样有意识有计划地突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开拓了空间。

《南方周末》尽管大胆改革，勇于创新，但办报也有谨慎一面。为了报纸的安全我们提出“四个维护”作为办报的红线，就是要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现行政策、维护现行政治体制、维护社会稳定。这四条红线必须守住，如果冲破这四条红线，我们早就完了。

我们还总结出一套办报策略，如只监督外省，不监督本省，监督外省的，奈我不何，即便你要告到中宣部，只要事实准确中宣部也不好批评我们。但揭露广东，他们一告到省委去，宣传部一说话我就难办了。不怕官至怕管嘛。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打破潜规则，揭本省和揭外省对我们并不重要。

报道上一些敏感的题材，我们用比较隐晦的标题，尽量不引起审查官们的注意，报道不敏感的题材，就用耸人听闻的标题，以吸引读者阅读。敏感的人我们让他谈不敏感的问题，敏感的问题我们让不敏感的人去谈。

像胡绩伟是个敏感的人物，我们发他的游记，报道他老婆为什么要嫁给胡绩伟，只要胡绩伟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读者就很关注，有些政治问题不好谈，我们就从学术从历史的角度谈，由于我们摸索出一套策略。《南方周末》在因袭警案一文失实，受中宣部责令停报整顿之前我们没受过批评，相反省政府授予我们先进集体，省委授给我们省直属机关的先进集体。

有人认为《南方周末》一定有个大后台，其实《南方周末》确实没有后台，但是我们跟广东改革开放的官员是心心相印的。所以《华西都市报》的老总曾经跟我讲，你《南方周末》是不可复制的，于幼军处罚我们最多，但说句公道话，没有中宣部的指示他没有主动处罚过一次。

停刊风波

《南方周末》被中宣部责令停刊前有个预兆，为了给《南方都市报》申办刊号，《南方日报》的总经理李民英请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王强华吃饭，王强华向李明英透露一个消息，说中宣部一个领导要《南方周末》停刊，李民英用电话把这个消息汇报给报社领导，报社领导很紧张，即派分管《南方周末》的副总跟编辑李孟昱和《南方周末》副主编游雁凌两人上北京摸底。

找了龚心瀚，他是分管新闻的副部长，他说你们的报纸办得不错。我每期都带回家里，家里人都爱看。我有时候忘记带家里人还追着要。后来去问新闻局局长徐华新，他们也认为报纸办的不错，只指出表敏感人物的文章太集中了一些，可以分散发。所以两人回来以后，觉得是王强华喝醉酒乱拉警报。

几年后王强华退休后任全国报业协会秘书长，一次开会，他和《南方日报》总编办主任陈绍儒同住一个房，才将谜底向陈绍儒揭开。他当年向李民英说的中宣部领导是徐惟诚，原因是王蒙从文化部部长的职位的下来后，文化部办的报纸《文化报》批王蒙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刚好这时《南方周末》登了一篇报道王蒙日常生活的通讯，放在报纸的左上角上，还配了一张王蒙的近照，那一天北京报摊上铺天盖地都是王蒙的像，文化部搞左的人气个要死，认为《南方周末》是有意和他们唱对台戏，就去跟徐惟诚告状，徐惟诚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听了他们告状就跟王强华讲，广东有一张报纸叫《南方周末》，听说这张报纸很坏，你把它停了吧。王强华说不能随便停，他们是百万大报，而且有正式刊号的，你要停它必须有充足的理由。

过了三两个月，突然省委宣传部通知《南方周末》的主编和分管《南方周末》的副总编辑到宣传部去谈话，刚好这天我妈妈病危，医院通知我去医院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名。所以我这天

不在报社，由李孟昱带着游雁凌去。宣传部副部长周启宇向他们宣读了宣传部发的《南方周末》停刊整顿通知书。

当时李孟昱向周启宇提出能不能用其它的方法来处理，不停报行不行。周启宇说我们已经代你们请求过，中宣部没同意，所以你们不需要考虑了，回去再出一期，写个告读者书就停报整顿。我这天从医院回来，看门上贴了一张条子，是游雁凌写的："老左今天晚上八点钟开编委会紧急会议，你务必依时参加。"条子的下角游雁凌还加了一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我当时感到奇怪了，我离开才半天开什么编委会紧急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特别是游雁凌在条子下写的，"让我做好思想准备"的话。我就赶紧给游雁凌打电话，但没有人接，给几个编委打电话，他们的家里人说没回来吃晚饭，我猜想是出大事。

后来我打电话给张向春，他说今天没回编辑部，不知道情况。不久他便给我电话，老左，出大事了。接你电话后我便打电话给陈微尘，她说游雁凌从宣传部回来叫大家开会，宣读宣传部的《南方周末》停刊通知书，他读了一段就哭读不下去，还是别人代他读的。我便赶紧返回报社，我问游雁凌条子为什么那样写，把我都搞傻了。他说我怕告诉你停报你骑自行车在路上出问题。后来又怕你回来知道消息太突然，因此而脑中风，所以我让你有思想准备。

晚上开编委会，李孟昱说报社社委会已经开了会，决定执行宣传部停刊整顿通知，他叫游雁凌打个电话给徐新华问问究竟怎么回事。徐新华在电话里说，这个事是经丁关根同意了的，你们必须停刊。不仅是公安部告你们，让我们中宣部处理，另外安全部也告你们登的《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

因为这篇稿子牵扯到保密问题，通知停报时就没讲这件事了。

我想先谈谈邹启宇对停刊的态度。我们事后才知道，停报通知是由徐新华打的电话，宣传部是邹启宇接的电话。邹启宇说你们口头通知停报我们很难执行，要停你们中宣部给我们发一个正式文件，徐新华说是部务会议定的，停报的事有会议记录。邹启宇说那你就把这个会议记录传给我们，总之要有一个文字根据。

徐新华说部务会议记录涉及中宣部内部的事情，不能传给你们。邹启宇说这样我们不能执行。后来徐惟诚发脾气了，打电话给邹启宇说没有正式的文字通知，打电话你们宣传部就可以不执行我们中宣部的指令了？

邹启宇只好将停刊的事报告于幼军，于幼军指示时任新闻处处长王春芙起草《南方周末》停刊通知书。停刊那年春节邹启宇来《南方周末》拜年，我接待他，冷冷的地坐在他对面。他却热情地对我说，你们《南方周末》是为我们广东争了光的，我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在阅览室看到其它省的报纸都是新的，没有人翻过的。唯一《南方周末》是翻得卷起来的，我作为一个主管新闻的副部长感到很自豪。

但是我心里想，打我也是你，说好话也是你。故没有理睬。到我退休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说你要退休了我想请你吃一顿饭，你爱吃粤菜，还是吃潮州菜，还是吃西餐，还是吃川菜呢？

你年龄大，川菜辣最好不吃，如果你要吃粤菜或潮州菜，我请你你到广州最好的酒店去，如果吃西餐就请你到中国大酒店。我说怎么你把我当成统战对象了？他说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我从来不去参加外面的宴会。他说如果你不愿意到外面吃饭，就到我们珠岛宾馆，这是谢非请客的地方。我说你是请我一个人还是我们整个班子？他说当然请你们整个班子了。或许是因停刊这件他给我的补偿。

接通知当晚编委会讨论决定如何停刊的事时遇到两个难题，一个难题就是告读者怎么写，若将中宣传部直接抛出来他们不会批准，如果将责任全部包在身上说我们自行决定停刊整顿，我们又不愿意。

第二个难题，停刊以后订户的钱怎么退法，因而会上只讨论了最后一期报纸怎样出。这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我想这个通知是宣传部发的，究竟谢非知不知道，如果谢非不知道，还可以向谢非求情。我明天一早就找刘陶社长。刘陶说谢非出国到东南亚访问去了。现在省委主持工作的是黄华华，我打了几次电话给黄华华，一直打到 12 点黄华华才回家，黄华华说他不知道。

我说宣传部的停刊通知没有通过省委，可以向谢非求情。刘陶说上面的事我来管你就不要过问了，我给你的任务是你要稳住队伍的思想。

接停报通知的第二天，刚好是《南方日报》的社庆日，所有《南方日报》前领导人都坐在庆祝会的主席台上，黄文俞招手要我上主席台。

他说左方你大胆，踩到地雷了。他把话题挑起来，丁希凌大声喊道，《南方周末》没有错误，谁停《南方周末》都是错的，我坚决反对。《羊城晚报》前总编辑许实说，左方你不要怕，整顿之后你们再复刊，你们发行不是一百万是两百万。

陈越平是老宣传部长他说《南方周末》我期期都看，怎么我的水平就看不出有问题呀。老同志都在支持我们，但我只回答一句话，我们也有错，我们会总结经验教训便从主席台下来。庆祝会结束后开编辑部全体会议，我见同事们的脸色都很沮丧，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我以电台天天广播的一句广告词“戴表戴乐都，时间刚刚好”作开场白，我说这时停报的时间刚刚好。

我还有一年零几个月就退休了。我在任时停报，最多人家骂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一年半之后我交班给你游雁凌，人家就会说左方主持这么多年没出问题，怎么一到你手上就停报。游雁凌装跳楼状说那我只好就从 12 楼跳下去，大家都笑了整个会场气氛缓和下来。

正在这个时候，保卫科人来找我，说安全厅派人来要见你。我就下去，安全厅来的是一个老同志，跟我年龄差不多，还有一个年轻人。他对我说安全部打电话说你们发表的《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泄密，要我们来调查，你先谈谈这篇文章刊登过程。

这篇稿牵扯到安全部你要问清楚作者，消息来源谁提供的送审没有。后来徐列拿张传真纸给我，上面有公安部长批示：同意刊登。徐列说作者是《北京日报》的名记者，稿件是公安部和劳动部两个部长要他采写的，因为安全部要从外商服务公司中领取提成，许多给外商打工的白领都避开安全部这个公司，结果有外商黑白领的，也有白领黑外商的，而出现的问题都要公安部和劳动部处理，所以两个部长要记者采写这篇稿，并指定要交《南方周末》刊登。我听后说就登吧，大样我不再看了，错就错在忘掉叫徐列划掉这句话。

安全厅那位同志讲，我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不管出差到哪里，一到礼拜六都记得一个事，买一份《南方周末》。你这稿我也看过，事实没有问题，问题只是出在这句话，是属机密性质的。我会尽量给你们美言，但是安全部一定要下令抓你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依照安全法可以关 15 天到 20 天，这事情对我的精神压力比停报对我的精神压力严重的多。

这天晚上我睡到半夜突然被警车声警醒，再也睡不着了。我想如果我不把事情告诉家人，真被抓起来，家里人不知道原因一定很害怕，如果告诉了，家里一定很紧张，我白天处理工作已经够紧张的了，晚上回到家连个放松的地方都没有，后来我就偷偷告诉女儿，如果我被抓，

你就告诉妈妈当我出差一个星期，找我谈话的安全厅同志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他们会善待我的。

回过头来谈谈《袭警案》这篇文章，作者是江西省铁路局的一个作家，此人和公安部门关系密切，曾出版过一本关于公安的报告文学集，游雁凌曾到江西向他组稿，稿件最初看到的是陈朝华，他认为很有可读性建议发表，便交给游雁凌，游雁凌看稿后，叫谭庭浩给作者打电话核实稿件的真实性，谭庭浩先给作者的工作单位打电话，回答是省作协让他到下面深入生活去了，再给江西省作协打电话，作协的人说不知道他到哪里深入生活，再打电话到作者妻子工作的工厂，他妻子说丈夫四处流动，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何时回来，游雁凌、谭庭浩、陈朝华三人商量后，认为稿件是用复写纸写的，很可能一稿多投，如果我们登晚了会被人先登了，便决定刊登。

刊出后省公安厅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说公安部有个副部长是你们《南方周末》的读者，他对你们《袭警案》这篇文章很感兴趣，想知道案发在哪个派出所。游雁凌就给作者打电话，这时作者已深入生活回来了，他说故事是从一个公安人员口中听来的，他也不知道是哪个派出所。游雁凌问，你稿上细节都是虚构的吗？作者承认是虚构的。

游雁凌一听就发火了，我向你组稿时就向你讲清楚，我们的《人与法》专版是个新闻版不允许虚构，你要向我们报社写检讨，并向读者道歉，我们要将你的检讨登在报上。后来游雁凌将作者的检讨登在报上，并在上面加了个《本报郑重声明》，声明《人与法》版是个新闻版不允许虚构，是作者欺骗了我们，并对我们编辑把关不严特向公安部门和广大读者致歉，那位公安部副部长正是从报上看到我们的声明，知道是篇假新闻才向中宣部告状的。

事情发生的全过程我都在美国访问，我对这个事情是没有责任的。事情发生后我就对李孟昱和游雁凌说，你们一个是《南方日报》的接班人，一个是《南方周末》的接班人，而我还有一年多就退休了，《袭警案》失实一事的责任全包到我身上。他们都坚决不同意，表示各自承担应负的责任。我说你们是政治家吗？中宣部要整的是《南方周末》主编，就算我这次逃过一劫，今后也是在劫难逃，难道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跳楼，你们将来接了班，可以多关照一下我嘛。此事了不得就是要我停职提前退休，此外还能对我怎么样。

当晚我去刘陶家向他汇报，我说李孟昱和游雁凌都认为《袭警案》一文情节巧合太多，怀疑内容有虚构成分，不同意刊登，是我认为该稿可读性强，为了追求发行量坚持要登，责任全部在我。刘陶也知道我当时在美国，讲这番话目的是为《南方日报》保住两员大将。

刘陶说口说无凭，你要写文字给我，而且你写的检查不是给我的，是给省委宣传部的，你要想好你才写。我说没问题，我想好了明天就交给你。

社庆那天晚上，黄每坐在门口等我下班，他说庆祝会散会之后老同志开了个座谈会，刘陶有没有向你传达我们老同志的意见。我说没有啊，我没见过刘陶，他说我坐在这里等你是要给你传达的。会上所有的老同志都发言了，一致认为《南方周末》是办得好的，中宣部因为一篇失实稿子就停报不能接受。

林若是前任省委书记现任省人大主任，文革时候在《南方日报》当过革委会副主任，所以也来参加社庆，他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什么文章那么严重，因为一篇文章要停报，把文章拿来给我看。他看完以后说，你公检法做的坏事少吗，我们揭露一个小警察揭露错了又怎么样。

我们广东现在的领导就是不敢顶，我们不停他们能怎么样。黄文俞接过话题讲，你是大官，你口硬，像我们这样的秀才遇到这样的事情只有写检讨的份，但是刘陶我告诉你，告读者书必须要谢非签名以对历史负责，谢非不签名你们就不要刊登。你不要以为我们这班老人在说闲话，是广东新闻界老一代共产党人都在支持你们。黄每接着问我，你知道停刊整顿之后是个什么结果吗？我说我知道那就是我下台。

黄每说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就好，我今天为什么在这里等你，是因为听到你在主席台上始终讲一句话，我也有错我会总结教训，我听后很高兴，左方终于成熟了。

停刊通知发出后的第三天，刘陶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当时李民英也在办公室和刘陶商谈工作。刘陶对我说，谢非有指示来，报纸不用停了。谢非指示说，看一张报纸首先要分清它是好报还是坏报，如果是一张好报，哪怕一篇、两篇、三篇、四篇、五篇、六篇文章有错，报纸也不应该停。我认为《南方周末》是张好报，中宣部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报纸不能停。谢非同时指出《南方周末》要争取主动，要在报上写篇本报编辑部文章承认失实公开检讨错误。



并指示于幼军和《南方日报》分管的副总编辑和《南方周末》的主编一起赴京，向丁关根承认错误。后来于幼军把谢非的指示告诉徐惟诚，徐惟诚说谢非口头讲的话不算数。你们广东不同意停报，省委要写个正式公函给中宣部。后来省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讨论给中宣部的公函，公函的末尾有一句话，是否妥当请批示。有一位常委说，报纸是我们的要他们批示什么，划掉。李孟昱列席了这次会议，会后王华华特别交代李孟昱，回去要向南方日报的人讲停报的事他事前不知所以广东的领导对《南方周末》是爱护的。

刘陶向我传达谢非指示后，他补充说谢非的指示并非保《南方周末》这么简单，谢非站得高看得远，他是从大局出发作这个指示的，你要从这个高度来理解谢非的指示。我听不明白刘陶的意思，见李民英也用惊讶的眼光望着刘陶。我想如果由我要求刘陶作解释刘陶可能不讲，我走后李民英肯定会问刘陶，不如事后再向李民英了解情况。

晚上我给李民英打电话，李民英说我走后他果然问了刘陶，刘陶说谢非是专门派他的秘书从东南亚飞回来向他传达谢非的指示的，那位秘书说是林若将南方日报老同志的意见告诉王华华，要他转告谢非，谢非得知后便把他带出国的谋士找来，谋士们都说我们将经济搞好了，他们就说我们广东是文化沙漠，现在我们办出一份全国出名的报纸，他们又要停报，这次我们不能再让了。

谢非说，不停报总要想几句话回答中宣部，你们就为我想几句话，谢非指示的几句话是谋士们想出来的，刘陶把停不停《南方周末》看成是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

徐惟诚认为《南方日报》和《南方周末》都是当事人，不用来北京，指定由于幼军一个人向丁关根汇报。于幼军从北京回来，专门向南方日报处以上干部传达丁关根的指示。丁关根说，在国际上报纸因失实停刊例子很多，我同意谢非的意见报纸不停了，但是对《南方周末》编辑部必须严肃整顿严肃处理。

整顿一个多月后，于幼军就问刘陶，对左方怎么处理，刘陶说他检讨了三次。于幼军说那不行，要撤职。刘陶年龄比于幼军大，他就说小于啊，你年轻，处理一个人容易平反的时候就难了。对于报纸失实我们《南方日报》有惯例就是做检讨。左方已经作了三次还能对他怎么样。

于幼军说这次不同啊，丁部长讲要严肃处理。刘陶说如果要处理你宣传部派工作组进来处理好了，我们社委会的水平就这么高，刘陶为什么这样硬顶呢，是因为知道是我帮他保了两员

大将。到 12 月中旬中宣部给我打电话，说元旦后要在南宁开一个周末报的研讨会，邀请你参加在会上有 45 分钟时间给你发言，不许以谦虚为由拒绝发言。先口头给你一个电话，让你做发言的准备，以后他们会发正式通知给你，我就赶紧把这个事情报告报社。

刘陶当时认为这个会是专门整《南方周末》的，所以叫我不要去由游雁凌去，但是讲话的稿还是我来写。我说怎么写，他说按毛泽东的教导，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讲透，三七开嘛。一年多之前广东省记协开过一个经验交流会，叫我们去介绍经验，我有一个讲话稿，我就把讲话稿加头加尾就交给游雁凌，特别交代游雁凌宣传的新闻处处长王春芙要去开会，你千万不要把讲稿给他看。他要你看你就说我没有，因为左方妈妈病危不能去，临时指定我去。

他们一起乘飞机到南宁报到时，刚好徐新华和龚心瀚开完预备会出来，他们认识游雁凌说你怎么来了左方呢？他说左方妈妈病危他来不了。徐新华讲这次请你们《南方周末》来，我们中宣部是经过研究的，开周末报会议嘛，没有《南方周末》到场哪行。安排你们讲话，你要放开讲，你们的经验对大家很宝贵，你的错误对大家也是一个教训嘛。

王春芙处长当着游雁凌的面，把一封给中宣部的信交给徐新华，这封信是对《南方周末》整顿情况的报告。王春芙起草报告时打电话给刘陶，他说中宣部要开周末报会议，《南方周末》已经整顿两个多月，宣传部必须给中宣部写个报告，现在报告写好了，就是对左方的处理还空着就《南方日报》给我们一个说法。

刘陶说我都跟于幼军讲清楚了，检讨完就完了呗。接着邹启宇又打电话来说这样不行，刘陶还坚持，他说你坚持我没办法了，只有让于幼军给你通电话，后来于幼军打电话给刘陶说你如果坚持，我就只有报告谢非了，由谢非来裁决了。刘陶一听这个事就不好办，因谢非讲了中宣部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

后来社委会想出应付办法，给宣传部送去一段话：《南方周末》还在整顿之中，整顿之后要选择一个政治业务都很强的人来任《南方周末》主编。在没有找到适当人选之前，就由副总编辑李孟昱兼任主编。李孟昱把这段话给我看了，他说社委会没有免你的职，现在是双主编。

徐新华看了宣传部的报告后就跑来找游雁凌。左方究竟是什么人？第一届韬奋奖评奖时我是评选委员会主任，看过你们报社送来他的材料，他被评上奖后刚好发生《袭警案》失实停刊

这件事，就只好将奖转给你们广东的另一个人了。对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把他一生最大的荣誉给取消掉，处罚也算够重的了，报社能不能不撤他的职啊？

游雁凌说不是报社要撤他的职，于幼军说你们中宣部三次打电话要处理他。徐新华说，龚心瀚和我均不知道这事，可能是徐惟诚的秘书打的电话。后来他讲这样吧，你打个电话给《南方日报》撤左方职的文件先压着，我们回北京跟徐惟诚做工作。如果他同意我们再通知你们。

这天游雁凌在会上发言后，会场上响起雷鸣般地鼓掌声，《四川日报》的社长也来参加会议，他拦着游雁凌问左方心情怎么样，你回去告诉左方，如果心情不好，到四川来我按贵宾接待。

会后很多人问游雁凌要发言稿，游雁凌打电话问我发不发，我说我们不主动发。只发给主动向我们要的人。临散会的时候，龚心瀚说你回去告诉老左，你们是百万大报，发行量大担子也重。游雁凌回来不久，徐新华给他打电话，说跟徐惟诚讲了，徐惟诚说左方不过是个处级干部，中宣部管他干什么，这件事就了了。原本我们想为这个事发个通知，但是觉得发通知太隆重了。只打个电话又觉得太轻，因为你们省宣传部对左方的处理是向中宣部写了正式报告的，所以决定等于于幼军来北京开会时我们当面跟他讲。

停刊整顿本来到此结束了，但是我不想这样罢休，我叫游雁凌上北京向徐惟诚、龚心瀚汇报我们的整顿情况，让他们更了解我们的报纸。游雁凌请徐新华和龚心瀚吃饭，提出我们创刊十周年庆典因为《袭警案》这事推迟了，现在准备召开，请你们两位亲临指导。

龚心瀚说你们《南方周末》好大的胆子，我们杀你不死，你们倒要我们给你庆生日。后来游雁凌跑到卫生间给我打电话，我说你不要这样说嘛，你说我们要开一个全国十大周末报研讨会，贯彻南宁会议精神。

龚心瀚说我最近出国就不方便去了，由徐新华去，新闻出版署也可以去个司长。全国十大周末报研讨会召开时，我到徐新华住的房间，告诉他我们的办报思想和办报意图。

我说我们对党对政府不存在什么恶意，我只是希望中国新闻转型的时候，不要像苏联《真理报》那么惨，我修一个斜坡让我们新闻将来转型时平稳着陆。

我在研讨会上做了一个题为《加强新闻性是周末报的新走向》的报告，全国十大周末报研讨会结束的当晚，举行《南方周末》创刊十周年庆典，研讨会的参与者都出席了，徐新华上台

讲了话，肯定了周末报应该向新闻性这方面去转型。《南方周末》停刊整顿事件就这样了结了，从绑赴刑场到刀下留人，又以庆祝会结尾，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

历任主编

我顺便谈一谈《南方周末》在我在职的时候，历任领导班子变动的情况。

《南方周末》创办早期依托在文艺部，由文艺部主任关振东任首任主编，文艺部的副主任是赖海晏、许立源和我，我是挂名只负责《南方周末》的日常编务工作。开始筹办时关振东就跟我讲，他跟丁希凌有一个"君子约定"，他只兼任《南方周末》主编一年半，因为他年龄的关系在《南方日报》解决不了厅级问题，广州市统战部答应让他到《共鸣》杂志社任社长兼统战部副秘书长，给他个正厅级，丁希凌答应一年半就放他走。

关振东对我讲，《南方日报》有一个传统非党员不能当正职，只能当副职，当时我还不是党员，他叫我马上写入党申请，争取他在任期间解决我的入党问题。

我写了入党申请，而分管我们的《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琮找我谈话，你的入党不能只由文艺部支部讨论通过，你在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多事，你必须先在报社的一定范围内作一次检查。

我说我已经审查了一整年，写的检讨材料有十多万字，文革在政治上我不能负责，我只能负责我个人在文革中的行为，但是我的专案组已经明确作出结论，我既没有打砸抢行为，也没有迫害过任何人，没有经济和作风问题，所以我没有什么好检讨的。

这样我的入党问题就搁浅下来了。关振东调走前找我谈，他问过张琮他离开后由谁来接《南方周末》主编这个班。张琮回答由许立源任主编。关振东说如果他来恐怕跟你很难合作。我说不会，文革前我和许立源都是文艺部的成员，而且相处也很好。关振东说地位变了人也会变的，他现在是一个把个人权力看得非常重的人，关振东还举了一些例子。

我说我怎么好跟领导这样讲话，关振东说不用你去讲我代你说，只要领导问到你时你承认你跟我讲过这个话就行了。



关振东的主意果然奏效，他走后一年报社都没有派人来任主编，还是由我一个人主持工作。

直到 1986 年下半年张琮升为社长，《南方日报》社委会才决定《南方周末》脱离文艺部，正式成立《南方周末》的编委会，由赖海晏任主编，我和畲达任副主编，陈兆川任编委。当时报社还办有《花鸟世界》报，成员只有两个人，因而并入《南方周末》，其负责人张志光兼任《南方周末》副主编，但不参与业务，只负责《南方周末》的广告工作。

赖海晏未上任就被派到省委扶贫工作队一年，所以仍由我主持全面工作。一年之后赖海晏回来正式上任，我叫赖海晏安排我的工作。赖海晏说没有什么好安排的，我来之前你抓什么你还照样抓什么，我说编辑部的事全是我一个人抓的，他说那你就继续抓下去，我说你干什么？他说你别管我，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做人家没做的事。

我说你别开玩笑，你是主编人家都向你汇报怎么办？他说凡是向我汇报的我都问你跟老左汇报了没有，如果汇报了按照老左的意见办，就算我有不同意见我也这样宣布，然后我找你商量。

如果你接受我的意见由你自己出来改正，如果你不接受你还可以坚持按你的意见做。结果他真实地履行了他的诺言，我在一线他在二线，但我也很尊敬他，我掌握两条，一条是无论报内或报外的活动，我一律不参加都让他出面，电视台曾经介绍《南方周末》的经验，讲稿是我写的，由他上电视台我不上。

另外一条是凡是要做的事我都主动找他商量，如果临时我决定的事后都通报给他，这样我们建立了真诚的合作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1990 年他调去省文联当党组书记，提拔为厅级干部。

《南方日报》面临换届，张琮在离任前又重提任许立源为《南方周末》的主编，以补赖海晏离开之缺。社委们都说老左不是有言在先吗，许立源来他就要走，不如就让老左当主编。

张琮说那能由他说了算，而且左方不是党员，《南方日报》从来没有一个非党员当第一把手的。在僵持的情况下，李孟昱挺身而出，他说既然一下子难解决，就由我来兼《南方周末》主编，所以李孟昱就成了第三任的主编。

1991 年初《南方日报》社委会换届，刘陶来任社长，李孟昱任副社长仍分管《南方周末》。李孟昱告诉我，刘陶在新一届社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南方周末》1992 年要从 4 版扩大



为 8 版，为《南方日报》1993 年扩版探索经验，《南方周末》由左方任主编。大家都说不是非党员不能当主编吗？刘陶就说不是党员就吸收他入党，结果没半年我成了共产党员，是《南方周末》的第四任主编。

你问及游雁凌为什么接班后不久就调职，我和游雁凌的关系如何？我也听到过社会上有各种传闻，所以我详细讲讲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南方周末》第一次转型急需一个专职记者，当时深圳因大雨受灾，我在《南方日报》看到游雁凌写的三篇通讯文字很活。

我跟李孟昱讲，游雁凌是个什么人，我想要他来《南方周末》当专职记者，李孟昱说他学历只有中学，是省作协办的一个业余作者训练班。发现他比较优秀就调来当深圳记者站记者。

你想要可以向人事处提出来。我到人事处，人事处的人说你来晚了，已经决定让游雁凌到新华社办的新闻学院去学两年。我说那也无所谓，等游雁凌来办手续的时候，你叫他来见我。游雁凌来见我，我就告诉他我想要你到《南方周末》来，你现在去学习也不要紧，你学两年以后再参加我们这个团队。今后我每期都给你寄四份《南方周末》，你给你的同学阅读，因为你的同学都是各个报社比较优秀的年轻记者。

将来都可以做我们的特约记者。游雁凌两年学习期间，我每一期都亲自寄给他寄报，他每年寒暑假都来广州见我。1989 年夏天他毕业了，我说你应该来《南方周末》工作了。他说，现在不行。他老婆讲你学习这两年，孩子就我一个人管，我也要把精力花到工作上，今后由你来带孩子，他也觉得对不起他夫人，所以他不想来了。

我将此事告诉李孟昱，他说你给游雁凌什么职务？我说就是当记者。他说他当然不来，报社已经跟他谈了，提拔他为记者站的副站长。除非你让他来《南方周末》做副主编，我说一下子做副主编不行，这个事情就搁下来了。

到了 1992 年夏天，为了扩八版报社对《南方周末》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我仍任主编，游雁凌、卢昆、李益伦、邝志强任副主编，徐列任编委，李益伦兼办公室主任，邝志强管经营工作，《南方周末》也作为承包单位，开始独立经营。我对游雁凌终于调进《南方周末》是很高兴的，把最有新闻性和可读性的《人与法》版交给他，还把新调来的中大研究生谭庭浩给他当助手。他确实很卖力气，连续三次到全国组稿，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作者队伍。八版面世之后，他这个版是最叫好的。

1993 年春，李孟昱找我说你虽然还有一年多退休，但是因为《南方周末》是一张特殊的报纸，我希望接班的是《南方周末》自己的人，不然的话没有人接班，报社就会派人来任《南方周末》主编，我担心由日报派的人会将《南方周末》大报化。他说你看谁可以接你的班，我说游雁凌和徐列可以考虑。李孟昱说，徐列太书生气，你就给游雁凌机会上台表演表演。

《南方周末》扩版之后，调来很多新同志，大家斗志很高，提出在巴塞罗那开奥运会期间，增出一个《奥运特刊》，单独发行，奥运期间每天一期，我觉得这是锻炼队伍的好机会就同意了。

为了提高游雁凌的威信，我就宣布游雁凌为奥运特刊总指挥，《南方周末》的事儿他要听我的，《奥运特刊》的事儿我要听他的。游雁凌作为总指挥，他的策划很有创造性。他先和健力宝签协议，中国每得一枚金牌健力宝就登半版广告，经费问题就解决了，接着他将世界四大通讯社的奥运电讯全买下来，还和香港两家报纸联系，请他们将收到的奥运稿件第一时间传给我们，还请来了几个外语翻译，游雁凌每晚将译稿和香港传来的电讯稿分类交给各编辑综合改写，还请《人民日报》两个著名体育评论员写评论，因而《奥运特刊》办得很成功，报社还专门发我们一面奖旗。

《南方周末》八版中有一个文摘办不下去，我决定停办改办《经济与人》，李孟昱始初对周末报办经济版担心可读性不够，我就让游雁凌负责《经济与人》版的筹划工作，我告诉他已停刊的《世界经济导报》的副刊很有特色，叫他写编辑方案时借来参考。

游雁凌将编辑方案写好后，我自己又从《世界经济导报》中挑出八九篇最精彩的文章，让游雁凌并成两个样板送李孟昱看，李孟昱看后说如果你们能办到这个水平，《经济与人》版当然可以办了。我把《人与法》、《经济与人》都交给游雁凌，还派优秀记者谭军波给他当助手。

《南方周末》八版期间，头条文章主要登社会大特写，在全国引起一个社会大特写热。所谓社会大特写就是找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再找几个可读性高的事例拼凑成一篇文章，后来许多作家都介入进来，结果越来越假，读者也越来越厌倦，我让游雁凌去鼎湖山开第二次小字辈会议，会议也开得很成功。

经过这几件事，游雁凌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这时我就跟李孟昱讲，你现在可以到我们编辑部来正式宣布游雁凌负责协助我抓全面工作。接班的位置就定下来了。

我对游雁凌的培养还是不遗余力的，刘陶跟我有个约定，就是南方日报社调来所有的人，《南方周末》有权先挑。《南方周末》也可以去外面物色人才，报社都支持。但是如果《南方日报》要我们的人，只要是提拔的我不许阻拦。

1993 年报社给我们几个编制名额，我考虑快退休了，新招的人今后都是归游雁凌领导，所以我就叫他去挑人。后来挑回来的人李孟昱很不满意。他说我们报社是把人事权交给你，不是交给游雁凌，你要把人事权收回来。

我临近退休时，李孟昱要我返聘。我说一年以后我再返聘。李孟昱问为什么？我说我已经主持《南方周末》十一年了，任何一个人他再高明都有他的局限性。我马上回来返聘，别人不好动我的东西，我走了一年之后，让游雁凌他们放手去改吧，我那些东西该扔的扔，该建立的建立。等改革完成我再回来。

我 1994 年 12 月退休，再就不管《南方周末》的事儿了。没想未到两个月李孟昱就打来电话，老左你要教育教育游雁凌，他经常带一些女孩子出去喝酒，喝得醉熏熏的回来，稿子也不好好看要出问题的。

我去编辑部找游雁凌，他说忙要我等他下班带我去海鲜餐厅吃饭，他常约人到酒店谈话，可能是他在深圳养成的习惯。到了酒店，有个女服务员对他说，哎呀，游总，昨天你喝醉酒追我们，追得我们跑去女厕所躲避。

当时我虽然很不高兴，但是没有表露什么，只告诉他李孟昱对他的批评，他就给我诉苦，当主编很辛苦，压力又大，他的家也不在这里，闷的时候就喝喝酒。过了二十多天，李孟昱又打电话来，说游雁凌送来一个大样，除签了个名，我没有在大样上看到他有一个红笔字。

我打电话问他有多少篇稿是什么题目，他一问三不知。根本他就没有看，这样当主编非出事不可，你要狠狠批他。我找他时他又带到原来那个餐厅，有个楼面经理走来说，游总，前两天你来抢走了两个服务员胸前挂的牌。游雁凌说我没拿。那个楼面经理说你拿了就给回她们，不然要扣发她们的奖金，游雁凌发火说我说没拿就没拿。这次我忍不住了，狠批了游雁凌一顿，他也表示今后会注意。

五月上旬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多钟，有一个女的给我打电话。她说左先生，你有一个朋友姓游的吗？我说有。她说他因车祸现在中山医急诊室，你能去看他吗？我问他伤得重吗？她说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就是失血过多。我一听这个事就急了。

赶紧给李孟昱打电话，李孟昱说，他马上叫车，让我在街口等他，我们就赶到中山医急诊室。见游雁凌躺在床上，医生用布蒙着他的头，正给他做手术。我们静静地走过去，我见医生把他额头上的伤口夹开用消毒水清洗。

李孟昱拉我走出急诊室，说他晕血不能再看下去。他说游雁凌这个伤不轻，现在又是一个敏感时期，谁来代游雁凌我都不放心，你是不是明天就回来主持工作，我告诉刘陶就可以了。

我说他看来伤很重，恐怕要找两个年轻人来看护一下他。李孟昱打电话给李益伦，叫了沈颢和陈朝华去看护他。

等游雁凌做完手术，我们就进去看他了，游雁凌一看到我们，猛地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怎么惊动你们两个老领导，太对不住。我说你刚做手术，快躺下不要动。游雁凌就问我，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我说是你叫我来的。他说我没有叫。

我看到有两个护士在旁边，我就问护士，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两个护士说没有。我说是不是还有第三个护士呢？她们说今天值班就是我们两个人。我转过头问游雁凌你是怎么来这里的？他说我当时昏迷了，醒了才知道我在中山医急诊室。我又问护士他是怎么来这里的？护士说是地质局门诊所打 120 电话送来的。我对游雁凌说你满身酒气，是不是喝醉酒开小车给人家撞了。

他想了一下，说是开了小车被人家撞了，他还从口袋里面拿出小车的钥匙给我。

给游雁凌做手术的医生回来了，我问医生他的伤势怎样，医生说你们马上送他去照 CT，如果脑部没有问题就是外伤。照 CT 回来，沈颢、陈朝华来了，我和李孟昱就回家。

在车上我跟李孟昱讲，游雁凌开的小车不知道撞成什么样子，这车没有办车牌，如果交警把它拉走麻烦事就多了，我们去看一看吧。

到了出事地点没有看到小车，李孟昱说拍诊所的门，问问当时的情况。后来两个女护士出来，我们问两个多钟头前是不是有一个车祸的人到你们这里，是你们送他去中山医院的？她说是。

我们问，他怎么来的？她说是两男一女把他送到我们这里来的。他们开着小车手上还拿着手机。诊所医生下班了，我们只是帮他止了血，擦干净脸上的血，就叫 120 把他送走。我说他清醒吗？

她说一直都是清醒的，他临上车还给我们道歉说，辛苦我们了，对不住。我问没人送 120 肯收他吗？她说送他的人跟 120 的人讲，他是《南方日报》的，没有事儿，你送去以后他报社会有人来的。

这个护士还说，有辆自行车被汽车压到两个轮子都卷起来了，现在扔在我们院子里，你们《南方日报》明天派两人来把自行车拿走。

游雁凌明明说是开小车，现在人家说是自行车，他说昏迷了，人家说他是清醒的，两男一女是什么人？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李孟昱说回中山医去，再找游雁凌问清楚怎么回事。

我对游雁凌说，你不是开车被撞的，是骑自行车被撞的，怎么回事？他想了一会儿，是啊，我骑着一辆自行车，看到有一道亮光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在旁的医生说他的伤不是被小车撞的，额头的伤是被利器刺的，背部的伤是被钝器打的，我听后对游雁凌说医生说你的伤不是车祸引起的，游雁凌又想了一会说记起来了，我看到一个穿白衣的人拦我下车，我下车后来我就昏迷了。

李孟昱说，那就是抢劫啦？你丢了什么东西？他说我丢了一个手机，有小数钱，还丢了一个手表。我们见他身体很虚弱便不再追问下去。在车上，李孟昱对我说，你明天回报社第一件事是到保卫科报案，说游雁凌被人家打劫、打伤。

第二天我就到保卫科报案。我从新主持工作的第一天，李益伦就给我送来 16 版的策划方案，后来我一看，什么花花世界版，什么企业家版，什么旅游热线版，什么逛商场版，我对这些东西很不满意。

在我退休前和游雁凌达成一致意见，这次扩 16 版不是数量的增多，而是质的突破。搞这些东西是违背扩版的总方针的。我就把策划方案交给李孟昱，李孟昱看了以后说，游雁凌想搞钱。你在会上宣布策划小组撤销，将策划方案搁置。叫徐列找几个青年人从新策划，而且告诉他们要快，在游雁凌回来之前就要将扩版方案搞出来。

我就按照李孟昱说的办，让徐列他们重新设计。游雁凌在深圳治伤期间，我曾给他打电话，问他为什么搞出这样的扩版方案。游雁凌说方案内容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工作方法和我不同，他要发扬民主，放手让策划小组去做，待他们搞出来后再做研究。反正最后还是李孟昱、我和你三个人说了算。我把李孟昱的处理意见告诉他，他也无话可说。报案的当天中午，我去中山医院看游雁凌，见两个民警正给他录口供，我在急诊室门口碰见陈志红，她也是来探望游雁凌的。我告诉她游雁凌在录口供不要进去。

我把昨晚发生的事情跟她讲了，陈志红说他的手表在我那里，我说他的手表怎么在你那里。她说昨天他拉我去喝酒，后来喝醉了。酒醒后我跟他一起骑车回家，到犀牛路口分手时我对游雁凌说，十点多钟了你小心一点。

游雁凌看了一下表说，什么十点多钟，现在才七点多了，我说你这个破表扔掉它吧。他就把这个手表脱下来扔在马路上，是我给他捡起来的。那时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是他跟陈志红喝了酒。

下班前我去保卫科了解公安的调查情况，但是人事处处长黄峨对我讲游雁凌车祸地点不在下班路线上，所以他这次车祸不能算工伤。

我说，你们不算工伤，游雁凌要大闹啊，黄峨说我们是照章办事。后来我就把这个事儿报告李孟昱，李孟昱说我打个电话给黄峨，叫他不要再管这事了，这个案子保卫科也别查了，越查越复杂。

徐列他们将新的扩版方案设计出来后，李孟昱表示满意，指示将方案在下期《南方周末》上注销来。这样游雁凌回来，就没有话好说了。扩版方案用的标题是《百万大报的庄严承诺》。

游雁凌伤愈回来，我对他讲，你刚刚回来，我再帮你顶两周，让你熟悉一下新的扩版方案和明年的广告承包方案。两周之后我就回家继续过我的退休生活。一周之后，游雁凌告诉我说，李孟昱要他找我谈话。他把我带到水上餐厅，他说李孟昱讲你这次回来就不要再走了，你看返聘后你怎么安排？

我说，这样吧，第一个方案是以后你看不过来的版，我帮你看。你有些事儿忙不过来我帮你做。第二个方案是我编一个版。第三个方案是我回家继续我的退休生活。

游雁凌说第一个方案我当然求之不得，等于我们调了个儿，以前是我辅佐你，现在变成你辅佐我。但是《南方周末》很多年轻人有意见，他们对你有看法。编一个版让你跑上跑下我于心不忍，回家过退休生活不符合李孟昱指示。他说我提出第四个方案，你把办公桌搬到经理部，和总经理一起办公。

对编辑部的事儿有问题我会前来请教。我说游雁凌你有没有搞错，我 60 岁了，你要我天天和总经理陪客人喝酒。

他说不是这个意思，你坐镇中军，我要对老邝讲经理部的事由你说了算。我对游雁凌这番话当然不高兴，我说我决定回家过我的退休生活。第二天李孟昱打电话把我叫去，你不肯返聘是不是？我将和游雁凌的谈话过程告诉他。

李孟昱说，我已经跟他谈清楚，虽然不给你一个顾问的头衔，但实际起一个顾问的作用。编辑部的事儿你可以参与，经营的事儿你也可以参与。

接着他打电话叫游雁凌下来了，将他的意思向游雁凌重申一次，游雁凌只好承诺，不料我将权交回游雁凌才一个多星期，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他得了急性肝炎，部马上住院有生命危险。

他还说接卫生室医生的通知后，他站在窗前不禁对天长叹，大声念“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我说游雁凌你别那么悲观，医好病后还是你做主编，你愿意我返聘就返聘，不愿意我就回去过退休生活了，第二天他就回深圳入院治病。

因为明年版面要增加一倍，要招收大量人员，李孟昱就把选人的任务交给我。李孟昱说游雁凌是武大郎开店，你必须在他病愈之前将全部人员选好。但游雁凌每天都在病床上给各部门领导打电话、发指示，连调进鄢烈山这样杰出的人才他也在电话上加以阻拦，使我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我只好将情况报告李孟昱。李孟昱得知后就到《南方周末》周会上宣布游雁凌在病中，要让他安心治病，今后《南方周末》的事不用他管了，你们也不要再向他汇报工作。此后游雁凌就未能再过问《南方周末》的事情。

1995 年中秋节这天，《南方日报》社委会换届，李孟昱任社长，江艺平新任社委委员，李孟昱不再分管《南方周末》，改由江艺平分管《南方周末》。李孟昱从 1987 年起就一直分管《南方周末》长达 9 年之久。他热爱《南方周末》，不仅每个版都认真审阅，《南方周末》

每个周会都来参加，提出指导意见，许多大的决策都是由他做决定，他对《南方周末》的贡献是很大的。在现行政治体制下，领导是决定一切的，没有他的支持《南方周末》是很难向前发展的。

这天宣布了之后，游雁凌晚上打电话给我。说他今天得知报社有人谣传他和陈志红有不正当关系，他很气愤，他用了半个多小时表白他和陈志红的关系是完全正常的，又要我和他夫人讲电话，他夫人说，他们家和陈志红家是老关系，她也不相信游雁凌会看上陈志红。我说这类谣言最伤害的是家庭，既然你不相信，游雁凌就更不要计较了。他夫人说游雁凌不服气，李孟昱分管《南方周末》是儿子报，现在由江艺平分管，《南方周末》就成为孙子报了。我问游雁凌你要求我做什么？他说让我和李孟昱讲，让李孟昱在《南方日报》周会上给他辟谣。我说你直接打电话给李孟昱好了。他说我跟李孟昱脾气都不好，我们一谈就会僵起来，是不是你帮帮忙做一个中间人帮我转达。

我就把话转达给李孟昱，李孟昱就说这类事情只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没有调查凭什么辟谣。我最多在报社周会上说，报社最近有些谣传，影响团结，要求大家不要传谣，我只能讲到这个程度。

我叫李孟昱直接告诉游雁凌，李孟昱说他都不给我打电话，我干嘛要打电话给他，由你转达给他。我把这个话转给他了，他说如果报社不管我要回来贴一张大字报向全报社辟谣，你告诉李孟昱。

我跟李孟昱讲了，李孟昱说你告诉游雁凌现在不许搞四大。如果他要贴大字报，他的主编就别当了。我又把这个话转给游雁凌，他说我不贴大字报，我作为一个党员，我向党写申诉材料不行吗？后来我又把这个话传给李孟昱，李孟昱就要我打电话给陈志红，问问游雁凌他究竟想要什么？

我给陈志红打电话，我说游雁凌一直想不通怎么办？李孟昱叫我问你，游雁凌究竟想要什么？陈志红说也没有什么，这类谣言我在作协工作时听多了不在意。但是游雁凌可能是第一次遇到他受不了。他希望你们两个德高望重的领导为他洗个清白。

不久，游雁凌就写了一份材料，寄给报社的所有领导，其中一份寄了给我，后来可是不久他从深圳跑回来找我，要我将材料退回给他。我问为什么？他说，报社领导通知他自己回来将全部材料收回。

事后李孟昱告诉我游雁凌闹来闹去实际上是闹着要当社委，社委由省组织部定的，江艺平分管《南方周末》也是社委会讨论决定的，游雁凌不愿意跟江艺平合作，称由她分管《南方周末》变成孙子报。所以社委会决定将游雁凌调开，让他当《南方日报》总经理助理。而江艺平既负责分管又兼任《南方周末》主编。

江艺平认为分管《南方周末》是社委会的分工她接受，但兼任《南方周末》主编她挑不起这担子。

李孟昱要我去做江艺平的思想工作，我和江艺平讲，你别以为只分管，让别人当主编你很轻松，如果选到一个品质好的人做主编，那当然是好。如果遇到一个品质坏的人把你当成一面挡风墙，做事事先不告诉你，出了问题就推给你，这时你更难办。

思考后江艺平说，老左你答应我一个条件，你陪我跨世纪我就接受主编职位。这样她就成为《南方周末》第五任主编。

江艺平是才女型主编，温柔文静，文人气质很重，但内心却极其坚强，是个有理想的外柔内刚的女性。她尊重同事，勇于承担责任，中宣部两次召她进京谈话，多次通报批评，她都能沉着应对。她尤其善于发挥年轻人的积极性，在她主持工作时期，是《南方周末》最红火的时候，她从十六版再扩充为二十四版，由于版面增多，人员编制也大幅增多，在她的影响下，新闻界大量精英涌进《南方周末》，形成一个猛将如云的大好局面。所以我讲《南方周末》这棵树是我主持工作时代种的，但开花结果是在江艺平主持工作时代，这是一个至今仍无法超越的盛世。

1998 年 10 月，李孟昱通过江艺平转告我，于幼军最近找他谈话，说左方退休四年，但《南方周末》的重大决策权还在他手上，连北京也传说《南方周末》有个邓小平，这很不正常，左方的返聘期最多到年底结束，不许再将聘任期延续下去。我为了不连累李孟昱，马上就提交解职报告，就此结束我作为新闻人的生涯。

用文革经验办报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我在其中也做了许多错事，中央完全否定文革我是拥护的，但经历的风风雨雨对一个人来说也得益不浅。你们提出我怎么用文革的经验来领导这个报纸，我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我在文革中学会在低潮时期如何求生存的本领。最典型的例子是 80 年代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对传媒的控制极严。这时候《南方周末》的发行量也连续跌了 10 多万份，内部的情绪比较低落。我这个人办报，总是要编辑部处在一种热气腾腾的状态，只要情绪降下来，我就会为大家找一个兴奋点，这个时候能找什么兴奋点呢？

我提出“三玩”，玩人性、玩文字、玩版面。我把队伍带到高明县召开三天业务讨论会，会前我从内地和香港的一些杂志上选出一批极具人性味的美文并成几个样版，让大家来讨论。大家觉得如果按“三玩”这条路走，我们报纸还是有人买的，因为当时全国报纸都没东西可读。

果然不到几个月，我们报纸的发行量又上回去了。我在文革中学会如何判断政治形势和利用政治形势。有一天，卢昆从深圳回来对我说，老左，邓小平可能今天或者明天要去深圳视察。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昨天跟我哥在深圳国贸大厦喝夜茶，下楼时看到中层一个大厅里面，服务小姐拿着花在演习“邓伯伯好，邓伯伯好”，肯定小平要去国贸大厦视察。

这个信息马上触动我敏感的政治神经，我觉得这个是非同小可的信息，根据我们国家的制度，重要的领导人的行程是绝对保密的，是谁叫国贸大厦这样做？我想谢非不可能，只有邓办才有这个权。

我再想，为什么邓小平本人没到，要把他到来的信息捅出去呢？我想他要引起香港传媒的注意。引香港传媒注意干什么？他要讲话，要将讲话出口反内销，为什么要出口反内销呢？肯定他的讲话在北京不方便谈。哪些话在北京不方便谈呢？肯定要反左，要大动作地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

所以我敏感察觉一个办报的新时期到来了，为了证实我这个判断，我放了一个政治气球，刊登一篇题为《论奴性》的尖锐反左的杂文，并看看北京的左派有何反映。

接着我从外电果然听到小平在深圳的讲话的一些传闻，这时候我马上叫编辑部放开手脚去办报，原来不能采写的题材现在都可以采写了，而连续在报纸上刊登一批反左的杂文。

到小平的南巡讲话在国内公开后，各个报纸也都行动起来了，我就要求《南方周末》原地踏步。因为中国的事放了之后又要收，反正我已经抢了头炮，在社会上已产生很大的影响，等到收的时候就要枪打出头鸟，那我已经不是出头鸟了。

文革的经历让我懂得什么位置是最安全的，《袭警案》我们刊登了《沉痛的教训》检讨文章，接到了一百多封读者的信，大概有 80%的信都在夸奖我们，说我们有大报风度，现在讲假话的报纸多了，你们登了一篇失实文章就如此深刻的检讨，我们以后会更信任你们的报纸。

但是也有 20%的信说我们从你们的编辑部文章里面听到你们在痛苦地呻吟，也有读者来信说你们一定是闯大祸了，即使你们过得了关，以后再也没有我们心中的《南方周末》了，你们必然要被迫改变办报方针。

因为看了这些来信，我就告诉编辑部的同志，我们的办报方针一步也不能退该登的文章照登，该讲的话照讲。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收敛了，读者就认为我们怕了，改变办报方针了。有同事说那现在正在整顿时期，这样干行吗？我说台风的中心是最安全的，徐惟诚要杀我们，谢非保了我们，难道徐惟诚马上又动刀子吗？这个时候我们是最安全的。

通过文革我懂得历史的进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对《南方周末》的社会功能我提出“凉亭效应”这一概念。《南方周末》办报思想是忧国忧民，关怀弱者群，但是我们很清醒地知道，中国要完成现代化这个历史进程，必然我们的民众要为此付出血与泪的代价。

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不能自命为“救世主”，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报纸给受奴役受伤害的人一种心灵上的慰藉，让他看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关怀他们，爱心还在，良知还在，正义还在，黑暗中还有一点光明。要让他们坚强地活下去。

这好像在烈日下劳苦大众把汗水都流干了，我们救不了他们，但我们建一个凉亭，请他们到凉亭里来歇一歇，喝一口甜美的甘泉，喘一口气，疗一下伤，如此而已。所以我提倡理性办报，反对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好汉思想。

返聘抓经营

1996 年 1 月 16 版扩版成功了，读者中传来一片称赞声，我告诉江艺平，现在的重心是经营了，因为我们向报社申请扩 16 版时，是和报社社委会立下军令状的，报价要增加一倍，广告利润要增加一倍，给报社上交的利润也要增加一倍，如果经营抓不上去，我们就没有办法给报社交代了。从今天起我再也不看稿了，我事后读报有意见会在周会上谈，但是我要求保留两条中缝给我做自留地，开辟一个读者心中的《南方周末》专栏，用来选登读者的来信，我所以保留这块自留地，是为了用读者的来信和中宣部的审读小组唱对台戏。

以后两年多时间，我把主要精力用来探索报业新的经营理念。“真理报模式”的经营理念是两个轮子，一个是办报，一个是如何将国家给报社的钱用好用完。我提出的经营理念是三个轮子，一个是编辑部，一个是发行部，一个是广告部。全国报业协会曾要求我们到会介绍经验，我就写了《让三个轮子和谐地滚动起来》。

我把编辑部定位为前轮，它的任务是提供稿件给读者，但只有通过发行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上，报上文章才会产生社会作用，因而我把发行部定位为第二个轮子。并将发行视为报业经营的牛鼻子，我提出要用一流人才抓发行，发行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力劳动，他是一个智力劳动，他的任务不仅是把报纸发行出去，而且要把读者的信息反馈回来。

报纸办得好坏是发行工作的基础，因而发行对编辑部这个前轮有依赖关系，我们就可以利用发行对编辑部的依赖作为反作用力，把编辑部牵进市场，从编辑本位转为市场本位。

我将广告部定位为第三个轮子，广告表面上卖的是广告版面，但是广告版面只是一张白纸，一钱不值的，它所以能卖钱，是负载报纸的传播功能，传播功能是谁创造的呢？是编辑部和发行部共同创造的，所以广告部的利润源头是编辑部和发行部。

报纸传播功能是广告工作基础，所以我又认为广告部的任务是如何去发挥这个传播功能的影响力去换取广告费。这样广告部就必须爱护报纸的传播功能，不能破坏它。所以我就要求杜绝任何有偿新闻。

每一个广告员可以带信息回来，但不能允诺企业任何条件，不允许广告员和记者同时进入一个企业采访，不允许编辑部任何人收取广告提成。



另外广告是报纸的经济柱石，但是广告赚的钱不是广告部独自赚的，是三个轮子共同赚的，所以在分配上应该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共同分配。有一些报社广告部就说，你们编辑部是我们养的，没有我们的广告收入你们活得了吗？编辑部和发行部则说我们放水你们抓鱼，内部闹出很多矛盾。

根据这三个轮子的经营理念，内部的分配问题就好解决了。三个轮子的经营理念还解决广告部和发现中的矛盾。比如发行部和广告部每年都各自拥有一笔宣传费用，发行部只将宣传牌设在大城市的闹市区，广告部要求设在工业大道上，发行部认为工业大道人流少，但是广告部说工业大道设有广告牌有许多企业老板看到。

我们要求广告部把一部分的宣传经费给发行部，让发行宣传为广告服务。广告部注重大中城市的发行量视为有效发行，而把小城镇和不发达地区的发行量视为无效发行。

而发行部则只追求发行总量，每年平均给报贩增加一份报纸给一元钱奖励，广告部对此很有意见。我就让广告部给中等城市的报贩每多买一份增加一元，省会城市报贩多买一份增加两元奖励以增加对广告有利的有效的发行数。

当时报社规定我们的总成本不能超过广告收入的 30％，如何科学分配成本，我亦以三个轮子的经营理念来解决。如果发行和广告工作都处于上升状态，我就将更多成本投向编辑部，用以提高记者的采访费用和作者的稿费，以有利提高报纸的质量。

如果发行出现下行趋势，我就把钱更多投到发行宣传，广告急时我就更多把钱投入到广告宣传上。三个轮子的经营理念比两个轮子的经营方式更符合市场经济的报业经营。我返聘之后在报业经营上所作的探索，也是在报业经营上打破《真理报》模式的一大成果。北京三个新闻理论刊物都发表了我写的有关文章。在《中国报业》杂志上发表的《发行在报业竞争中的位置及发展》一文还被选入《中国新世纪理论经典文库》。

三请**钱钢**

《南方周末》在 1995 年筹办扩 16 版的同时，许多同志提出要多办一本《新闻周刊》，游雁凌提出同时要成立一家公司，这就组成了一报一刊一公司的发展计划。我们用钱购买《文

化大观园》杂志的刊号，再向新闻出版总署申请改变主办单位，改换刊名。李孟昱对我说，这些事和公司的事交由游雁凌去管，但《新闻周刊》的编辑方案和领导班子的组成要由你来抓，《新闻周刊》筹办期可由游雁凌挂主编，但杂志办成功之后报社就要收回，所以一定有一个完整的能独立操作的班子。为了给《新闻周刊》物色一位主编，我去找王蒙介绍，王蒙介绍钱钢。钱钢我不认识，但是我很敬佩他，因为我读过他写的《唐山大地震》，觉得能把一场灾难写得那么有人文深度很有才气。

我知道他是大校，据说还是《解放军报》的接班人。所以王蒙提出他时，我说钱钢能来我们这里吗？

王蒙说现在钱钢已经离开军报了，先是到地震局办《减灾报》，后来三联书店和香港明报合办新闻周刊，聘请钱钢做主编。后来中宣部不同意三联书店和香港明报合作办刊，钱钢也退了出来现在赋闲在家。

经王蒙引荐我来到钱钢家，我把《南方周末》创办《新闻周刊》的意图告诉钱钢，他筹办过新闻周刊，还到欧洲考察过，所以对新闻周刊很有研究，给我讲了许多有关新闻周刊的知识，到吃饭的时候我就请钱钢到外面吃饭，钱钢说他家里从来没有到饭馆吃饭的习惯。

让我到外面吃完后再回来谈，他看到我的脸色很为难，他说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你就在我家喝稀粥、吃馒头。我邀请钱钢任《新闻周刊》主编，连续三天和他一起研究筹办新闻周刊方案，钱钢主张新闻周刊分设三个摊子，第一个摊子是总部，设在广州，建议由韩少功主持编务和出版工作，配一批改写手。第二个摊子设在上海，由朱学勤主持，以组织新闻和学术性稿件为主。第三个摊子设在北京，由钱钢主持，以组织政治、经济和新闻稿为主。可以说是一个豪华的阵容。一次我问钱钢你为何离开军报？他说有两个原因。一个《世界经济导报》停刊时，他给钦本立打过一个慰问电报，第二个是军报有一些年轻记者去天安门慰问学生，他事后知道赶去带领他们，就是因为犯了这两个错误离开军报的。

我回来后把这些情况向上面汇报了，李孟昱这个人是很爱才的，而且对钱钢提出的方案很欣赏。我把朱学勤从上海请来，把钱钢提出的方案告诉他，朱学勤也很有兴趣，他同意主持在上海这个摊子。我说要不要把韩少功请到广州来商量，他说不用了，我跟韩少功很熟，只要我跟钱钢加盟韩少功绝对会同意加入的。



后来没想到报社不允许我们申报，因为要办《南方都市报》，怕两个刊号申请同时送上去，新闻出版总署不批。报社觉得办《南方都市报》比办新闻周刊更重要，所以这个事情就搁下来了。

到了 1997 年《南方周末》开始考虑扩 24 版，我跟江艺平讲我始终是要退下来的，钱钢很有才华，建议请他任常务副主编，江艺平非常高兴，要我马上到北京请钱钢。

我到北京后才知道钱钢已经被中央台借调到《新闻调查》这个栏目去了。我跟钱钢讲你去中央台不是调去而是借用的，你进不了中央台的就解决不了你的住房问题，到我们这里来任常务副主编可以解决你的住房问题，但是经多方说服，钱钢一直很犹豫。

后来我跟钱钢讲，这样吧，过几天《南方周末》要开业务研讨会，我邀请你以贵宾的身份来参加这个研讨会，你直接感受一下《南方周末》的气氛，再决定来与不来好不好。

钱钢答应了，研讨会在珠海召开，主题是实现题材多样化，因为当时《南方周末》的头条期期都是大案要案，虽然发行量直线上升，但我认为存在不可持续性，而且风险也大，所以提出题材多样化的要求。年轻记者写大案要案正在兴头上所以抵触很大，在会上争论得很激烈，会议结束时钱钢告诉我他不来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南方周末》这些年轻记者太狂了。我说这是我们的传统，在业务讨论会上有不同意见容许激烈辩论，但是只要编委会听了所有意见之后作出决定，大家还是会执行的。但是钱钢还是说他不来。

我这次到钱钢家二请钱钢，钱钢要请我去上海馆吃饭。我说你不是说你家从来不下馆子的吗？他夫人说钱钢离职之后，我们家经济负担很重，钱钢说我们没有钱请人家吃饭，我们也绝对不接受人家的请。所以钱钢说你上次来我家，委屈你陪我们吃馒头稀饭，今次他借调中央台有钱了，所以一定要好好请请你。

钱钢带我到一家上海餐厅点了好多菜，我说三个人怎么能吃得完，他夫人说钱钢想把他青年时代爱吃的菜都让你尝一口，吃不完不要紧我们打包。从这件小事我不仅敬佩钱钢的才华，更敬佩钱钢的人品。

珠海业务讨论会后，钱钢打电话给我说中央台孙玉胜副台长想请你到中央台介绍《南方周末》的办报经验，我为了三请钱钢便答应了经验介绍作完之后，是钱钢送我到机场，我这次有意一直再不劝说他调来《南方周末》，临上飞机前我给了他一句重话，我说钱钢，你不到《南



方周末》来，你以后会终生后悔的，我讲完这句话就上飞机了。果然过了一段时间，钱钢来电话说我这一句话对他触动很大。

他思想斗争了好长时间，还征求一位老前辈的意见，那位老前辈说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他故此决定来《南方周末》任职。江艺平和报社人事部门商谈钱钢调进报社的问题，负责人事工作的张瑛找我，她说钱钢是一个大校，套地方的级别应该是副厅级，但是《南方周末》仅是处级单位，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后来我打电话问钱钢，钱钢说对级别的事毫不计较，什么级都无所谓。我把钱钢的答复告诉张瑛，张瑛说对钱钢的调动恐怕还急不来，因为省组织部对涉及这场政治风波的人很敏感，她说要找机会慢慢给省组织部做工作。

后来过了没多久，江艺平告诉我说钱钢调入没有问题了。她说张瑛昨天晚上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长江防洪纪录片，发现纪录片执笔者署名钱钢。钱钢的名字可以在中央台出现，他的调入通过省组织部就不会有问题了。

钱钢怎么会成为纪录片的执笔者呢？后来听钱钢讲，是因为当时长江防洪抢险是中央台每天新闻的重点，中央台领导知道钱钢对组织策划新闻很有经验，便把他从“新闻调查”借用去参与整个报道的策划。后来长江防洪抢险胜利之后，江泽民跟曾庆红说要出一个纪录片的集子，曾庆红指定要钱钢执笔。张瑛彻底放心后，将钱钢的档案从地震局调到广州，但将档案打开一看张瑛很惊讶，居然关于钱钢的错误一个字也没有。

那是怎么回事呢？报社派人到《解放军报》去了解情况，军报的政工部门介绍说，当时一些年轻记者要去天安门广场，事前钱钢根本不知道，知道后怕那些年轻记者闯出大祸，就连忙追赶去领着他们喊了几句中性的口号，就把他们带回来了。

军报的领导认为钱钢应该是好意，甚至是做了一件好事，但是钱钢不愿意把责任推给那些年轻记者，他主动的把责任都由自己挑起来了。后来总政治部对军报讲，你们军报有记者去过天安门广场军委都知道了，你们军报不处理一个人是不行的。

这样就要钱钢离开军报，但是他的大校军衔保留，而且时任军报社长交代军报的人事部门把有关问题的材料留在军报，不要放进钱钢的档案里。这个社长病重逝世前，交代军报人事部门要把留在军报钱钢的材料全部烧毁，所以现在军报也没有一个字。

我离开《南方周末》才几天钱钢就上任了，成为江艺平的有力助手，当中他们两人经历了许多风浪。2001 年《南方日报》奉上面指示，要江艺平和钱钢两人同时离开《南方周末》。他们两人的离去意味着《南方周末》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继承者们一方面延续《南方周末》的传统，一方面对报纸进行大力改革。他们是《南方周末》早期提出的，要将《南方周末》办成一张有全国影响的大型新闻周报梦的圆梦者。

新闻业的三个导师

我从事传媒工作三十六年，有三个导师。一个是黄文俞，他是一个思想家型报人，对我思想影响很大。黄文俞临死前我对他讲，《南方周末》的办报方针有四条，三条是从你那里学来的，其中有一条是我创造的。他说哪四条？我说新闻主攻，副刊主守，这是从你这里学来的，《南方周末》在主攻方面我没有多少成果，在主守方面我有点小发明，我叫他们不要编报，而是要玩报，我说编报是履行公事，玩报好像你玩盆景，把个人志趣投进去，要努力做到尽善尽美。攻是要把读者拉进来的，守是要把读者留下来的，黄文俞点头。

第二条就是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不要说假话。这是我从你这里学来的，我一直加以贯彻，但是我也有小小的创造，我说有不可讲的真话里面可分成两类，一类我叫做硬雷区，所以我提出四个维护，画四条红线，但是大量是软雷区，有些真话所以不能讲，只因为政府管新闻的官员怕产生副作用。我觉得大量的软雷区是可以突破的。只要掌握好舆论导向，又把握好一定的度，再配以处理技巧和策略，就可以把不可讲的真话变成可讲的真话，如果只是讲可讲的真话，那么阿猫阿狗都可以办报，把不能讲的真话变成可讲的真话才是办报的真本领。

我说第三条是我创造的，我称作“先做瓶，后酿酒”。我说瓶是指新闻形式，酒是指新闻自由。我们接受有不可讲的真话，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放弃了一部分的新闻自由权。我们要将重点放在新闻形式的改革上，彻底改掉“真理报”模式的假、大、空，创造一种新的新闻文体和语言。

所以我主张是先让大家做瓶，等到新闻改革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把新闻自由这个酒装进去了。萧干先生见我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们要满足现在的自由平台，新闻自由是政治、社会、

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不是你要就有的，要有耐性，不要硬争，现有的平台对一个有才干的新闻人来说，就足可以发挥他的才能，为民众做许多有益的事情，问题是你们怎样利用好这个平台。我提出的“先做瓶，后酿酒”的策略就是受萧干先生的启发提出来的。

从容是办报的最高境界，这句话我也是从你那里学来的，文革前你有一次讲话，说总结十多年当总编辑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从容两个字。我对从容的理解是作为一个报人，要做到从容，首先对现实要吃透，第二对党的政策要吃透，第三要有很敏感的新闻触角，第四要有很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但是要真正做到从容有这四条是远远不够的，最根本的是要有一个政治家的胸怀，有些稿件受到上面的表扬，我们不要沾沾自喜，很可能仅是适应了当时某种政治需要，在历史上是篇完全没有价值的新闻，我们受到处分时不要惊慌，很可能受处分的这篇报道在历史上是最有价值的新闻。

黄文俞听后很高兴，许实来探病时他还把我的话转述给许实听。

关振东是我进入新闻界的第一个老师，新闻的专业知识都是他教我的。他多才多艺，新闻的各种文体他无所不能，专长是写诗和散文。《南方日报》的同事都称他为关诗人，他还是书法家，写的一手好字。我后来才知道关振东没有学历，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就是在农村当小学教师。我问你的国文基础怎么打得那么深？他说在乡村当教师空闲时间很多，但是没有书可读，他居然抄了一部《辞海》。

解放以后他才出来办报。同样很努力学习，他很重视对业余文艺作者的培养，大家都视他为导师。他平等地对待他的部下。他称我老左让我称他老关，一进入报社，对我这个新同志爱护有加，当时我是单身汉，每逢春节、除夕、中秋等节日，都请我到他家里面吃饭。

另外关振东很爱才，只要有才他就会充分发挥你的才能，关振东经常说选人要选能自己所不能的人，做领导不是一切都要比别人强，而是要创造一个好的舞台，发挥大家的作用。

黄每是我参加工作第一个领导人，我们关系很深，直到他终老我都是他家常客。黄每处事非常从容的，生活不拘小节。他是著名杂文家，负责杂文的编辑崔山告诉他本期没有杂文，留下一千字的空位等他来写，他承诺后就躺在躺椅上睡大觉，半夜将他摇醒他才动笔，写一页让编辑发排一页，写完刚好一千字，杂文好像在睡梦中已成竹在胸。

黄每是个老革命，解放前就是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办的一家报纸任国际时事评论员，在当地他是个知名人物；以此身份掩护过许多地下党员，对党作出过巨大贡献。在他领导下的理论文艺副刊部，不仅没有官场气，连机关气也没有，他总是和大家说说笑笑，很少批评人，但大家不用他督促都很积极工作，把黄每看成是个大家长，整个部门活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我很幸运进入新闻界就遇到三位好领导，他们三个人在做人做事方面对我影响是很深的。

《南方周末》变与不变

江艺平、钱钢时代结束后，《南方周末》也闹过几场大地震，但《南方周末》的精神还是保存住了。什么是《南方周末》精神？就是启蒙和讲真话。讲真话是《南方周末》的体，启蒙是《南方周末》的魂，保持这两条就是《南方周末》，丢掉这两条就不是《南方周末》，要动摇这两条也是不容易的。一是《南方周末》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读者群，而读者对《南方周末》也有一个固定的认识，你想反其道而行之，读者会不断写信来抗议，发行量就会迅速下滑。

第二，《南方周末》的队伍大多数是因为认同《南方周末》的办报理念才加盟进来的，你要改变就必然跟下面产生激烈的冲突。第三，《南方周末》每年都给报社提供巨额利润。谁把《南方周末》搞垮，谁就是南方报业集团的历史罪人，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宣传部曾派其新闻处长张东明来任《南方周末》主编，他提出建百年大报的口号，按我的理解，是把报纸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启蒙和讲真话放在第一位，但他扭来扭去还是扭不过来，后因身体支撑不住，调回南方报业集团任职。让向熹当主编，向熹是一个才子，周末报是新闻改革早期的产物，我给周末报定义为最有可读性的专栏专版的组合体，我称之为报屁股造反，所以虽然扩大至 24 版，从严格意义上说还不能算是一张合乎规格的新闻周报。

向熹按照新闻周报的结构对版面做了大幅度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向熹立下的一大功劳。但是向熹有很强的精英情结，他认为《南方周末》是办给数百万社会精英看的，把报纸的大众性丢掉了。我认为丢掉大众性就是丢掉启蒙。

被北京杂文家称为杂文泰斗的曾彦修曾对我说，比你们办得更加有读者的报纸有，但是没有思想，办得比你们更有思想深度的刊物有，但是没有大众。而《南方周末》是唯一既有思想

又能连的士司机和农民工都看的报纸。他说中国最需要也最可贵的正是这样的报纸，他要我千方百计保护好这张报纸。

朱学勤在《新民晚报》上写了一篇《独缺形而中》的文章，赞扬《南方周末》文章由知识分子所写，不掉书袋，不铺排学理，而是面对寻常百姓，只援引普通常识与集体记忆，却照样写出鲜活泼辣的文章。

2011 年南方报业集团的副总编辑黄灿调任《南方周末》主编。黄灿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周末》工作两年多，《南方日报》新办一个港澳台新闻版，认为《南方周末》的人思想比较活，要求将黄灿调日报任该版责任编辑，十多年后他以集团副总编身份重回《南方周末》，他回来后，提出要把《南方周末》办成最佳的公民读物。按照我的理解，他是要将《南方周末》再度平民化，所以我很赞成，我对《南方周末》的人说，要办最佳的公民读物，首先就要有民众性。我讲的民众性就是大俗大雅办报风格。大俗不只是通俗，更不是庸俗，而是有思想内涵的俗，大雅不是高雅，而是与普通民众相通的雅。

第二必须要具有可读性。我讲的可读性不是迎合读者的趣味而是关注度要高，究竟大多数民众最关注的是什么？关注度高就是可读性。第三我提出要有包容性。《南方周末》应该有多元的信息和多元的声音。

蔡元培办的北大也包容多种意识形态主张的教授任教，这并不影响北大倡导民主科学主流。第四要增强《南方周末》独家报道多这一特色，公信力高是《南方周末》的宝贵财富，别的报纸说了读者不信，《南方周末》说了读者就信。有了公信力就可以增强《南方周末》的独家性。

因为有很多学者、专家，包括政府的高级官员，别的传媒去也去采访，他们不一定接纳，但是《南方周末》去他们都会接纳，因为《南方周末》是张严肃的报纸，影响力大，这是《南方周末》的优势，要充分利用《南方周末》的公信力，这是《南方周末》的无形资产。公信力的来源是坚持不讲假话，如果讲假话就是自己毁自己。

我离开《南方周末》十三年，我对《南方周末》一直是关注的，对现在出版的报纸我是怀有敬爱之心的，因为我可以想象出他们办报的困难处境。现在《南方周末》任职的同事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了，但从报纸上我感觉到他们都是很优秀的，我对他们同样抱着敬爱之心。

新闻改革的四个时期

我是新闻改革的亲身参与者，深深地感到没有新闻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但是新闻现代化的进程是漫长的，或许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我认为中国的新闻现代化要分四个时期，改革的第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打掉一统天下的“真理报模式”，这时期的旗帜就是黄文俞提出来的“有可以不说出来的真话，绝对不讲假话”。另外就是恢复传媒商品属性，将传媒引进传媒市场，打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才能给新闻改革松绑，用讲真话代替假、大、空，才能使传媒从宣传工具转变为传播工具，恢复传媒的商品属性，将传媒引进市场才能有传媒的市场竞争，给传媒改革带来推动力。在第一个时期，《南方周末》在全国的新闻改革中是起着领头羊作用的。

市民报的出现也是第一个时期产生的一大成果，搞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兴旺的市民文化，市民报的出现时必然的。其定位是只要无害，就是为了赚钱，这样可以为主流媒体的改革积累资金，更重要的是市民报是真理报模式的最强有力的溶解剂。《南方都市报》筹办时委任关键任主编，关键当时是《南方日报》的新闻部主任，他问我接不接这个委任？我说要接。你不要惧怕市民报会带来文化垃圾，人家骂你，干这工作有重大历史意义。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南方周末》的功能只是给真理报模式打开一个洞，不能彻底摧毁真理报模式，而市民报才是真理报模式的溶解剂。

所以随着《广州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华西都市报》等市民报的出现，我觉得改革的第一个时期务完成了。

第二个时期的旗帜是“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就是新闻工作者的神圣使命”。这里面就提出争取新闻自由的问题了，这就和现行政治体制直接产生冲突。所以“南都案”和“冰点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在第一时期出问题一般是做检讨，最高是停刊整顿撤销职务，但是现在搞不好有入狱甚至丧命的危险，要入监狱的问题。而且这条路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走到一半，如果第一个时期走了十多年，现在这时期从本世纪开始走了十一年了。



为什么从本世纪开始新闻改革会转向第二个时期呢？首先经过第一个时期，真理报模式已成为千疮百孔的东西，其理论基础也不再神圣，传媒进入市场引起激烈竞争，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已经登上舞台，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当局对传媒的控制陷入有心无力的状态。正是由于这种新形势的出现，使当权者感到安全上受到威胁，政治上的保守势力和特殊利益集团不但用行政手段打击传媒，甚至使用司法手段打击传媒，更有甚者利用黑恶势力迫害传媒。记者挨打的事时有发生。

中国要实行真正的现代化，新闻现代化是必须走的路。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新闻界的同仁，既要有风险意识，但同时也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有同仁付出血与泪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并非是你们选择时代，而是时代选择了你们。

我对未来的设想，我认为还要经历两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我认为新闻要去行政化，实现采编自主，党应该通过《新闻法》来管新闻，只要不犯《新闻法》采编完全是自主的。所以我很关注南科大，他们教学改革就是要摆脱行政化。

新闻改革第三个时期必须在第二个时期完成之后才有可能。因为实现采编自主前提是要一部良法《新闻法》，但《新闻法》不是当权者赐予的，而是靠人民的力量。所以我认为，第二时期新闻工作者的核心任务，是重新把传媒跟老百姓这条脐带重新缔造出来。

由于真理报模式长期统治，老百姓对传媒是很冷漠的，只有老百姓知道传媒是代表他的声音，代表他的利益，跟他是血肉相连的时候，这时我们传媒才有力量，才有可能和民众一起争取新闻立法。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我们第一个时期的新闻人的中心任务是打破真理报模式的话，你们这一代新闻人的核心任务是关注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要敢于替民众讲话，要敢于捍卫民众的合法权益，要不遗余力的支持公民社会的发展，要和民众建立起血肉的关系，通过民众的力量迫使当权者为新闻立一个良法，有了这个基础新闻改革才能转到第三个时期。

第四个时期就是开放报禁，你只要有合法的公民身份，你就可以办报，问题是你要接受市场的选择，要接受法律的管理。恐怕到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有中国的现代传媒。台湾的左派报人陈映真先生曾拜访我，我问他开放报禁前你是怎么想的，开放报禁后你是怎么干的？陈映真先生告诉我，开放报禁前，他认为国民党办的党腔党调的报纸很快就完蛋，而他们新办的报纸一

定一纸风行。开放报禁后台湾确实出现许多新办的报纸，但现在尘埃落定后，新办报纸成功的极少，因为形势一变，原来国民党办的报纸腔调也变，我们骂他们变色龙，但读者还是买他们的报纸，因为他们不仅人力财力雄厚，还有庞大的信息网、发行网、广告网，所以他们的报纸版面多，信息量大，而我们新办的报纸由于受条件限制，叫好不叫卖，很快就关门了。陈映真先生告戒我，不要以为将来开放报禁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办一张全新的报纸，对大陆传媒人来讲，坚持在体制内推动改革才是上策。或许陈映真先生的意见是对的。

（左方，《南方周末》创始人，历任《南方周末》副主编、主编。本文来源：腾讯《大师》访谈录，原文链接：http://news.qq.com/a/20120215/000992.htm）

【返回目录】

【洞见专栏】

中国式公益广告：党和政府如何动员媒体

长久以来，“广告”被视为企业的专利，而“宣传”则是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的自留地。然而，最近一部名为“KONY 2012”的短片于数周之内红遍世界各地，在引发巨大争议和讨论的同时，也再次提醒人们“广告”与“宣传”之间的界限早已不再泾渭分明。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采用“广告”式的“宣传”来营销自身价值，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不过，虽然公益广告频繁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系统分析中国公益广告的学术研究却并不丰富。荷兰莱顿大学助理教授施达尼 (Daniela Stockmann)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新近发表的开创性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空白。施达尼发现，当下中国的公益广告多由党政机关发起，而具体的融资、制作和发行过程则由媒体、广告公司和企业合作完成；通过这场“国家搭台、社会唱戏”的互动，党和政府实现了对社会价值的宣传与引导。

按照施达尼的介绍，当代中国的第一例公益广告出现在 1986 年；当时，贵阳市节水办通过地方电视台投放了一条名为“节约用水”的广告，并在当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受此启发，中央电视台于 1987 年开设了“广而告之”栏目，专门投放时长为半分钟或一分钟的公益广告，截至 1995 年底，该栏目总共投放了 844 条公益广告。而在同一时期内，全国各地陆续开设了 27 个专门投放公益广告的电视栏目。

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央意识到了公益广告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并于 1996 年组织了首次全国性的公益广告大赛。此后，定期举办全国性公益广告大赛逐渐成为了惯例，而比赛主题大都与当年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领域直接相关，如 2008 年的“汶川赈灾”与“北京奥运”、2009 年的“六十周年大庆”与“反腐倡廉”，以及 2010 年的“民族性别平等和谐”与“上海世博”。

通过 27 次对于政府官员、媒体人和广告制作者的深度访谈，施达尼发现，公益广告在当代中国的繁荣发展，是党政机关的共同推动的结果。就党组织而言，该领域的主导机构为中央



文明委，主要负责为公益广告的主题与内容“定调”。就政府部门而言，该领域的主导机构为工信部，主要负责落实公益广告大赛的举办工作、整理从比赛中获得的反馈，并在发起公益广告大赛的过程中制定与调整相关政策。同时，国家广电总局和中国广告协会由于业务原因，也在公益广告发展领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施达尼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之所以大力倡导和推动公益广告事业的发展，主要出于两个考虑。

首先，许多传媒单位逐步实行了面向市场的商业化转型，而公益广告则成为了党和政府动员利润导向型媒体传播官方价值的一个重要手段。

同时，政策制定者担忧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会受到市场化进程的腐蚀，因而格外强调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党政机关的倡导与推动下，如今公益广告已经覆盖了全国八成以上的城市人口与近四分之三的农村人口，其中约三分之二投放于城市电视台、四分之一投放于省级电视台、百分之五投放于中央电视台。

不过，施达尼也发现，党和政府一般并不直接介入公益广告融资、制作和发行的具体过程。具体来说，希望投放公益广告的党政机关，一般会立足本机构的工作领域，在研究中央精神与民众需求的基础上，确定一个公益广告主题。此后，党政机关会联系电视媒体，而电视媒体的广告部门则往往会将具体的制作过程外包给专业的广告公司，因为后者不仅拥有更多专业人员和制作经验，也往往与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明星有更多联系。然而，与针对特定人群的商业广告相比，即便是由专业公司制作的公益广告，其目标人群也往往是“老百姓”。

政府文件对于公益广告内容的指导往往比较宽泛，因而导演往往需要依靠自身的经验与感觉来决定广告的具体形式与强调重点；考虑到一条广告的市场往往只有半分钟或者一分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同时做到吸引观众和传播价值，往往并非易事。而更为有趣的是，哪些公益广告会最终见诸屏幕，往往由媒体高层而不是政府官员来拍板决定。

通过对七十份全国性公益广告大赛的获奖作品进行分析，施达尼发现其中四成作品的制作机构位于北京，而其余大部分作品也主要出自沿海省份；就内容而言，涉及文明行为、奥运会、环境保护和教育等兼具政治意义与社会价值的作品比例最高，关注以上四个主题的公益广告占到了全部获奖作品份额的三分之二。



由于公益广告无法直接创造利润，而中央文明委所掌握的宣传经费远不足以覆盖相关支出，寻求媒体与企业分担资金压力就成为了一个必然的政策选择。国家一方面要求所有电视台在晚七点到晚九点间的黄金时段中必须拿出百分之三的广告时间用于播放公益广告，另一方面也允许媒体采用一些旨在吸引资金的灵活措施，例如在公益广告中适度展示赞助企业的标识、或是将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打包销售给投放企业。同时，国家和媒体将赞助公益广告塑造成为了企业履行自身社会责任的一条途径，而赞助公益广告也被一些企业家视为支持政府工作和密切与媒体关系的一个手段。

随着媒体影响力在信息时代与日俱增，党和政府进行宣传的手段也在与时俱进。中国公益广告的主题与内容反映着主流舆论指向，其目的在于引导和塑造社会价值，但其制作过程已和商业广告没有明显差异，而其资金筹集更涉及政府、媒体与企业等诸多行动者。一条公益广告，从政府文件中字里行间抽象概念，到电视屏幕上方寸之间的精彩呈现，离不开国家与社会的密切互动；而中国公益广告的发展历程，不仅直接反映出“广告”与“宣传”界限的逐渐模糊，更充分体现着信息化背景下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多领域交互作用的时代特征。

【参考资料】

Daniela Stockmann. 2011. “Greasing the Reels: Advertising as a Means of Campaigning on Chinese Television.” The China Quarterly 208: 851-69.

（本文由“政见”团队供稿：http://cnpolitics.org/2012/05/public-service-advertising/）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北京空气污染

中国从东北到西南的大部分地区步入严冬，均压少风的天气使得污染物无法扩散而形成雾霾天气，灰暗的浓雾不仅导致多地航班延误、高速关闭，12 日晚上，北京城区的 PM2.5 监测站甚至监测到超过 900 微克立方米的数据，令人们对空气状况感到担忧。

新闻：http://fmn.cc/S69Q1r

http://fmn.cc/V6zguD

极重度的空气污染令许多人选择周末“宅家”，但家电卖场中空气净化器的销售区却是客流不断。媒体称不少前来“突击选购”的顾客戴着口罩，功能新、价格昂贵，特别是标明“对抗 PM2.5”的净化器格外受青睐。此外，一些车内、桌上型的空气净化装置也持续热销。此外，由于空气污染导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大幅增加，医院中也人满为患。

新闻：http://fmn.cc/V6vtgL

在这场雾霾天气中，中国国有媒体前所未有地发出了大量坦率的批评之声，这代表着政府已经默认，环境问题已经到达危机水平，并可能引发政治上的严重后果。不过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面临很多挑战，中国的空气污染不会一天内消失，甚至一年或 10 年都不会消失。

新闻：http://fmn.cc/V6oTH4

北京严重的空气污染让媒体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有媒体引述统计称，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 10 个城市之中，有 7 个位于中国，央视一名记者还出镜讲述自身经历，他称自己在北京时因空气污染引发过敏反应导致面部肿胀，直到做驻英国记者后病情才缓解。

新闻：http://fmn.cc/13wFOqb

http://fmn.cc/13wFGXI

1 月中旬以来，中国大部分地区遭遇了今年冬天持续时间最长、污染也最严重的雾霾天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北京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的卫星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北京上空笼罩着阴霾、低云和尘雾，也无法看到烟雾之下的城市面貌。

新闻：http://fmn.cc/V6yuO9

云南镇雄山体滑坡善后处理

1 月 11 日 8 点 26 分昭通市镇雄县果珠乡高坡村赵家沟村民组发生山体滑坡，山体滑坡掩埋 46 人，14 户房屋全部被埋，被埋者中还有儿童 19 人、60 岁以上 7 人。到第二天搜救结束时，被掩埋的 46 人全部遇难。专家称，滑坡与当地的煤矿没有直接关系。

新闻：http://fmn.cc/V6xjye

但事件发生后，原本要让家属认领尸体，官方却将遇难者遗体强行火化，给出的理由是怕家属情绪激烈，同时，遗体存放太久会出现卫生防疫等问题 。这一理由和官方的处置手段遭到了外界的质疑。

新闻：http://fmn.cc/11tHSRt

遭到质疑后，镇雄县官方对此公开道歉，并责成县民政局和殡仪馆作深刻检查。 不过当地官员表示这一做法有苦衷，镇雄县县委办主任朱恒辉承认，这样做部分考虑到维稳因素。对于村民质疑专家的观点，镇雄官方称同意村民下矿查看。

新闻：http://fmn.cc/W6hc34

http://fmn.cc/V6wdmf

镇雄的惨剧发生后，村民怀疑是因煤矿采煤、瓦斯爆炸引发了山体滑坡，不过官方都给予了否认，而村民称山体滑坡地 500 米内 14 个煤窑，想与专家就此事进行“辩论”。近日，镇雄 72 名村民亦联名要求重新调查山体滑坡事件。

新闻：http://fmn.cc/S682FT

http://fmn.cc/V7tLj9

李承鹏、伊能静

作家李承鹏 1 月 12 日在成都签售却遭到警方要求他不许开口讲话的命令，而 13 日在北京的签售虽然得以进行，但有人现场掌掴李承鹏，同时还有仍向他扔菜刀。

新闻：http://fmn.cc/WJXitn

李承鹏 1 月 15 日的深圳签售会如约进行，现场仍有数名抗议者，在场外也有人因意见不合发生打斗，不过冲突双方很快被控制，没有造成进一步影响。

新闻：http://fmn.cc/13BbVFj

新华社在评论李承鹏签售会遭遇的事件时，引述鲁迅的话称，“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又表示，“如果不同意李先生的观点，完全可以写文章驳斥。打人骂人，徒显自身素质之低，徒增社会暴戾之气。”

新闻：http://fmn.cc/S6bvnL

因声援南周事件而被禁言的台湾艺人伊能静也是近期成为关注焦点的另一位公众人物，国台办对她被禁言一事回应称，台湾艺人在大陆应遵守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另外据伊能静自己表示，春节前她的新书宣传活动因出于安全考虑都已经取消。

新闻：http://fmn.cc/W87yMH

http://fmn.cc/VZpyvH

本周因薪资问题的群体性事件

1 月 10 日，陕西渭南市富平县的人民路广场，上千名农民工下跪讨薪，希望有关部门出面帮助处理。媒体报道称，陕西富平龙城国际恶意拖欠近 2500 名农民工工资，金额达 6 千万，春节将至，据悉这些农民工已经拿到部分拖欠工资。

新闻：http://fmn.cc/13FXeln

1 月 10 日，广州荔湾区中山七路与荔湾路路口有 200 多名环卫工聚集要求涨薪。一名身有酒味的市民为环卫工出头说话，后被警方带走调查，环卫工涌上街头与警方对话。尽管工人停工，但该区的卫生状况保持良好。

新闻：http://fmn.cc/USFuSp

http://fmn.cc/1004Bzs

1 月 11 日上午 8 时许，位于丰城市的新海洋公司上千名员工，因增加工资诉求与厂方发生意见分歧后，在该公司附近聚集，对厂区秩序造成一定影响。通稿称，经过相关部门做工作后，截止上午 11 时 30 分左右，聚集人员全部疏散，员工情绪稳定，厂区恢复秩序。

新闻：http://fmn.cc/W87AEc

http://fmn.cc/1004x2L

14 日，位于北京长安街上的齐家园外交公寓，50 多名工人冲破保安防线，到一名建筑公司老板的住宅外抗议欠薪，大批武警在住宅门外排成人墙，阻止工人冲入屋内，部分工人与现场警察发生冲突。齐家园外交公寓，坐落在第一使馆区，紧邻建国门和国贸商区。

新闻：http://fmn.cc/1004Ydf

本周其他重点新闻

1 月 10 日，周四，新一期的《南方周末》如期出刊，而事件另一主角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也在 11 日出席宣传会议，向外界传达出他仍担任部长的讯息。

新闻：http://fmn.cc/W87AnH

1 月 11 日，上海松江区泖港镇掘石港 320 国道朱泾大桥南侧区域发生重油泄露事故，污染泖港河道水源，泖港水厂供水已经暂停。截止目前，至少有 8 个村、1 个居委会及 400 家企事业单位受到影响。经公安、环保部门现场调查确认，是有人用槽罐车偷排油性废弃物所致，涉事人员已经被警方控制。

新闻：http://fmn.cc/13FUVi0

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阿木去乎镇 1 月 12 日再度发生一起自焚抗议事件，自焚者当场身亡，成为 2013 年首位自焚藏人，媒体称事件后警方阻止藏民慰问家人。随后，新华社转发甘肃媒体的消息，称逮捕了“煽动自焚”的 7 名藏人。

新闻：http://fmn.cc/V92Za2

http://fmn.cc/VVNq3q

http://fmn.cc/V1tUki

中国——1 月 14 日交通运输部要求 9 个示范省市的大客车、旅游包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今年 3 月底前 80%以上安装上北斗车载终端。6 月 1 日后，凡未按规定安装北斗导航的车辆，不予核发或审验道路运输证。据悉这一工作被定性为重大的“政治任务”。

新闻：http://fmn.cc/13wGonZ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1 月 14 日表示，要扩大把大陆“211 工程”学校学生纳入来台求学范围，大陆委员会晚间指出，已配合教育部全面检讨，未来将从现在的 985 工程、41 所大学，扩大到 211 工程的学校；同时，开放大陆专科生来台修读二技课程。

新闻：http://fmn.cc/V92YTo

网络上流传的一个视频显示，广东揭阳榕城区民政局一名工作人员向该市紫峰寺的住持“借弃婴去福利院”，遭到当场拒绝。工作人员称，“明天省要派人下来检查，我们想在庵寺里借十来个孤儿，应付给领导看下。”情况被曝光后，民政局又否认曾向寺庙借孩子。

新闻：http://fmn.cc/VVLnMH

因拆迁问题威胁到广州的校园中制造血案的曹再发表示，他被当地政府绑架、房屋被强拆，求助时被无良记者和律师欺骗，他称：“在广州出了一条人命是纸包不住火的。在（老）家里死十个人他们都包得住”。不过他也承认威胁伤害他人是不对的。

新闻：http://fmn.cc/13wFfN5

1 月 15 日 4 时许，吉林省桦甸市一金矿发生井下一氧化碳中毒事故，事故造成 10 人遇难，27 人受伤，失踪的 1 人随后安全获救。

新闻：http://fmn.cc/13FWMDG

河南媒体向社会征集国军抗战老兵的线索，发现大多老兵的心愿并非索要物质，而是希望获得精神层面的认可和尊重。一名 85 岁高龄的老兵称因受歧视很少出门，每月的低保仅 72 元。

新闻：http://fmn.cc/13BYa9t

中国媒体报道称，1 月 15 日下午 13 点 50 分许，一男一女闯入湖南新化县上梅镇北渡小学，男子用凶器将一名三年级学生打伤，该校校长在阻拦其行凶时被砍伤致死。据介绍，受伤学生姓王，目前正在娄底市进行抢救。

新闻：http://fmn.cc/1002NGI

【返回目录】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点击这里申请。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黄海、张博

校订：童亚琦

主编：方可成

配图：王添裕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